

林语堂 著

中国新闻舆论史

一部关于民意与专制斗争的历史

今天不少人谈中国的「公共空间」问题，此书仍有可以借鉴之处，因为近几十年关于报业史的专题研究虽增加了不少，却仍然没有一部英文的通论取它而代之。

——余英时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水隐醉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新闻舆论史

一部关于民意与专制斗争的历史

林语堂 著 刘小磊 译 冯克利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新闻舆论史 / 林语堂著; 刘小磊译. — 上海: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8

书名原文: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ISBN 978-7-208-08098-0

I. 中… II. ①林…②刘… III. 新闻事业史—中国
IV. 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6146 号

责任编辑 姚映然
装帧设计 张 布



世纪文景

中国新闻舆论史
林语堂 著
刘小磊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20 毫米 1/16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142,000
版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098-0/G·1271
定价 25.00 元

序

林语堂是我国现代文坛的巨子，影响中外。1936年8月，他携眷赴美定居，带走的是上海文坛对他鼓吹幽默、性灵，提倡“帮闲文学”，麻痹人民革命斗志的严厉批判；而留下来的却是默默写成的痛击国民党政权对舆论残酷压制的政策，激励民众为新闻自由、为公民权利而战的论著：这本用英文写成的《中国新闻舆论史》。林语堂自称是“一团矛盾”，这一著作的出现，更把这团矛盾推向一个高峰。

本书的思想内容、所总结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这是人们的关注所在。同时，它又是剖解、认识作者身上种种矛盾的珍贵文本。这是我们应该重视的双重价值。

岁月悠悠，在风云激荡中悄悄逝去。本著问世已逾七十年，新中国成立也近六十年了。名震一时的林语堂及其论著渐渐被人淡忘。1949年以后，我们只看到两篇评析林著的专文（侯东阳：“林语堂的新闻舆论观——

评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2月；王海、何洪亮：“中国古代舆情的历史考察——从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说起”，《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2月），我国新闻史学界读过本著的，也甚寥寥。欣慰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学界兴起了研究林语堂的热潮，关注林著的人也多了起来。这期间，译者译出该书，并邀我为之写序。我不禁为之心动，欣然应命。自量有关知识浮泛，根基不深，恐难胜任。但这确是我志趣所在，自当奋力而为，并把此作为学术上探索、磨炼的良机。差误之处，尚恳同行和读者多加指正。

对本书写作主旨的辨析

关于本书的主旨问题，作者在文中已提及，但未着意阐释。我感到尚有几个重要问题必须辨析清楚，才能使这一主旨成为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思想，统率全书。应作辨析的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分述如下：

一是关于本书的科学属性问题。书名是《中国新闻舆论史》，看起来既是“新闻史”又是“舆论史”，二者是并行关系，书中也有某些并行的史料。但实质上本书是舆论史，不是新闻史。有关新闻史的内容总体上是为服务于舆论史而存在的，与后者是附从关系，没有独立存在的地位。本书所以特别看重新闻史，是因为“报刊业是公众的耳目喉舌”^[1]，和舆论史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具体说，就是与新闻自由的关系。本书一开头就明白地说：“泛泛谈论报业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能悬新闻自由之理想为鹄的，并以之为衡量新闻事业成败的标准，把新闻自由看做民主的真正基

石。”^[2]又说：“我所感兴趣的，是作为民意与专制斗争史的中国新闻史。”^[3]

基于这种观念，本书对中国古代报纸不感兴趣，因为它“主要刊登官员的任免、升迁消息，一般只在官员中流通。因此它远未能成为民众的‘耳目喉舌’，也不是舆论的载体”^[4]。这样，在古代时期这部分，极大篇幅写的是舆论史。除一处有“邸报”一词外，全然不提古代报纸。另也有很小篇幅写新闻史，主要是介绍中国古代报纸发展概况方面的知识。作者自称，这些知识“谈不上有多重要”^[5]。

对现代新闻事业的关注就不同了。这部分写的几乎都是新闻事业的活动，但要注意，在总体上它是为反映公众舆论与政府专制的斗争而出现的，主从关系十分明显。实质上，写的还是中国舆论史。

在本书的最后一段中，作者称：我“写了这本《中国新闻与舆论史》，对漫长的中国舆论史作一次回顾”。^[6]在这里，作者已坦然声称这本书写的是中国舆论史了。

其二，严格地说，本书并非学术性著作，而是政论性著作。学术性论著，通常重在对所研究对象系统知识、学理的提供，也注意实际运用，但还是意在说明前者。这里不妨与台湾学者朱传誉的同类著作《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7]作一对照。朱著一开头就以60余页的篇幅，对新闻自由的渊源、理论基础、基本概念、流派意见等问题详加介绍。而本书对此毫无兴趣，全不涉及。又如，关于宋代部分，朱著写了65页，其中52页是介绍当时与言论出版自由相关的种种知识，只有5页评介当时影响强大的争取言论自由的“学生运动”。本书则与此大异，全部篇幅（12页）都集中到一

点——评述南宋的“学生请愿”运动。经此对照，林著之非学术性而政论性，似已很清楚了。

林著之非严格性学术著作，还表现在对学术研究规范的违犯。例如，按时代写史，应把握各代前后相承的关系，使其形成相互联系的总体。可是本书的古代部分，在魏晋之后，接下去写的却是宋朝。唐代未作任何说明就被跳过去了。又，明朝写完后忽然刹车，二百余年清代部分不见了。更为严重的是对史料的态度。历史研究，史料是基础。可是本书对史料的发掘和考订，很不重视，未花力气。所用史料大多为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等前人之作和刊载于当时报刊上的现成材料。戈氏错了的，林著照错不误，还起而为戈氏的错误辩护。所引当时报刊上的材料，也常出现错误。例如，根据1935年出版的《中国年鉴》，说该年度四川出版报纸29种，实际上当时该省仅日报就49种，对其他省份报纸的统计，也有差错^[8]。所幸这些差错尚未对本著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我对这些差错曾进行较为严厉的批评。后经反思，感到作者当时的任务十分繁重，时间紧迫，实无暇对这些史料详加考订，出现这些差误，应予体谅。

这里所说本著的政论性，主要是指它无意于泛泛而谈一些学理性、知识性的问题，而是面向现实的政治大局，从大量生动的事实中，揭示公众和专制统治斗争中所出现的矛盾，抒发己见，影响群众。它对现实斗争所起的重大作用，则非《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等类学术著作所可企及。行文生动流畅，平易近人，笔锋常富感情，别具魅力。

其三，关于对国民党政权舆论专制的斗争在本书中所处地位问题。首先要认识到，本书对该政权不是一般性的批判，而是把它作为我国历史上

罕见的范例来对待的。断言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比1900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差”^[9]，其新闻事业“正在步某些现代西方独裁国家（引者按：指德、意等法西斯国家）报业的后尘，走向堕落之路”^[10]。并以特大篇幅^[11]，对这十年的表现详加剖析。可以看出，它是全书最为醒目的重心所在。

尤为发人深省的是，作者还把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并以之与国民党政府的舆论专制政策进行斗争，作为写作本书的用意所在。这不仅在多处时有流露，而且还坦率陈词，向读者明白讲清楚。如在“宋朝的学生请愿”这部分中，作者宣称：“我们之所以对这一时期特别感兴趣，是因当时的政局、士人的运动和舆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的局面。这就是历史研究的价值，它教我们以史为鉴，从过去中看到现在。”^[12]在本书的结尾部分，作者还专作说明，强调他之所以写这部书，是非常“希望能有助于读者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局势，理解舆论繁荣和衰败之因”，敦促“今天，我们必须为新闻自由的宪法原则而战，为作为原则的个人的公民权利而战”^[13]。语重心长，传达了自己的心声。这样，通过对以上三个问题的辨析，本书的写作主旨就很清楚了。

对林语堂在上海文坛种种矛盾的解读

林语堂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团矛盾，主要是在上海文坛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在本书中，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舆论专制深恶痛绝，号召公众为争取新闻自由和公民权利不懈战斗；可是在社会实践中，他却日益脱离现实

的政治斗争，渐行渐远。正是这一根本性矛盾带动了他身上的另一些矛盾，如文学领域同流派之间的矛盾、文坛上与当年并肩战斗的文化人之间的矛盾、在自己心灵上所凝积起来的沉重的精神矛盾……

首先要解读的就是这一根本性矛盾。这需要对他近十年的经历进行审视。经过查考后我领悟到，他之从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群众性运动，转而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可说是从1927年7月“宁汉合流”建立国民党政权专制统治开始的。这是一个带有某种规律性的发展过程：林语堂脱离政治斗争的程度，大体上是和国民党政府实施专制政策的程度相吻合，其他矛盾发展状况也大致与此相适应。

林语堂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主义者，政治上崇奉西方民主主义，非常赞赏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纲领，对中国共产党当时也持友好态度。特别让他兴奋的是国共合作发动北伐战争，认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现曙光”^[14]。他当时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可是风云突变，美好的期望，顿成泡影。前路迷茫，他一下子消沉了，高昂的政治斗争热情隐退了。

起初，他和上海革命文坛仍保持一定的联系，《语丝》自北平迁沪由鲁迅主编后，林积极为该刊写稿，同时还在鲁迅在沪创办的《奔流》杂志和由鲁迅主持的朝花社所出的《朝花周刊》上发表文章，和鲁迅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

可是到了1930年初，《语丝》等刊物停刊后^[15]，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林语堂和上海革命文化出版事业的联系忽告中断。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一批革命文化期刊在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拼搏中活跃起来。林语堂却是一位冷眼旁观者，不曾给这些刊物（包

括鲁迅主编的)写过稿子,自己也没有办刊物发表文章。默默地在矛盾中徘徊,度过了近三年的岁月。他自己也用一种打趣的语调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至三年之久。”^[16]1932年9月16日,《论语》半月刊创刊,宣告了这一阶段的结束。

这近三年的岁月,可说是林语堂的矛盾生成、演化期。这期间出现了一些对林起着重大影响的政治局势,诸如国民党政府对日寇妥协投降、对民众残酷镇压本性的显露,对公众舆论大“围剿”政策的施行,他所憎恶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在全国的激烈开展等等。在进步文坛内部则不断兴起不同政治态度、不同流派之间的论争。导致林对当时形势作出“世道日微,人心日危”^[17]这样消极的估量。对此,林并非真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无心隐居,迫成隐士”^[18]，“颇想在人世上做点事业”^[19]，“以贡献于社会国家”^[20]。就是说,他要做的是面对这些矛盾的纠缠,深思苦索,谋求应对方策。对于这些矛盾(特别是政治上的)的认识,他无意明文表述,但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以下简称《舆论史》)一书中,已有不少抒发。《论语》的出版,将其所认定的“应对方策”公之于世,为我们的解读提供了条件。

《论语》是林语堂新事业的开篇之作,他声称所谈论的既有“国家大事”,也及“男女私情”(据“《论语》编辑后记”),不拘一格。其初评论政治时事的文稿还较多,林自己也写有积极意义的“论政治病”、“谈言论自由”等文。这自然也是该刊的关注所在,但并非办刊的宗旨。该刊的主旨是倡导意态闲适、行文幽默的文体,以纠正流行于左翼文坛的那种泛政治化、丧失自身特性的弊端,从而创建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后来称之

为“论语派”)，以影响社会。这样的主旨，实质上就决定了其发展方向是脱离现实政治斗争，而且越来越严重。

林语堂在矛盾中为自己所设计的这条新路，对林的适用性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可以从容应对国民党政府日益强化的舆论压制政策，驰骋文界，遇险不惊，这是最关键的。二是办刊主旨虽然疏离现实政治斗争，却闯入当时主流文坛所讳忌的领域，轻言淡述，自抒胸臆，自诩开一代文风，余英时先生则誉之为“在当时也有反潮流的意味”^[21]。该刊当年受到广泛的赏识则是事实。其三，《论语》的那种文体文风，正是林的秉性和情趣所在，在以往的作品中曾有良好的表现，还写过有关“幽默”的文章。现在更可用其所长，大显身手，实现做点事“以贡献于社会国家”的诉求。林语堂在这矛盾的社会中，营造了这样一方安身立命之地，真是“得其所哉”！

《论语》的创办，引起了林语堂在文坛上的派系之争和他与当年老友之间的矛盾，一发难休。起初，林语堂虽已不在鲁迅^[22]主编的刊物上写稿，鲁迅却应邀在《论语》上发表多篇文章。在“《论语》一年”中，鲁迅对该刊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估。一方面讲了不少赞誉之词，另外又尖锐地指出其消极面，批评林所倡导的“幽默”在政治上起了“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23]的作用。这是我所见第一次对该刊方针的指责。在《论语》的第一年中，林语堂在社会上还参加了一些进步的政治活动，如1932年12月参加了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邹韬奋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5月，和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邹韬奋等40余人，联名通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的左翼作家丁玲、应

修人。林语堂所联合的多为有重要影响的民主派人士，他并不反对共产党，却不愿和共产党人合作，参加中共领导下的活动，他对国共之间的党派斗争十分憎恶。

随着林语堂政治上日渐消沉，《论语》的消极因素也逐渐滋长。出到第27期后因故交给陶亢德编了。1934年4月他另创《人间世》，提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其脱离现实斗争的程度，比《论语》走得更远了。我们说“论语派”三刊，除了上述两刊外，还有创刊于1935年9月16日的《宇宙风》。三刊风格自有一致之处，但时势情况不同，表现亦有所区别。重要的是林所着力经营的不在此刊，其时他所关注的方面正多。三刊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人间世》，它所存在的一年零八个月间，林语堂的那些矛盾发展到了高峰期。

《人间世》创刊的1934年，“那时中国正处于最为黑暗的年代”^[24]。林语堂《舆论史》猛烈抨击的国民党猖狂压制舆论的事迹，主要出现于这一时期，它曾以生动事例，揭示该政府践踏法纪的程度，已大大超过北洋政府^[25]。书中还披露当时大捕政治犯的风潮，说“自1934年11月到1935年3月，仅北平和天津两地，就关押了230多名政治犯”，“1934年两市逮捕的政治犯超过800人”^[26]。激愤之情，洋溢纸端。这与《人间世》那种闲适的笔调，形成鲜明的对照。

《人间世》是当时时局矛盾的产物，它的创办又推动了这些矛盾，鲁迅对它的批评，较之《论语》，提高了档次，他说：“《人间世》之类，则本是麻醉品，其流行也意中事，与中国人之好吸鸦片相同也”^[27]，把它看成毒害人民的麻醉品了。起初，鲁迅对《人间世》还有所期待，创刊

时鲁迅还介绍几位作者为它写稿，以期对该刊施加影响，条件是“除非执笔人同意，编辑不能任意删改”。后来这一约定被林语堂破坏，也就不再去写稿了^[28]。再往后，矛盾又有新的发展。《人间世》公开发表林语堂攻击左翼作家的文章，如“游杭再记”、“我不敢游杭”、“方巾气研究”等。左翼文界起而与之对阵，较为活跃的是《太白》和《芒种》两刊。《太白》的主要任务，被称为“是转移《论语》和《人间世》所造成的颓废的个人主义的小品文作风”^[29]。《芒种》则被鲁迅直称为“是反对林语堂的刊物”^[30]。《申报》的《自由谈》副刊，也常发表左翼文人批林的文章。双方的对立关系，跃入一个新的阶段。就在这期间，鲁迅断绝了和林语堂的联系。上面所说的矛盾高峰期，就是这样降临的。

有谁知道林语堂心灵上还有矛盾在默默地发展呢?! 他对国民党摧残舆论的专制统治的仇愤，越来越强，却在文化工作中不断压抑这种仇愤的对外宣泄。1935年，矛盾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这就是《中国新闻舆论史》一书的编写。

依据各方意见和林语堂的自我表白，可以断言，这些矛盾的总根源在于，在国民党政府的残暴统治下，林语堂无意挺身面对，而是回避迫害，为自己的事业营造一个安全港。与林语堂同时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史沫特莱批评林语堂说，“他贪生怕死，不敢挺身而出投入革命斗争”^[31]。“贪生怕死”一词似乎重了点，但批评他“不敢挺身而出投入革命斗争”，是很恰当的（这里还是把他当做同一阵线的伙伴看待的）。当年曾参加林语堂创办的《宇宙风》半月刊工作的周劭回忆说，国民党政府实施白色恐怖，“杨杏佛、史量才相继被暗杀，林语堂也害怕受祸，只好退居

第二线”^[32]。说他“害怕受祸”，可说是一语中的，不愧是同舟共处的知心人。1935年，林在《四十自叙》中称：“胆小只评前年事，才疏偏学说胡卢。”公开讲自己“胆小”，虽带有自嘲的味道，实已表露出自己的心声了。他在《舆论史》一书中，常为古代那些身处官场逆境，只求自保的士人辩解。说他们也是人，“所以我们可以原谅他们只求自保；但因为是人，所以他们的玩世不恭，只不过是掩盖内心的痛苦罢了。”又称：“理解万岁——在没有宪法保护的情况下，仅仅对士人和批评家说一句‘不要怕，奋勇向前’，他们是不会对政治取积极态度的，没有人会拿生命危险去冒犯统治者的。”^[33]讲的是古人，实际上是自己心态的表述。

林著出版后在国内的反响

在1936年8月林语堂赴美之当年，本书在上海由英商凯利和威尔士有限公司（别发洋行）出版。同年在美国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这部著作曾“对美国的汉学研究发生过影响”，“在50年代前后还是美国大学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指定参考书之一。今天不少人谈中国的‘公共空间’问题，此书仍有可借鉴之处。”^[34]可是，在国内，本书却长期沉寂无闻。1976年以前，在大陆所出书刊文稿中，我还没有看到过这本书的名字^[35]。起初的缘由，当和那时政治大局的转折有关。本书出版不久，国共联合抗日的趋向日益显露，反对国民党专制的舆论已在淡化了，其后原因要复杂些，“左”的思想观念当是其中一条。

本书对国内之关联与影响，主要在中国文学史界和中国新闻史（传媒

史)界,情况有很大差异,分述于下:

一、在中国文学史界

本书写的虽然不是中国文学史,但内容时有涉及,特别是对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等“论语派”和左翼文坛矛盾斗争之解读,具有非常珍贵的价值,不是其他史料所可代替的。其实际意义,还超过两派斗争的范围。

我特别想了解这本书出版后当年上海文化界的反映,可是据我所查阅的各种史料,还未发现有谁提起过本书。在上海,曾和林语堂一起活跃于沪上文坛的,现只有夏征农老人了。我曾呈写一信(由复旦大学党委派人递送)请教夏老。因他年事已高,未有回音,现住华东医院,未敢再打扰。据丁淦林教授告知,他曾查阅《夏征农文集》(五卷),未见提及《舆论史》这本书。在林语堂本人的文稿中,也没有看到记有我国文化人士谈论本书的文字,只见有他揭露国民党政府情报司头目,发现这本书后对他提出的警告^[36]。我也请教过一些学者,也是一无所知。就是说,这本书所潜藏的、帮助我们理解林语堂和当时左翼文坛矛盾的那些积极因素,尚未展现出来。

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我国不少学者对林语堂当年和左翼文坛的矛盾斗争的性质作了不同程度的扭曲。这一矛盾本属革命阵营中文学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表现^[37]。1936年秋,林语堂和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巴金、郑振铎等二十一人联合署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

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38]，其同属一个阵营的性质就更明确了。可是我们的文化界却长期将这一矛盾认定为敌我性质。

最为露骨的，是1955年出版的丁易所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一书。该著一开头就明白把论语派文学标明为反动文学。称林语堂为“投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去当帮闲的清客”，说林提倡幽默和闲适的目的，“不外是企图使大家对国民党反动黑暗统治不闻不问，而收得巩固反动统治的效果”。1956年由马列学院（中共高级党校）新闻班编的《中国报刊史》（草稿）^[39]，也将林和左翼文坛的矛盾写成敌我矛盾，它虽然对《论语》创刊初期的一些积极表现作了肯定，可是在总结时却写道：“林语堂这时公开谩骂革命，诋毁左联，终于暴露出一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帮闲真面目。”1980年8月出版的《民国人物传》（二）中《林语堂》一稿^[40]，继续将林语堂推向反动阵营，称他“不敢正视现实，企图逃避、躲藏，终于走上反人民的道路”。后来“彻底暴露了……帮闲、帮凶的面目”。

尤为令人感触的，是我所敬仰的、当年曾参加左翼文坛斗争的陈望道、胡愈之二老。陈望道称，他主编《太白》的一项任务，就是“反对林语堂之流配合国民党反动文化‘围剿’而主办的《论语》和《人间世》鼓吹所谓‘幽默’的小品文的”（写于1926年9月）^[41]。胡愈之则说：“《太白》对于胡适、林语堂之流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给以有力的打击。”（写于1929年7月13日）^[42]

我想，一位严肃的学者，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对某些政治、思想方面问题，作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评判，不足为怪。可是，这些严肃的学者，如果读了这部全力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舆论专制政策的《舆论史》以

后，仍然把林语堂看做国民党政府的帮凶，像这样的荒唐事我从未见过，实际上也不会出现。上面那些情况的出现，就是我所感受到的《舆论史》在我国文学界未能流通，所带来的一大憾事。

改革开放以来，上述那种由“左”的思潮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已经逐渐消除，出现了一些评析切实、富有创见的作品。我深受启发的是吴中杰教授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43]一书中，对“论语派与性灵文学”的论述，既广且深，新意纷呈。因本文题旨所限，这里不能畅谈。我着重要说明的，是吴教授在对论语派评估问题上的历史性突破。一方面，对这股思潮在民族存亡危急之秋游离于现实斗争之外的表现，作出了深切动情的批评。一方面，又勇于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肯定它具有反封建主义、反法西斯专制主义的积极性，认为“强调自我，讲究性灵，自有其合理的一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新见解。这种新见解之提出，是在改革开放时代潮流推动下，学者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所形成的，和是否读过这部《舆论史》并无关联。

但我又想，如果这位学者同时也读过这部著作，是否会有新的领会？回答是肯定的。比如，像文体、文风这种热门问题，《舆论史》中有多处解说，有些是直接阐释论语派倡导的概念，读后自会获得新的感受。书中讲得更多、并特别强调的，是端正新闻报道的文风。提出新闻报道要贴近人的内心和生计、要有人情味、要通俗易懂、平易近人、喜闻乐见、要用脚写作（指实地采访）等等。这和论语派强调自我、讲究性灵的主张，大异其趣。书中又提出，新闻报道文风文体之改革，“必须从当前中国散文文体的全面解放入手”，把二者又联系起来，这为我们的文学界开辟了

新的研究空间，值得重视。

我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门外汉，读了《舆论史》后，对林语堂如何看待左翼文坛对他的批评问题，有一些新的思考。我觉得，说他畏缩后退，脱离现实政治斗争，他是会接受的。从本书看，这本是压在他心头的一种重荷，只是祈求谅解，呼吁“理解万岁”。可是，批评他办的《论语》、《人间世》等刊是一种麻醉品，专读一两年就会变为废品等等，他会坚决反对，这在《舆论史》中是有明白反映的。我读这本书后，对他的态度表示理解。本书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启发民众反对专制统治，猛烈批判蒋介石政权把孙中山的“欲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的指示完全置诸脑后。像这样一位如此高举启发民众旗帜的作者，怎么会把自己的刊物办成麻醉品？因此我想，鲁迅上述那种批判，当是因为老战友在政治上日趋退缩，多次劝导而被拒绝的激愤之词，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切实际，过火了。1936年初，鲁迅在和斯诺的谈话中，介绍新文化运动以来成就较大的四位散文家，其中一人就是林语堂^[44]。这里，“麻醉品”的称号，自然是消除了。

《舆论史》对我国文学史界的启示当然还有很多，惜我知识浅薄，难以尽述。吴中杰教授对此寄以很大期望，可惜一直无缘与本书见面。还说，据他所知众多的同行人士中，还没有发现有谁读过这本书。

二、在中国新闻史界

《中国新闻舆论史》和新闻史界关系之密切，当然大大超过中国文学

史界，流通状况也就不一样。可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依然处于严重隔膜状态，鲜有人提及。据我所知，首先引用本书的新闻史著作，是台湾学者朱传誉所著、于1967年出版的《宋代新闻史》，距本书出版时间已逾三十年了。朱传誉1974年出版的《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也征引了林著。虽然重视程度仍很不够，但毕竟有了历史性的突破。

在大陆，据我目前所知，在公开出版物中首次写入本书名字的，是1989年7月出版的《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惜只列入书名（译为《中国报业及民意史》），释文全无。次年8月出版的尹韵公所著《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首次征引该书（译名同前），在“政治性歌谣”一节中称：林语堂说“中国在没有文字报以前，歌谣就是当日的口语新闻”。认为“这种看法尽管有些牵强，但也不乏道理”。1992年9月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在“序言”（方汉奇撰写）中把本书（译为《中国报刊和舆论史》）称为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新闻史三大代表著作之一，但正文中没有提及本书。次年5月出版的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在“新闻史论著”栏目中列入本书（译名同前）。释文二百余字，称之为“中国较早概述中国舆论演变过程的专著”，“观点鲜明，文笔流畅”，对其政治、思想倾向，未作评判。2003年1月出版的陈玉申所著《晚清报业史》，则一再摘引《舆论史》的观点，将林语堂称王韬为“中国报业之父”、称梁启超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的评语引入书中了。

《舆论史》在新闻学界之流通，比起在中国文学史界的那种冷寂状态，是有所不同了，但其隔膜的严重性，仍然令人惊异。本书之进入中国新闻史界之视野，已是出版四十余年以后的事了。所涉及的也只是一些抽

象、表层和零星的知识，除了前文所介绍的侯东阳等人的文章外，迄今我还没有发现有哪一著作、文章，对该书的主旨、特性、历史地位以及政治与思想方面见解等问题进行过评判。也不曾看到有哪部著作，把该书作为研讨对象。这也是很不正常的。

林著 1936 年秋出版后，局势很快转入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书中那种强烈的反国民党统治的倾向，显然落后于形势了，它的冷落遭遇是意料中事。解放战争时期的时局动荡空前加剧，安心做学问的氛围已难寻觅。对于像“新闻史”、“舆论史”这类冷门学科用英文写的这一专著，迄今没有发现当时有谁在文中提及它，也是能够理解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自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起，中国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开始受到重视，编写教材（现代部分）活动积极开展起来，我本人就是在这时转入新闻史学界的。可是我们要写的是中共领导下以党报为核心的进步报刊的发展，全力以赴的是对党报及有关报刊的调查研究，要学习的是中共有关文件和指示，兼及苏共报刊史。当时本书在京、沪等地图书馆是有收藏的，但不曾听到有人提起它。我最初接触该书约在上世纪 60 年代，只是匆匆翻阅一过，并不在意。

该书受到中国新闻史学界的关注，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并渐次升温。学者之间对该书的议论也时而出现了。但对该书的评介迄今仍停留在表层而未能深入开展，这是当前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今天，我们的研究工作还得从零开始，也就是说还得从基本的、感性认识起步。这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历史为我们留下的严重障碍。

当时，学界还缺乏突破这一障碍的推动力；相反，适应这一障碍的思

潮却不断滋生。各人情况不一，就我而言，一种可称之为狭隘的新闻史业务观念，成了主要的思想束缚。那时，对于《舆论史》这部历史名著我是知道的，可是作为一名中国新闻史专业的学者，所关注的只是这本书的知识、材料能直接对我有多大帮助。当看到该书的古代部分根本不重视我所要研究的古代官报、邸报；近现代报刊史料，则多摘自人所熟知的一些书刊，且不作考订，错误甚多；该书精粹所在，被认为是对国民党政府舆论专制政策之揭露，但又想新中国成立数十年了，这种揭露还会少吗，对该书的研究热情，也就随之淡化。由于这种心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常有机会会见海外华人文化名家，所谈甚广，得到诸多启发。惜独未曾就林语堂这一著作向他们请教，思之今犹怅怅。

这种狭隘的业务观念，其主要弊端，是急功近利，引导研究者只着意那些一眼看到的表面文章，而不去深思细想，开拓自己的研究空间；只关注本专业的知识，不去把握和其他（特别是相邻）学科之内在联系。

随后我国出现的研究林语堂热潮，也开始促使我对《舆论史》一书进行学理思考。我逐渐认定，即使在古代，舆论史与报刊史之内在制约关系仍会存在并展现其固有作用。我觉察到宋朝小报的出现，和当时不断发展的舆论斗争有密切关系。明代邸报对东林党的斗争则有着重要的影响。原来认为古代舆论史和新闻史无关的看法，实属浅见。关于近现代报刊史料，原来只看到缺少新的开拓，便加漠视。现在领悟到，其中不少史料的运用，别具新意，发人深省。

坦诚地说，我对本书之认真阅读，是在承担作序任务之后才开始的。这期间，研究中众多的矛盾不断在脑海中聚集，一些新的思路渐次活跃起

来，学科的研究空间大为扩展，形成了一些心得和体会。但不少问题，因知识浅薄，素养不足，尚不能认识清楚，差错也在所难免。有望同道诸公，不吝指教，共同努力。

至于林著对我国社会之影响，当大大超过上述两界。本书是我国第一部舆论史，也即第一部关于言论出版自由斗争的历史。其写作体裁是历史，可是其立足点却在当代，着眼于史鉴作用。这样，对本书之关注，当远不限于史学界，而是扩及于政治和思想文化广泛阶层了。

前面说过，严格地讲本书还不是一部学术性著作。可是现在又要强调，它是一部富有鲜明哲理性的著作，把我国历代舆论斗争的历史，看做一个具有内在联系、前后相承的统一体。一方面讲明不同朝代所呈现的差异性，但更着意的是揭示这些差异的共同性，即所谓同中见异，异中求同，把探求客观运行规律放在第一位。这种共性、即规律性的表述，方方面面，泛见于全书，还常将其化解为多样精辟的箴言，以昭示后人。这正是本书一再强调的史鉴作用精神所在，值得宏观考察，细想深思。

本书对我们思想文化界，无疑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应当受到尊重。当然也要看到，它的写作时间距今已七十多年，其时代局限和作者个人思想局限自所难免。书中确有某些偏颇不周的表现。但是瑕不掩瑜，不影响本书总体的重要价值。

翻译工作

开头我曾说过，在译者译毕全书，邀我为之写序时，“不禁心为之

动”。这就是说，对翻译这本书的重要意义，当时已是有所领悟了。

写“序”的过程，也就是我对该书不断学习和钻研的过程。在对该书所潜存的广泛影响的认识深化以后，对翻译出版本书的意义的理解，也就比原先大大提升了。而触发我这一感悟的，主要是我深深认识到，要使本书的社会意义充分展现，必须依托良好的读者群体。可是这一基础性需求，却又和当前社会条件产生两大矛盾。

首先是书本资源的短缺。试想，1936年上海英商出版本书只是一次性印行，且是冷门，估计还是国民党统治区的禁书，所以印数不会很多（具体数字不悉）。数十年来，战火飞扬，风风雨雨，于今有幸留存下来的会有多少，自可想见。现在“我国大专院校所设新闻教育单位已有600多个”^[45]，其中藏有本著者能有几个？！

其次是有关学者英文水平不能适应要求。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学校教育对英文很不重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能畅读英文学术论著的，可说是凤毛麟角。如今情况已有很大变化，形势越来越好。但是，未能畅读的人料想仍然居于多数。

本书的翻译出版，正好突破上述两大矛盾，顺应了我国学界多方面要求。译者的翻译始于2002年6月，在当时堪称创举，功不可没。

现在想着重谈谈本书翻译工作的成就和有关的问题。译者在“附言”中，表示“信、达、雅”是他着意追求达到的理想境界（“信”是最低要求，也就是最基本的、须全力争取达到的要求）。他为此广询博览，刻苦耕耘，字斟句酌，积四年之久译出初稿，还特邀陈玉申教授和冯克利先生细心审阅，译文可信度甚高，文笔畅达，深入浅出，堪称佳作。

使我深受感触的，是发觉活跃在译者脑海中的，不只是上述“译者思维”，同时还有一种很强的“学者思维”。就是说，他所关注的已不只是自己译文的质量，而是兼及林氏原著的知识分量和社会影响等方面问题了。

首先是考察史实真伪问题。译者对书中很多事实总要精心查核，辨其真伪是非。经他纠正的原书错误，多达一百余处。其中有一部分，是参考前人成果而获得的，但在这里也当是一种求真精神和扎实知识根底的表现。我所要强调的一点是，译者力求从第一手原始史料中辨认事实，书中许多差错就是这样被揭示出来的。例如，原著称书中所载“奇形怪状广告”示意图，是根据某日《申报》版面制作的。译者追踪找出该日《申报》对照，发现“所附示意图图版颠倒，顺序也发生错误”^[46]。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实例。

再就是对书中疑难问题的解读。本书跨越古今中西文化，“阅读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译者把对该著的通畅解读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所写解说，多达百处以上。情况不一，字数简繁大有差别。不少只三言两语，点到即可。有的却长达数百字，而像“第四等级”一词，其解说已近千字了。这项工作，大大扩展和深化了读者对本书的认识、理解。

此外，译者还以不同的方式，就书中不同论题，介绍了一批重要的史实资源，以便读者对本书所涉一些问题进行查考，深入研读，这也是很有价值的。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现在再说明一下，上述译者对本书的“纠误”、“解读”等工作，均附列于本译著“注释”栏中。共列有304条，除去原著70条，由译者所写的竟达234条，堪称洋洋大观，在我的阅读生涯中是很少有的。这里，

正好展现译者那种“学者思维”所获的引人振奋的胜利。

宁树藩

2008年7月，上海

[1]见本书前言，第1页。

[2]同上。

[3]见本书前言，第2页。

[4]见本书前言，第5页。

[5]见本书第一编，第14页。

[6]见本书第189页。

[7]初版于1974年7月在台湾正中书局印行。

[8]据许晚成编《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1936年出版于上海）。该《调查录》被认为是当时较权威的一种。

[9]见本书第181页。

[10]见本书前言，第1页。

[11]据本书英文原著，介绍国民党统治时期还不到10年的篇幅，就占了49页，而介绍自1815年至1926年共计110年左右的近现代报刊史，只有54页。

[12]见本书第50页。

[13]见本书第189页。

[14]“林语堂自传”（二），载《逸经》杂志第19期。

[15]《语丝》停刊于1930年3月（林语堂在该刊发的最后一篇稿子是1929年12月23日），《奔流》停刊于1929年12月，《朝花周刊》停刊于1929年5月。

[16]《论语缘起》，1932年9月16日，第一卷第一期。

[17]同上。

[18]同上。

[19]同上。

[20]同上。

[21]余英时：“试论林语堂的海外著述”，载许明主编的《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出版。

[22]本文在叙述当年林语堂与原来一些老友关系变化过程时，是以鲁迅为标志性人物来说明。

[23]鲁迅：“《论语》一年”，载1933年9月16日《论语》半月刊。

[24]林语堂：《中国人·1939年版序》，学林出版社，1995年3月第4次印刷。

[25]如1934年在《民生报》案中对成舍我的判处，1935年“新生事件”中对杜重远的判处。

[26]见本书第181页。

[27]鲁迅1935年2月14日致吴渤信。

[28]据唐弢：“回忆鲁迅及三十年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载《鲁迅研究资料》（1），1976年10月内部发行。

[29]徐懋庸：“《太白》的停刊”，载《芒种》1935年10月5日第2卷第1期。

[30]鲁迅1935年3月23日致增田涉信。

[31]《史沫特莱文集》（一）第106页，新华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

[32]周劭：“三十年代有过一个‘杂志年’”，载《向晚漫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

[33]见本书第49页。

[34]同上注[21]。

[35]本人所知有限，会有疏漏，但认为其总的趋向是符合实际的。

[36]内称：“这个小官僚甚至还恐吓我说，在我回国时不让我下飞机。”据林语堂：《中国人·中日战争之我见》第365页，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

[37]参阅夏衍：“‘左联’六十年祭”，载《风雨故人情》第162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38]1936年9月同时发表于《文学》和《新认识》两刊。

[39]后编入1978年由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史》。

[40]作者张梁。

[41]陈望道：“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载入《鲁迅回忆录》（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1月出版。

[42]《陈望道先生纪念集·序言》，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

[43]吴中杰《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44]参见尼姆·威尔士（斯诺的前妻海伦·福斯特的笔名）：“现代中国文学运动”，载《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45]据项德生：“新闻教育的灵魂：同步思维的养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论集》第19辑。

[46]据本书第137页下方注释[1]。

中文版译自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by Lin Yutang,

Originally in English,

Published by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by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936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序（宁树藩）

第一章 前言 1

第一编 古代

第二章 中国古代新闻事业 13

第三章 古代歌谣 21

第四章 汉代的“党锢”和公共批评 31

第五章 魏晋时期舆论的凋零 43

第六章 宋朝的学生请愿 49

第七章 明朝的宦官、御史和东林党人 61

第二编 现代

第八章 现代报业的开创（1815—1895） 79

第九章 革命前的维新报业（1895—1911） 99

第十章 民国时期的报刊（1912— ） 118

第十一章 报界之现状 134

第十二章 当代期刊杂志 155

第十三章 检查制度 173

译者附言 188

第一章

前言

与许多古代国家的情况一样，中国的古人是毋庸读报的，因为那时还没有报纸。到 19 世纪中叶，中国才出现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报刊业，而报纸成为重要的独立商业机构，不过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直到现在，中国的新闻事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从专业角度来讲，不仅新闻的采集、发布与编排艺术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作为社会舆论的记录，至少从目前的表现看，它正在步某些现代西方独裁国家报业的后尘，走向堕落。

这样说，有出言过苛之嫌。然而泛泛谈论报业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能悬新闻自由之理想为鹄的，并以之为衡量新闻事业成败的标准，把新闻自由看做民主的真正基石：首先，它运用明智、公正的新闻选择、编辑、发布手段，向民众提供准确的消息；其次，它使社会舆论得以自由而不受限制地表达。报刊业是公众的耳目喉舌，影响着种种政治、社会事件的进程。我们的新闻事业离这个要求有多远？——我们所看重的是这些

问题，报纸的印刷和发行等技术问题因此就成为次要的了。受益于国民教育，这个国家有上亿人口可以阅读，每天消费一百万份充满着宣传和官方误导的报纸，没有一份可以表达受伤害者的感情，这样的国民有何开心可言？不管发行量有多大，除非人们在受到伤害时有喊叫出来的自由，否则谈论新闻自由就是笑话。这种喊痛的自由，现在只有动物世界才有，受到教化的人类却无缘享受了。^[1]

这里我要说明自己的论述范围。我只关心与舆论的力量有关的事实。从这样的事实里，我们可以看到，民主的种子在中国是如何从“仁政总是顺乎民意”的古老原则里发芽成长，时而欣欣向荣，时而遭喜怒无常的专制君王无情蹂躏的。在事件的表象下面，我感兴趣的，只是对中国民主发育有着潜在意义的事实——作为古老信条的“天听自我民听”，是如何从公元前12世纪就记载在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里*，后来又如何体现在仁政应当“言路畅通”**的原则里为大家接受的；此一原则是如何在实际政治中应用，民众是如何以血的代价来追求之、捍卫之，又是如何常常为权相压制的。换言之，我所感兴趣的，是作为民意与专制斗争史的中国新闻史。

* 参见《尚书·泰誓》。（* 为原文注释，[1]、[2]、[3]……为中译者添加的注释，下同，不再一一标明。）

** 直到明初，朝廷仍允许并鼓励没有入仕的普通士人向皇帝上书言事。

[1] 参见林语堂《谈言论自由》的相关论述：“我们须知，人类虽有其语言，却比禽兽不自由得多。萧伯纳过沪时说，惟一有价值的自由，是受压迫者喊痛之自由，及改造压迫环境之自由。我们所需要的，正是喊痛的自由，并非说话的自由。人类所说的话真不少，却很少能喊痛。因为人的语言已经过于纤巧曲折，所以少能直截了当表示我们本能的需要。”（《行素集》，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第124页。）

理论上，无论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国家，舆论与当权者总是有冲突的。然而这一点并非总能为人所认识。任何讲现实、明事理的政治哲学，都要把承认如下事实作为原则：治理一个国家，不管它是民主制、有限君主制还是绝对君主制，在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间，总是有着潜在的敌意。双方的这种敌对状态如同拔河：如果政府赢了，那人民肯定要输，反之亦然。若非如此，那么民主政治，连同它那整套既妨碍了自由，也妨碍了威权的繁琐程序的说辞，根本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绝对的君主政体，是政府只允许它自己拉住绳子的一端，而禁止人民去拉另一端的治理形式，其中的潜在敌意并没有因此消失。因此，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拔河游戏中，总是有公共批评的，不管是哪种政体。

中国老百姓跟全世界老百姓一样，认为眼前的政府是他们所能拥有的最差的政府；中国的朝廷则跟所有的西方政府一样，总以为它能独掌大局，憎恨来自外界的批评。它们总是声称为老百姓着想，可是并不想知道老百姓是怎样看它的。统治者真正需要的，是所有的老百姓都停止思想，像一群不会说话、没有头脑、唯命是从的动物，可以任由驱使，不管前方是牧场还是屠宰场。孔子即持这样的立场，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主革命的大潮到来后，有人想方设法把这一马基雅维利式的无耻格言解释成民主的说法，把孔子变成民主哲学家。这些人利用了断句与汉语文法中主动语和被动语的模糊之处，把这句话歪曲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不是孔夫子的本意。在统治手段上，孔子和所有统治者一样，认为政务对老百姓公开得越少越好。持这种观点的人会说：如果马儿有权利和骑师商量的话，就没法比赛了。想取得胜利，就必须用

鞭子！在这个世界上，墨索里尼、希特勒这样的骑师就是这样认为的。主张民主政府、议会制和公共新闻的人，只不过是在说，马儿可以同骑师讨价还价，偶尔也可以质疑骑师的动机和看法。自由的新闻业之所以总会让政府尴尬，原因即在于此。

但是，即便是在君主专制政体下，中国的马儿也一直在坚持同骑师对话。在以下数章，我们会看到，能够读写的公众尽管作用有限，却往往尽其可能地在允许的范围内批评政府。当局有时会害怕这种批评。由于完全缺乏宪法的保护，这种批评活动总是以宦官的镇压而告终。而当贪污横行、暴政肆虐、外敌入侵、外戚或宦官擅权时，批评又活跃起来，当然这时站出来表达民意的人会面临很大的个人危险。食不果腹者，想法最坚定，一个民族也是如此。这种对朝政的无畏批评书写了儒家士人历史上的光辉篇章，也足以动摇那种认为中国人骨子里就对公共事务冷漠的理论。另一方面，士人反对宦官，看来是基于既轻蔑又愤慨的感情。轻蔑的是，不通文墨、不男不女的阉人所拥有的权力，是利用皇后妃嫔的宠爱、统治者的放纵而取得的；愤慨的是，阉人篡权乱政，使文人失去了按传统本应属于他们的权力。这种基于性别与身份歧视的感情，加上国难当头的危机感，促使士人说出心里话。因此在中国的舆论与专制权力的斗争中，我们看到士大夫集团不断攻击阉党，却总为阉党所败，这种事情是相当古怪的。自人类记事始，太监及其朋党*一直充当着最好的审查官。

* 参见第七章。

官报始于汉代，起码可以追溯到耶稣纪元后 200 年，唐以后多少仍在继续发展。^[1]官报早在 8 世纪的唐明皇统治时期就有了，此后一直延续到清朝，主要刊登官员的任免、升迁消息，一般只在官员中流通。因此，它远未能成为民众的“耳目喉舌”，也不是舆论的载体。实事求是地评论官方新闻事业，也是本书所要做的事情之一。

无论如何，公共批评可比中国古代的定期官报要重要得多，因为这两者并不是始终共存的。只用古代的官报来研究中国古代的舆论是极不公正的。在中国，能读会写的人一直数量有限，普通人对时政并不是很关心；只要政不扰民，民亦不会操心于政。所以议政之事只限于有文化的人。但是读书人总有议政的倾向。在民族危亡之秋，会突然涌现出各种运动，组织有序，主张明确，有效地对朝政施加影响。这种议政者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后，不会把自己仅仅局限在朝政上，而是和舆论领袖的态度一样，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对准时代的主题。有时，这种批评是为了主持公道，就如法国知识分子卷入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2]

[1]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引《西汉会要》，大鸿胪属官有郡邸长丞，掌管各郡在京师设的“邸”。郡国都有邸，用以“通奏报”，即传播君臣间消息，认为这是“邸报之所由起”。现在的新闻史家认为汉朝的新闻传播活动和汉朝的“邸”，都与后来的“邸报”无关。参见朱传誉：《宋代新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第67页；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2页；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2] 1894年，法国军事当局称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1859—1935）出卖国防机密给德国，并判以终身苦役，后证明纯属诬告，当局却拒绝重审。起初公众支持定罪，排犹集团趁机宣扬。1896年后支持德雷福斯的人逐渐增加，以左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掀起一场要求释放他的群众运动，全国分成对立的两派，斗争极为激烈，并同反犹太主义、反教权主义和反共和主义等活动联系在一起。在舆论的压力下，德雷福斯1899年被特赦，1906年最终得到平反昭雪。

一样。

上述这种情景，当政府腐败不堪之时，或异族入侵的前夜，特别容易出现。无独有偶，在一支或数支外族势力征服中原前的三个时期，民意都得到了有组织的展示，并因不同的机缘，形成了大规模的运动。例如，东汉时期的“清议”和学生运动；南宋在为元朝军队所灭之前，金一直虎视于长江以北，这一时期，也有学生运动；最后一次是在满人入主中原的前夕，由于明季政治腐败，士大夫联合起来，以大无畏的精神，批评阉党陷国家于纲常废弛和混乱之中。看来，只要领导得法，或有民族危亡的刺激，潜伏于民族内部的民意的力量，就能够而且确实可以挺身而出，在逆境中抗争。

预测一下勇敢而诚实的新闻业在未来中国出现的可能性，特别是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影响下——如果这种制度没有给法西斯思想潮流嘲弄的话，不幸的是，这十年的事实恰好相反——这样的研究是很有意思的。上面提到的运动的问题，与西方现代新闻事业的问题是一样的。从这些运动中，既可看到中国批评家与政论家的正直和勇敢，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些出卖节操的人的无耻行径；朝廷则用同样的伎俩去对付他们，或恐吓，或暗杀，或行收买、招安的攻心之术，其所作所为与当代法西斯国家并无二致。这些运动的结局，和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处境，说到底表明了宪法保护公民权利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不管是有形的报刊，还是其他民意表达方式，只要能达致新闻事业的目标——为公众报道新闻，为国家的进步而引导舆论，本书将一视同仁。

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古代的舆论是如何表达的？文人学者是在何

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实践公共批评的？有何危险，贡献何在？朝廷又是如何害怕、嫉恨、利用、收买、腐化、操纵、哄骗、要挟、打击、谋杀他们的？文人学者又是如何对付朝廷这些威胁的？最后，舆论是如何被不时压制的？个人又何以安全地卖国而不会遭公众抵抗的？

中国古代的公共批评一般采取以下几种许可的形式。普通百姓碰到严重不公的事件，如遭遇横征暴敛、被无辜判处死刑，可以采取“宣告罢市”、“击登闻鼓^[1]”、“拦轿喊冤”等办法。罢市非常有效，通常会引来政府部门的调查，结果可能会使地方官受到处分或解职。士大夫阶层的公共批评通常来自官员或还没有做官的读书人。在中国政府理论的独特产物——官方那套相当令人好奇的监察制度中行使监察权的，是帝国的言官。这些言官中的大多数，有时会变成权势者的狗腿子或发言人，就像欧美有所谓“奴才报纸”一样。观察其中有多少正直的言官，敢于在没有宪法保护的条件下，面对革职、死亡，与权势为敌，是件有趣的事。^{*}令人好奇的是，在中国的政治理论中，言官对政府甚至皇帝个人的批评，虽然被视作必要的安排，但是他却没有个人豁免权。言官的勇敢靠的是道义感。爱惜名誉的皇帝，也许会避免惩罚或羞辱言官，但如果他想羞辱或杀死那些令人不愉快的言官，他是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事实上，言官是经常遭惩罚的。帝国的言官经常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忠于国家，当面向皇帝讲真话，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危及自家性命；要么三缄其口，保住乌纱帽，承认自己是窝囊废，自己的工作毫无用处。当然，如同当代的新闻界一

^{*} 详见第七章。

[1] 古时统治者在朝堂外悬鼓，让臣民击鼓上闻，以申冤抑，或陈谏议，称为登闻鼓。

样，朝廷的言官也会堕落为待价而沽的势力，报私怨的工具，或是用来打击收买过他们或暗中控制他们的政敌。就像当代新闻事业，它可以是好人的工具，也可以是坏人的工具。

在皇帝的言官和这种官方批评之外，士人充当着非官方批评家的角色。他们与现在的公共批评一样，真正代表老百姓的呼声。这种非官方的批评，有时以传抄宣传册子、在街头张贴揭帖等形式出现；民族危亡之秋，当非官方的批评成为全民运动时，普通士人或虽已入仕却非言官的士大夫，经常会义不容辞地向皇帝联名上书，有时会有几百人。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会看到，士大夫是如何击登闻鼓，如何联合起来到宫门口请愿的。这些非官方的批评，通常会变成席卷数百名士大夫的群众运动。有些运动是针对特定个人的，例如明朝灭亡那年的阮大铖事件^[1]，数百名士大夫张写揭帖*，把这名阉党余孽赶出南京，迫使他潜迹城外。接下来的几章，我们会接着讨论这样的既非偶然、也并非无关宏旨的事件。东汉、宋、明三个朝代，成批的士大夫和太学生（有一次超过了3000人）勇敢地站出来批评政府或皇室成员，前赴后继，介入当时的政治，这些行动直接导致

* 《留都防乱公揭》。

[1] 明亡于1644年，对阮大铖的公开声讨，发生在崇祯十一年，即1638年。

了内阁的多次更易。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第四等级。^[1]

整体上看，或许可以这样说，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由士大夫阶级践履不绝的公共批评的潮流，只不过这样的事实不为中国新闻与舆论史专业的学生所知罢了。

[1] Fourth Estate, 指新闻界及其政治影响。源出 18 世纪的英国。英国早期议会均有三个等级（贵族、僧侣、平民）的代表。1772 年，英国记者经过多年争取，获得国会旁听权，可以公开报道议员的发言和辩论，记者地位有所提高。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在 1839 年出版的《英雄和英雄崇拜》中，引用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的话说：“在议会有三个等级，但是在记者席上坐着一个第四等级，它比那三个等级加起来还要重要。”由于卡莱尔的引用，一般认为这个词是伯克创造的。但词源学家在伯克的著作中没有发现这句话，他们认为，卡莱尔记错了，他指的应该是麦考利男爵（Lord Macaulay），后者在 1828 年曾说：“旁听席上的那群记者已经成为第四等级了。”《牛津英语大词典》指出，布鲁厄姆男爵（Lord Brougham, 1778—1868）早在 1823 年就在下议院用这个词来指代新闻界了。语言学家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认为，这个词的创造者是小品文作家威廉·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 1778—1830），他在 1821 年出版的《燕谈录》中，使用了这个词。

在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提出，自由报刊应是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美国政治家道·凯特还提出，新闻机构应是与行政、立法、司法并存的“政府的第四个部门”。已故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 1915—1985）于 1974 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第四权理论”（the Fourth Estate theory），他认为宪法所以保障新闻自由的目的，就在保障一个有组织的新闻传播媒体，使其能成为政府三权之外的第四权，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参见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台湾月旦出版有限公司，1993 年，第 72 页。）

1980 年，埃及总统萨达特提出要把新闻机构建成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机构”，埃及宪法作了相关的规定。

“第四等级”的概念在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最初被译为“第四种族”。（参见陈玉申：《晚清报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年，第 136 页。）

第一編

古代

第二章

中国古代新闻事业

前面已经提到，严格说来，不能把中国的邸报等同于当代报刊。关于邸报还有很多可谈的东西。邸报确实是新闻发布的机关，至少从公元 10 世纪，就开始以定期出版的形式出现了。邸报报道的新闻，主要包括朝廷的近期活动、任免官吏的敕令、封疆大吏和卿相的奏章。有些敕令，尤其是官员的奏章，包含了当时的士大夫对重大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深思熟虑之见，博洽多闻，堪称宏论。这样的特性，使我们既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的新闻事件，也可以看到在重大问题上的意见和批评。有些邸报是半官方的，晚近也有私人商业组织开始出版销售，从中牟利。正缘于此，一般认为，邸报就是中国古代的新闻事业。

另一方面，邸报亦有其局限。在早期，它只是地方官员派驻京师的代表给上司发回的新闻信。直到 19 世纪，这种信一般只以手抄的形式流传。竟然有一份 8 世纪印刷的邸报流传至今，这真让人难以置信。这份保

存至今的早期印刷邸报的样本之一——《开元杂报》，出版于唐明皇开元年间（713—741）。* 尽管有不少学者企图说服我们，邸报在很早就开始印刷了，但由于主要是用泥版印刷的，墨迹不清，反不如抄写的容易辨认，所以大家更喜欢抄写。邸报的第二个重大缺陷是，它的读者基本只限于缙绅阶层，这就决定了其新闻的特性是只为官僚而非普通民众的利益服务的。它的新闻的性质因而是官方的，而非社会的。总的说来，邸报有与一般的官方布告类似的内容。偶尔有一点有关社会状况的新闻，也是次要的。中国社会的特质使我们无法对邸报的内容有更多的期待。囿于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公共新闻事业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我估计士林中还是有为数不少的人，他们虽然没有任事于庙堂，却惦记着朝廷的作为，就像当代的《每日邮报》^[1]的读者急于了解上流社会的动态——霍利根女伯爵（Countess Halligan）在秋季马术大赛上穿的是什么样的男式长礼服？出席霍华德夫人（Lady Howard）茶会的有哪些人——一样。

在这样的前提下，或许可以说，中国古代有新闻事业，然而却谈不上有多重要。

跟所有国家一样，中国在没有文字新闻之前，就有了“口头新闻”。如果把“口头新闻”也算做“新闻”的话，那我们要说，中国的新闻事业产生于歌谣，而非散文。这些以讽刺诗和民谣形式出现的歌谣，记录了时

* 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2页。译者按：《开元杂报》是印刷品的说法，不可信。详见朱传誉：“从‘开元杂报’谈起”，《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

[1] *Daily Mail*，英国小报，创办于1896年，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份日销量突破100万份的报纸。

人对重大事件的看法，很多保存到了今天。歌谣作为公共批评的有效武器，比新闻更能反映民意，我们会在以后的章节中提到它。

通常认为，形诸文字的新闻事业，多少可以从公元前 8 世纪的《春秋》算起。孔子的《春秋》并不是这类书中的惟一一种。每年春秋两季，政府都会派官员周游全国，采访新闻，这在史书中是有确切记载的。《左传》说，天子为了解国家情况，每年正月使道人（相当于现代的邮差）周游全国。刘歆（公元前后）《与扬雄书》、应劭（公元 2 世纪）在《风俗通义》自序中都曾提到，周秦两代的官方信使在八月份巡游全国，搜访方言、歌戏和民谣。^[1]乐官把这些歌戏和民谣演奏给天子，天子借此了解民风民情，看来已成为习俗。春秋两季这些采访新闻的旅行，产生了中国官方历史的最早形式，这就是著名的《春秋》，不仅孔子出生的鲁国有《春秋》，除了晋国和楚国外（这两个国家的官方历史有别的名字）^[2]，其他国家也有《春秋》。从墨子（前 501—前 416）下面的话里，可以看出这些文献在搜集要闻上的价值：

杜伯之鬼，射杀周宣王，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庄子仪之鬼，荷朱杖击燕简公，燕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燕之《春秋》；侏子敲牯观辜，殪之坛上，宋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宋之《春秋》；羊触中里徼*，殪之盟所，

* 一种古老的审判方式，以羊触者为有罪。古文“法”字中，含有一种兽的字形。

[1] 刘歆《与扬雄书》：“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道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应劭《风俗通义》：“周秦以岁八月，遣轺轩之使，采异代方言，还奏之，永藏秘室。”

[2] 晋史名“乘”，楚史名“檮杌”。

齐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齐之《春秋》。^[1]

由此可以认为，《春秋》就是早期官方新闻采集活动的产物。不过，它的搜集采纳和史官的保管，主要是从维护统治者利益的角度出发的。应当把这些记载看做中国史学的雏形，而非新闻事业之嚆矢。这里需要提到的还有统治者在重大仪式上发表的文告，这些文告有时会铭刻在青铜器皿上。其复本，作为《尚书》中独立的一章，流传至今。《尚书》是儒家五经中最古老的一本，收入了大量统治者为治水、不断的迁都、讨伐逆命而对人民的告谕（诰）。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新闻事业，或者说“京师公报”，是邸报。邸报起初只是私人通信，由地方派驻京师的代表发回地方，这种方式有点儿像美国各州驻华盛顿的特派通讯员向州报发回消息。惟一的区别在于，前者发回的消息只供派出他的王侯将相之流阅读，不像后者那样，是面向公众的。邸，“属国舍也”，又指王公贵族在京师的宅第。报，意为“报告”。中国官方公报的兴起，与郡国设立驻京师办事机构的制度密不可分。“邸”这个词，最早在西汉出现，一般解作“主诸郡之邸在京师者也，按郡国皆有邸，所以通奏报，待朝宿也”。朝廷的命令可以通过这个媒介传达给地方官员；反过来，地方官员的奏章也可由此转达给朝廷。几乎所有边疆省份的主要王公贵族和将领都有自己常驻京师的代表。朝廷承认了这样的制度，并设立了专门机构，负责向这些代表传达命令。

[1] 《墨子·明鬼下》，林语堂在引用时有节略。

中国的官方公报，即发端于这一制度。到唐朝时，王公贵族或藩镇将领很有实力，管辖的区域很大，大致和现在的一个省相当。这些王公贵族，各有从长安打探消息的渠道，邮务制度因此有了很大的发展。朝廷设进奏院，专门负责转呈官员的奏章、传达帝国的命令。摸清朝廷的动向，事关这些王公贵族的自身利益。宋朝（10—12 世纪）保留了进奏院，连名字也没变。这时它已成为重要机构，定期出版新闻刊物，在士人中大量发行。在明朝，这个机构改称为通政司。

上述这种京师通信，在汉朝（前 206—公元 220）并没有文献直接提到。想来，邸报正是以手写新闻信的形式，起源于这个时期的。我们可以为这个设想找一些旁证。这时，不但已有了邮务制度，而且出现了极有效率的邮驿制度（在中华帝国大扩张的汉武帝时期）。前朝秦始皇时，为了军事需要，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军事公路^[1]和驿站系统，每隔十里设一个驿站。汉朝进一步完善了邮驿制度，每隔 30 里设一个固定的驿站，驿站内有传舍，可供歇宿，有驿马和配备一匹到七匹马的传车，可供交通，还有依靠步行投递的驿卒。^[2]到了唐朝，帝国的驿道上共有陆驿 1297 所，水驿 267 所，兼水陆者 86 所。对驿卒的行程也有明确的时间规定，陆驿的平均速度每天 300 里；遇有紧急命令，如特赦，速度可能会提到每天 500 里。水驿传送亦有一定之规，由于船有逆流顺流之别，这些规定理所当然地考虑到了其中的差别。

邸报一词，至唐朝始有文献明确提及。邸报后来又有边报、朝报、驿

[1] 即“驰道”。

[2] 汉时，用车传送称“传”，用马传送称“驿”，步递称“邮”。三种称呼常通用，也称为“置”。

报等称呼。当时的士人在笔记里提到了这些官方公报。其中最出名的是唐明皇开元年间（713—741）的《开元杂报》。9世纪后期的著名学者孙樵在笔记里写道，他得到关于朝廷活动的十来页手抄稿，起初以为其中所述是近来朝廷的动向，但又有点疑惑，因为与当时情况多有不合。朋友告诉他，这些手抄稿记载的是开元年间的事情。孙樵后来找到开元年间的一份官方记录，一些细节竟跟这些手抄稿完全吻合。^{*} 这些手抄稿，就是《中国雕板源流考》的作者认定的仅存于世的两件唐朝印刷品中的一件，《开元杂报》的抄本^[1]：

近有江陵杨氏藏《开元杂报》七叶，云是唐人雕本，叶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而无中缝，犹唐人写本款式，做蝴蝶装^[2]，墨影漫漶，不甚可辨。

有记载表明，到了韩翃^[3]生活的时代，邸报的流传已经很广了。韩翃的友人说，韩翃得到了朝廷的任命。韩翃表示怀疑。友人说，这是从邸报上看到的：“邸报，制造阙人，中书两进君名，不从，又请之。”此时大概是公元780年。由此可以确信，公元8世纪就有邸报了。应当认为，随着二十多所进奏院在唐朝的设立，邸报就从新闻信成为定期的官方公报了，这是个阶段性的跨越。

^{*} 孙樵：《经纬集》第三卷，第9页。转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8页。

[1] 参见第14页注^{*}。

[2] 一种把很长的纸张左右折叠成书的装订法。

[3] 韩翃，唐诗人。天宝进士，后数入节度幕府中任职，官至中书舍人。约卒于建中贞元之际。大历十才子之一。

邸报在宋朝文坛颇为流行。宋初政清人和，士人性喜闲谈。苏东坡有一首诗，说无所事事时，他喜欢“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表明他读邸报，就像现在人读晚报一样平常。这个时期的很多笔记、尺牍和士人传记中，都有官方公报的记载。阅读新闻，看来已蔚然成风，而且报纸还不止一种。经常刊登小道消息的小报的出现，可以看出大家对新鲜消息的渴求。例如，《宋史·刘奉世传》记载：“熙宁三年（1070），初置枢密院。诸房检详文字……先是，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而邸吏辄先期报下，或矫为家书以入邮置。”《朝野类要》提到了当时的几种报纸：

边报，系沿边州郡，列日具干事人探报平安事宜，实封申尚书省枢密院。朝报*，日出事宜也。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

生活在公元1160年前后的周麟之，在奏章里向皇帝陈情，要求查禁传播小道消息的小报，从侧面证明了大家对新闻的渴求。周麟之的奏章读来十分有趣：

方陛下颁诏旨，布命令，雷厉风飞之时，不无小人诤张之说，眩惑群听。如前日所谓召用旧臣者，浮言胥动，莫知从来。臣尝究其然

* 大政治家王安石（1021—1086）曾诋毁《春秋》为“断烂朝报”，虽然只是一个比喻，却能说明在他生活的年代朝报的流行。

矣，此皆私得之小报。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未知，邸吏必竟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被召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郡间得之，则曰：“小报已到矣！”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耶，则事涉不密；其不然耶，则何以取信？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诏有司，严立罪赏，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播之天下，天下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一。*

这里可以看到，伴随着中国新闻事业的第一次大发展，书报审查和官方取缔制度也开始了。吕溱曾抗议朝廷封锁军事消息。他的传记中记载：“依智高寇岭南，诏奏邸毋得辄报。溱言，一方有警，使诸道闻之，共得为备。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有记载表明，明朝的出版审查很严厉，在吏治腐败，官员大批升迁、解职或遭杀害之时，尤其严重。对此，当然是老百姓知道得越少对官方越有利。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和当代国家的治理者并无不同。

由宋朝开始的正式的邸报大发展，在此后的朝代里得以无间断地延续下去，直到19世纪，现代报刊和现代新闻事业取代了邸报。**从明朝到清朝，京城的邸报成为中国仅有的读者群——士人——惟一正式和基本的消息来源。

* 周麟之：《海陵集》第四卷，第2页，“论禁小报”。

** 有关现代新闻事业的详细介绍，参看第八章开头部分。

第三章

古代歌谣

远在定期出版物之前，公共批评还有一些早期形式。^[1]像文学作品一样，口头创作的公共批评要比形诸文字的早，以诗的形式出现的公共批评要比以散文形式出现得早。以歌谣、讽刺诗形式出现的政治时评，形成时间早，也很重要，故我们专列一章来讨论。事实上，由孔夫子编订的《诗经》就包含了大量讽刺诗。《诗经》的第一部分，叫做“国风”，兼具风土之音与讽喻教化之义，里面大多数是讽刺诗。除了《诗经》以外，流传至今的诗歌里也保存了大量时事评论材料。

首先要提到的有趣的事实是，在批评统治者方面，中国人丝毫不比西方人逊色。这一点很少有人怀疑。中国人之所以能成为政府的批评者，是因为他们对大部分官员始终极其挑剔。表面上看来，人民是安分守己地服

[1] 原文为：The earliest forms of public criticism long antidated the periodical press. “antidated” 当为 “antedated” 之误。

从统治者的。因而我们往往忽视了他们心中对政府的批评。然而任何审查制度或专政王权都不能阻止这种批评。我想，歌谣和讽刺诗的产生盖类乎此。前面已提到，中国人很关心政治，这样做，就不可能不评论他们，准确地说，这就是闲谈（gossip）。数量惊人的政治闲谈，在中国从未形诸文字，直至今天，官方也不愿此类言论出版。但这些茶馆、密室里的言论，使一切官方审查制度徒为具文。只要有佳言隽语，或者切中肯綮的评论，大家定会口口相传，使其传诵一时。如有令人茅塞顿开之警句，或语涉双关之妙句、令人难忘之韵律，就能在统治者身后，得以不朽。

直到今天，民间还有很多口耳相传的歌谣。可见批评政府的传统，历三千年而未绝，这样的看法并不是作者毫无根据的想像。例如，据我个人的观察，此间有很多针对国民党的警句隽语，就我所知，没人胆敢刊行，然而却能口耳相传，引起会心的微笑或哈哈大笑，其生命，注定要比当代的书刊长久。不久的将来，现在的统治者去世后，这些诗句肯定会在学者的笔记里保存下来。这些易记难忘的句子，有时会成为对政府的毁灭性的批评，短短几句话，却胜过最有才华的作家执笔的最好的社论。这些光辉而不朽的诗句，自然天成而富有生命力，肯定早就在某些地方流传着了，直到有人发现了它，并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因此，这些诗句以稍为复杂的文学形式流传下来。它能世代传诵、历数千年而不衰，原因即在于此。这些歌谣充满了恨意，经过审查的冠冕堂皇的报刊社论，通常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这类明确含有批评时事之意的讽刺诗，《诗经》中多得不胜枚举。这里只需说明，这些诗的讽刺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举例来说，著名

的《七月》一诗就远不止是一首由妇女演唱的叙述农人四季生活的民歌，而是包含着对统治阶级（地主）和劳役制的非常明确的控诉。仅《左传》一书，就记载了数十首这样的歌谣，一般通称为《舆人诵》——意为“平民之歌”，有时特指某地或某个行业的歌谣；还有童谣及泥瓦匠在工作时唱的歌。这些诗歌，从1行到12行不等，押韵顺口，由普通人演唱，一般难以确认原作者，但在某些特定时期，如东汉年间，可以轻易地知道作者属于哪个党派或集团。

这些歌谣的另一个特征是，它与中国人的迷信掺杂在一起，民众认为它有预言功能，扮演着神秘的角色。汉朝时尤其如此。当时的统治者看来特别迷信，总是从各种神示中寻求“天象”，这时，谋臣会趁机向统治者征引歌谣。有些民谣佯称预见到了未然之事，但我怀疑其中不少写于事发之后，在百姓中传唱，表达了民众对这些事件的感情（下文所引关于秦始皇的歌谣，即属此类），《汉书·五行志》中，保存了大量的这种类似神谕和其他超自然现象的歌谣（或像歌谣的韵文）。所有这些歌谣和类似的讽刺诗，都收在《古乐苑》中的《杂歌谣辞》里（第42—49卷）。由于这些材料的丰富性和以这种形式出现的民众言论的连续性，在考察中国的舆论时，给予其粗略的一瞥是有道理的。

这种歌曲的讽刺特性，在下面的例子中可见一斑。例如，楚王为秦国所骗，死在秦国，楚人十分愤怒，他们在下面的诗文里，发誓找这个邻国复仇：

楚虽三户，

亡秦必楚！

接下来的两首歌谣，有趣地反映了舆论的转向。公元前6世纪，子产在他的国家推行了一场社会主义倾向的改革（这样说有点儿名不副实），下面的第一首歌谣，出现在子产施政的第一年，第二首出现在三年后，这时，大家已坚信新政的好处了。第一首是这样的：

取我衣冠而褚之，
取我田畴而伍之。
孰杀子产，
吾其与之。

三年后，大家又这样唱道：

我有子弟，
子产诲之；
我有田畴，
子产殖之；
子产而死，
谁其嗣之。^[1]

从下面的两首歌谣里，可以看出舆论对劳民伤财、修建万里长城的秦

[1] 林语堂在把这些歌谣译成英文时，大概是出于照顾韵律的需要，略有变通。这里把这些歌谣复原了。

始皇的愤懑。人们相信，这些歌谣预言了秦始皇死于沙丘。其实不过是老百姓得知暴君之死的消息后，表达兴奋心情的办法罢了。人们相信，秦始皇之死是天意。就像恺撒遇刺^[1]事件一样，这些歌谣于是就有了耸人听闻的效果。

秦始皇，何强梁！
 开吾户，据吾床，
 饮吾酒，唾吾浆，
 飧吾饭，以为粮；
 张吾弓，射东墙。
 前至沙丘当灭亡！^[2]

诗中所言“射东墙”，指的是这样的传说：如果秦始皇敢毁坏孔府，藏在孔府东墙里的弓箭会把他射杀。这诗的另一个版本是：

不知何男子，
 自谓秦始皇。
 上我之堂，
 据我之床。

[1] 恺撒被刺杀前，占卜师预测到3月15日这天有危险。

[2] 《古谣谚》卷六六引《异苑》：“始皇既坑儒焚典，乃发孔子墓，欲取诸经传，圻既启，于是悉如谣者之言。又言谣文刊在冢壁，政甚恶之。乃远沙丘而循别路，见一群小儿辇沙为阜，问云沙丘，从此得病。”

颠倒我衣裳，
至沙丘而亡。

秦始皇时期，舆论受到摧残，法律规定“偶语”或“腹诽”可以判处死刑。知道这样的背景，诗歌最后一句对压抑时代的民众的巨大影响，就可以想见了。

这种在暴君死后才表达出来的舆论，对当时的政治可能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如果这种针对帝王的嘲弄性的批评游戏一直继续下去，并形成传统的话，就像我们在中国看到的那样，可能会对所有爱好名誉的统治者形成威慑性的影响。惟一不能让专权者满意的就是独裁者也是人，是人就难逃一死，这真让人沮丧。国民总能活过他们的独裁者。在中国，暴君在生前有多少虚假的光环和魅力，死后就有多少难堪和狼狈。宣扬他私生活中的所有不道德行为和艳闻的歌谣、小说，都在他死后出现了，士人争相传诵，茶馆里的老百姓也从说书人嘴里听得津津有味。与当代新闻事业比起来，这可能是徒劳无益的，但事实上却有助于使想成为暴君的人在滥用其权力对付老百姓时有所畏惧。举例言之，大卖国贼秦桧尽管在生前十分成功地钳制了舆论，但他在民众心里永远是可耻的，在小说和戏曲里也是如此。直到今天，提起秦桧，老百姓仍然十分愤怒。演员在戏中扮演秦桧，有挨臭鸡蛋打的危险。在杭州，秦桧夫妇的铁像，像犯人一样跪在被他们谋杀的爱国将领岳飞墓前，1000年来，游人不时以唾沫和尿液侮辱之。我倾向于认为，此种民意并非全然没有效果。人可能因为怕下地狱而做好人，也可能因为害怕身后的坏名

声而做好人。

遭到这样批评的，不光有死去的统治者，还有活着的统治者和当前的政治活动。东汉灵帝时期（168—189），有一首歌谣讽刺当时的当政者，对兵役表示抗议，把自大、虚荣的官员比作城墙上的乌鸦，它是这样开头的：

城上乌，尾毕逋。
公为吏，子为徒。
一徒死，百乘车。

接下来，歌谣里提到灵帝登基之后，其母喜好聚敛之事。歌谣在最后特别指出舆论受到钳制。当时有这样的传统，百姓可以采用击登闻鼓的方式，直接向统治者表达意见，可负其责的大臣已成为皇帝的傀儡，百姓遂不敢行使这一权利：

车班班，入河间。
河间媼女工数钱，
以钱为室金为堂。
石上慊慊舂黄粱。
梁下有悬鼓，

我欲击之丞卿怒。^[1]

有理由认为，这首歌谣是由反对后党的士人写的，当时，士人正大规模地发起对统治集团的批评（此点会在下面的章节里提到）。作这样的假设，是因为在顺帝时期（126—144）、桓帝时期（147—167）和灵帝时期（168—189），这类歌谣非同一般地丰富，其中直接或间接提到了这场运动中的许多著名人物。这从下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皇后之兄梁冀掌握朝廷大权时，反对派的杰出领袖、耿直的士人李固死于狱中，外戚集团的一名官僚却升为王侯。歌谣写道：

直如弦，死道边。

曲如钩，反封侯。^[2]

而且，所有卷进议政运动的士人都在歌谣中有所体现。这些歌谣在当时的太学生中流传，人称“太学谣”，据说有3万首之多，在批评朝廷方

[1]《后汉书》卷一一三《五行志》：“‘城上乌，尾毕逋’者，处高利独食，不与下共，谓人主多聚敛也。‘公为吏，子为徒’者，言蛮夷将畔逆，父既为军吏，其子又为卒徒往击之也。‘一徒死，百乘车’者，言前一人往讨胡既死矣，后又遣百乘车往。‘车班班，入河间’者，言桓帝将崩，乘舆班班入河间迎灵帝也。‘河间媼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者，灵帝既立，其母永乐太后好聚金以为堂也。‘石上慊慊舂黄粱’者，言永乐虽积金钱，慊慊常苦不足，使人舂黄粱而食之也。‘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者，言永乐主教灵帝，使卖官受钱，所禄非其人，天下忠笃之士怨望，欲击悬鼓以求见，丞卿主鼓者，亦复谄顺，怒而止我也。”

[2]《后汉书》卷一一三《五行志》：“案顺帝即世，孝质短祚，大将军梁冀贪树疏幼，以为己功，专国号令，以贍其私。太尉李固以为清河王雅性聪明，敦诗悦礼，加又属亲，立长则顺，置善则固。而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征蠡吾侯，遂即至尊。固是月幽毙于狱，暴尸道路，而太尉胡广封安乐乡侯、司徒赵戒厨亭侯、司空袁汤安国亭侯云。”

面有很积极的作用。根据其能力和影响，太学生给杰出士人领袖立了不同称号，如“三君”、“八俊”之类，用诗歌来赞扬其品行。必须承认，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公共批评运动中，歌谣作为舆论的有力武器十分流行，并得到广泛的应用。

自然，也有许多歌谣是批评社会现象的，有的还颇有幽默感。耶稣时代，在中国是王莽统治时期，有一个将军叫隗嚣，于混乱中控制了一块疆土，但野心太大，想当皇帝，结果被击败。碰巧他是个瘸子，于是有了这样一首诗歌，记载了大家对这位做皇帝梦的失败将军的嘲笑：

出吴门，望缙群。
见一蹇人，言欲上天；
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1]

《后汉书》引用了那时的另一首歌谣，完全是关于妇女时尚的：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2]

[1] 《后汉书》卷一一三《五行志》云：“隗嚣初起兵于天水，后意稍广，欲为天子，遂破灭，嚣少病蹇。吴门，冀郭门名也。缙群，山名也。”

[2]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

这首歌谣大约在公元元年左右流行。

从这时期的这些歌谣，我们谈到了东汉时期的第一次有组织的舆论表达，接下来的章节会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第四章

汉代的“党锢”和公共批评

中国舆论史的这一章所要讲述的是舆论和皇权之间第一次出现了有组织的对抗。尽管没有机械化的印刷业相助，但东汉时的舆论表达之有力，是后来的朝代无法超越的。在士人与腐败势力的殊死搏斗中，舆论得到了一次极其罕见、令人怜悯而崇敬的运用，引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太学生运动”（以后会在宋朝、明朝和当下重演），有效地抑制了宦官权力的坐大，把对汉王朝的最后清算至少延长了数十年。这是以巨大的成本和士大夫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遇害士人数百位，他们的亲属都被流放或处决，牵连的官员或遭监禁，或遭流放，总数有上千人之多，还有上千名太学生遭到监禁；它引发了两次政变，第二次政变致使宫中大火，两千名宦官被处决，事实上导致了汉朝的灭亡。

这样的研究，其价值在于，它从侧面表明了士人的骨气，在有人带头或适当的组织下，他们会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站出来伸张正义。本章和以

下几章会讲述范滂、李膺、陈东、杨继盛等人的英雄气概和冒死进谏的事迹。这些无所畏惧的灵魂，使民主成为可能。由于没有任何制度性保护，后起的这类运动，即舆论的浪潮最终都失败了。这表明，除非士子与文人获得制度性保护，否则就不可能有常规化的、稳定的舆论力量。把这些故事一路读下来，你就会明白：公众对国家事务的普遍冷漠是公民权利缺乏保障的自然结果，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护自己。放在这种天然的历史背景下，公众冷漠这种特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诸如此类，构成了中国新闻舆论的历史。这一章只能提供这一运动的精彩片段，尽管它提供了充足的饶有兴味的材料，本身就可以成为独立研究的对象。

这场非同寻常的冲突，延续了几十年，影响长达百年之久。这里有必要为导致这场冲突事件的两条主线勾画一个简单的轮廓。一方面，政治上，宦官和外戚篡了权，随之而来的是官员腐败、暴政肆虐、人民普遍受到压迫；另一方面，很多士人和太学生受个人英雄主义与侠义精神的鼓舞，政治热情高涨。这两股势力的冲突，难免导致敢言的士人与朝廷的对抗，运动愈演愈烈，自然会产生内讧和牢狱之灾。后来有心怀不满的儒生指责说，这些不知畏惧的士人应当为汉朝的衰亡负责。这种观点很不公平。正相反，这些士人延长了汉王室的统治，汉朝的覆亡和士人的失败应该归咎于当时的政府缺乏民主机制。

简言之，东汉政治上出现的问题，纯粹出于生物学上的原因：皇室血脉越来越衰弱。东汉统治者大多短寿，后继乏人，宦官和外戚的专权即因此而起并导致暴政。所谓的东汉时期，即以皇室中较远的一脉复承帝祚

始。此前，因成帝、哀帝和平帝没有子嗣，王朝实际上一度垮台，国脉断绝。整个东汉时期，除了第一个皇帝光武帝（25—57年在位）外，其余的后继者多不长寿。

章帝（76—88） ^[1]	崩于 33 岁
和帝（89—105）	崩于 27 岁
殇帝（106）	殁于 2 岁
安帝（107—125）	崩于 32 岁
顺帝（126—144）	崩于 30 岁
冲帝（145）	殁于 2 岁
质帝（146）	殁于 8 岁
桓帝（147—167）	崩于 36 岁
灵帝（168—189）	崩于 34 岁

东汉末期的三个皇帝，又相继没有留下子嗣，好几位统治者都出自皇室旁支。由于皇帝的短命，其后继者年龄很小便位登大宝，如殇帝即位时生仅百余日，冲帝即位时才两岁，质帝即位时 8 岁，桓帝即位时 15 岁，灵帝即位时 12 岁。由于皇帝多年幼孩稚，大权自然而然地落到皇太后手里。加上这一时期的皇帝往往对文臣或武将极端猜忌，把朝廷权力集中到内廷，情况就进一步恶化了。*

*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东汉诸帝多不永年”、“东汉多母后临朝外藩入继”条。

[1] 括号中为在位时间。

于是就有了6位相继而起的强有力的皇太后：窦太后、邓太后、阎太后、梁太后、另一位窦太后、何太后。整个东汉时期，她们是实际上的统治者。皇太后掌权，自然得用自家人，太后的兄弟、侄子或外甥总揽了大权，太后主要通过他们来应付整个官僚集团。外戚、宦官和朝官有时会和衷共济，但有时宦官们也会联合起来对付外戚。如桓帝时期，年轻的皇帝想夺回对朝廷的控制权，迫于形势，他不得不联合心怀不满的宦官，在其帮助下处决或监禁太后的党徒。宦官就这样取得桓帝授予的大权和荣誉。宫廷阴谋，皇帝宝座不稳，接连缺乏子嗣继承皇位，宦官、太后和年轻皇帝的叔舅的斗争……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见到的只是一团混乱，还有，五分之四的皇太后和宦官不是被杀，就是被囚禁，到老都臭名昭著。

至此，士人批评朝政的非同寻常的激情到底从何而来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如前所述，士人之所以反对这种黑暗的统治，乃基于义愤和轻蔑，根本上是出于对宦官的性别和身份偏见。如同《后汉书》作者范曄所指出的，宦官大部分不识字，是无知之辈，士大夫羞于与之为伍。^{*}除幼习诗书、娴于治国之术的邓太后外，其他皇太后同样也是无知之辈。士人对不得受这些不识字的女人和不男不女之人的统治，十分愤怒。不仅如此，盘踞要津的宦官党羽，利用手中的权力，鱼肉百姓，聚敛财富，这种对人民的压迫，加上暴政、腐败，最终使局面难以收拾。^[1]由此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舆论老是站在士人这一边与宦官为敌了。因为知道舆论在自

* 《后汉书》卷九十七《党锢传序》。

[1]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宦官之害民”条：“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然亦有不同，唐、明阉寺先害国而及于民，东汉则先害民而及于国。”

己一方，士人在面对迫害、监禁和死亡时，才始终充满了道德勇气。

从士人一方，我们可以了解到导致这股公共批评潮流（中国历史上称为“清议”）的另一种力量。儒生的士气从来没有像这个时期这么高涨过。^{*} 历史学家往往把这个突如其来的充满了侠义精神和个人勇气的潮流归因于儒家学说的复兴，在东汉第一个皇帝的努力下，儒家学说的地位提高了。随之而来的，作为皇帝复兴儒学计划的一部分，无论是在全国还是在首都，文官选拔制度均已具雏形，学校得到很大的发展。例如顺帝统治时期就有各种官学 240 所，校舍 1850 间，学生 30000 名^{**}。可以说，这些学生都是政府官员的候选人。这个时期，求学看起来是件受人尊重的事。在著名学者兴办的私学里，学生往往达数千人。这么多的学生聚集在京师，除了学习之外，无所事事，自然会产生闲谈时事、交流看法的氛围，暴政肆虐之际尤其如此。这种公共批评的习惯，最终成为遍及全国的风尚，成为决定名人声誉的力量，这和今天的媒体功能并无二致。这么看来，文人的活动会形成一个中心和自觉的议政团体，他们受到各方敬重，并且很清楚自身的力量。著名的批评家如郭泰，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人的毁誉。

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当时陈义甚高、有点儿矫揉造作的行为规范和盛行的侠义精神，也为这一公共批评潮流提供了道德力量。之所以这样说，

*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条；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 《后汉书》卷一〇九《儒林列传序》。译者按：原文作：“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飧试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益，至三万余生。”

是因为这样的批评的对象既有朝廷，也包括士大夫个人的行为。^{*}士人对这些舆论都很敏感，谨言慎行，以博取名誉，避免嘲讽。促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有三：首先，这一批评的潮流是与复兴儒家道德运动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儒家教义倡导“礼让”（或者说顺从）的道德，为了实践这种道德，很多世家大族家庭的长子放弃了继承权，让给兄弟。^{**}这样做的，都得到了公众的赞扬，赢得了好名声。做能出风头和特立独行之事以沽名，遂成风俗。它与流行的公共批评的潮流混合起来，形成了偏向于以严格的准则来规范个人行为看法。维护政治和道德的纯洁性的批评运动——“清议”运动，就是在这种氛围中产生的。

其次，汉朝的文官选拔制度直接助长了对道德行为的严格要求。一个人能够得到举荐或被提名为政府官员，非关其学识，而是因为其道德品质和正直、诚实的名声。这可以从这种文官选拔制度的名目中看出来：茂才异等、贤良、方正、敦厚、质朴、孝廉、能言直谏、隐逸等。^{***}儒家道德通常会出现的问题是，这种严格的道德规范，有时不免带些道学倾向。这由士人赵宣的例子可见一斑。赵宣以孝著名，他严格遵守儒家经典的要

* 以苏不韦为例，像当时许多侠义之士一样，不韦为父报仇的方式也招致物议。不韦父因被一名官员囚禁致死。不韦掘地道至官员寝室。这位姓李的官员恰巧外出，不韦杀其妻小，仍觉不解恨，便掘了官员之父的坟墓，砍下其头骨祭父。起初，舆论对不韦很不利，但当受人尊敬的郭泰表达了对不韦有利的看法之后，“议者于是资之”。

** 《后汉书》卷七四《邓彪传》、卷六九《刘愷传》、卷一一三《严子陵传》，等等。并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

*** 赵翼前引书。

求，住在墓地为其父服丧三年。^[1]但一位士大夫领袖发现，他的五个孩子都是服丧期间所生的。赵宣立刻声名涂地，成为“名教罪人”。

造成双方严重冲突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战国时代遗留下来的侠义精神。当时有一种游侠，大概是剑术好手，他们受那种对个人忠诚的行为规范的影响，救朋友于危急之中，虽赴死而不辞。从《汉书》来看，这种传统在四五百年间从未中断过。^{*}这一时期有很多侠义之士目无法、帮助朋友复仇的例子。有几例是在白昼手刃仇敌，为家人复仇，然后自行承担后果。如何颀为朋友报杀父之仇的故事。朋友于病榻弥留之际，含泪告诉何颀，杀父之仇未报，心里很难过。朋友气绝后，何颀就去把仇家杀了，以其头祭于朋友墓前。与此相似的还有郅恽的故事。郅恽知道就要去世的朋友的心事后，马上去把他的仇敌杀了，朋友看到仇敌的首级，安详地闭上了眼睛。^[2]另一位了不起的士人公孙瓚，为了陪伴遭放逐的朋友，心甘情愿地告别家乡，踏上了远达上千英里之遥的越南

* 《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

[1] 《后汉书》卷六六《陈王列传》：“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数，以其易黷故也。况及寝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诳时惑众，诬污鬼神乎？’”

[2] 《后汉书》卷二十九《郅恽列传》：“恽友人董子张者，父先为乡人所害。及子张病，将终，恽往候之。子张垂歿，视恽，歔歔不能言。恽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仇不复也。子在，吾忧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忧也。’子张但目击而已。恽即起，将客遮仇人，取其头以示子张。子张见而气绝。”

之旅。^[1]周党曾受到一名卿佐^[2]的侮辱，等他到京师长安学习后，知道了由《左传》传下来的侠和复仇的传统，于是返乡向卿佐提出决斗，结果身受重伤。卿佐钦佩他的勇气，把他带到自己家里，照料他恢复健康。^{*}也正是因为有此忠勇与义气的传统，在随后遭受迫害时，他们大有机会践行这些美德。确实，如果没有这样的个人勇气和侠义精神的鼓舞，就不可能有士人与宦官及其党羽的勇敢斗争。

士人与宦官的斗争，或许可以追溯到顺帝时期（126—144），士大夫李固和杜乔身为帝国御史，因为弹劾宦官的罪行而死于狱中。但冲突主要是在桓帝（147—167）和灵帝（168—189）年间。

第一次学生运动发生在公元153年。耿直派官僚、御史朱穆被任命为冀州刺史，消息传来，有40多位多名县官挂印逃避，恃势不避的，后来不是自杀，就是被以腐败或压迫百姓的罪名拘捕治罪，死于狱中。这些县官多是宦官党羽。宦官赵忠丧父，用天子才能用的玉棺归葬。出于义愤，朱穆令人掘了死者的墓，陈尸于众，以儆效尤。朱穆因此得罪了京都宦官，被判服苦役。舆论支持朱穆，数千名太学生上书皇帝，把宦官痛骂了

* 应劭：《风俗通义》卷四《过誉》篇。译者按：《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列传》：“周党字伯况，太原广武人也。……遂至长安游学。……初，卿佐尝众中辱党，党久怀之。后读《春秋》，闻复仇之义，便辍讲而还，与卿佐相闻，期剋斗日。既交刃，而党为卿佐所伤，困顿。卿佐服其义，舆归养之。”

[1] 《后汉书》卷七十三《公孙瓒传》：“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千石。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太守刘君坐事榷车征，官法不听吏下亲近，瓒乃改容服，诈称侍卒，身执徒养，御车到洛阳。太守当徙日南，瓒具豚酒于北芒上，祭辞先人，酹酒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便当长辞坟莹。’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观者莫不叹息。”

[2] 卿佐，主收赋税的小官。

一顿，为朱穆辩护，誓言甘愿和朱穆一起服苦役。舆论的压力迫使皇帝赦免了朱穆。

第二次学生运动，发生在公元162年。将军皇甫规免了几名宦官党徒的职，结果遭宦官构陷，也被判服苦役。太学生再次行动起来，300多名太学生联名上书，为皇甫规求情，结果赶上大赦，皇甫规才得到释放。另一名御史李云，由于上书反对宦官的倒行逆施，被判在宦官掌管的监狱中服苦役。士人杜众听说了这件颠倒黑白的事情后极为愤愤，向皇帝上书，请求与李云同日死，结果也被投进了监狱。

斗争还在继续。帮助桓帝除掉了外戚势力的五位宦官，气焰正盛，其子弟党徒遍布天下，霸占了县令之类有利可图的位置。贫富严重分化，富人的生活淫逸奢侈，反映在妇女时尚上，流行啼装（用眼影）、愁眉（眉毛描得细而曲折）、堕马髻（头发挽成髻，挂于一鬓边）、折腰步（走路来，似足不胜体）、齟齿笑（笑起来好似牙痛，直让人看到骨根深处）。* 穷人过着赤贫的日子，饥荒年代会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公元109年就发生过）。如果宦官很早就得了势，恐怕不用等汉朝灭亡，盗贼早已蜂起于全国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士人尽其所能，或上书皇帝，或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对抗残暴无道的势力。

下面的例子，足以说明这场斗争的本质和士人所要抗争的形势之恶劣。有些宦官在山东有巨额产业，其子弟党徒常在交通要道上劫掠行旅。地方官滕延收捕了一个这样的团伙，处死数十人，并将尸体示众。滕延因

* 参见《后汉书》卷一一三《五行志》。

此丢了官。涉案的一名宦官^[1]的弟弟，官任益州刺史，传言有百万家产，在大臣杨秉^[2]弹劾下，这位刺史在被押往京师途中自杀，杨秉为他名下的三百车财产造了份清单，全是金银锦帛、珍宝古玩，并乘胜弹劾了那名宦官。杨秉胜利了，宦官暂被免职。“清议”运动的杰出领袖张俭，后来也对这位宦官发起无情斗争。宦官回老家奔母丧，丧礼盛况空前，备极哀荣。张俭以此弹劾宦官，不料奏章半路上被截留，张俭没有退缩，捣毁了宦官的宅第冢墓，查抄其财物，再次上书皇帝，却再次为宦官的党羽截留。成瑨对一位大珠宝商的处理，未免失之草率，这位珠宝商是宦官集团的一员^[3]，成瑨把他并其随从200余人处以极刑。另一位宦官之侄^[4]，在江苏境内做官，十分暴虐，他想求一位太守的女儿做妾，遭拒后，派人绑架了太守之女，用箭射杀。东海相黄浮听说后，把宦官之侄全家一律收审，并在庭上拷打审讯，下属劝他不要这样做，黄浮回答说，如果他能杀死这个“国贼”，就是死也瞑目了，遂把他处以极刑，并悬首示众。黄浮因此被罚到宦官管理的监狱里做苦工。^[5]

由士大夫所代表的舆论和由宦官所代表的权势集团的斗争，逐渐公开化了，从口头批评开始变为势均力敌的斗争。意料之中地，宦官集团会拿

[1] 这里指的是大宦官侯览，下文提到的益州刺史是侯参，《后汉书》卷七八《侯览传》称“览兄为益州刺史”，卷五四《杨震附杨秉传》则称“侯览弟参为益州刺史”，自相矛盾。

[2] 杨秉时为太尉，东汉太尉领尚书事，综理军政，在三公中位最尊，东汉的太尉府相当于西汉的丞相府。

[3] 名张伋。按《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张伋本系“桓帝美人之外亲，善巧雕镂好玩之物，颇以赂遗中官，以此并得显位”。

[4] 此指徐宣事，徐宣系“五侯”之一徐璜之侄，林语堂误为“宦官之兄”。

[5] 上述故事，俱见《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及各本传，比如卷九七，有关张俭的部分，并《通鉴纪事本末》卷八《宦官亡汉》。

定主意，用铁腕手段，如下狱、处死或者流放等，企图彻底终止这种斗争，然而士人对自己的团结也很清楚，他们绝不会投降。公元165年冬，这场运动中的第一道诏书颁布了，200余名杰出领袖遭到逮捕。由于舆论的压力，次年夏天，形势有所缓和。

由于舆论毫无异议地站在士人一边，第一次“党锢”，只是激化了矛盾。到处流传着这样故事：有的士人英勇牺牲了；有的被判刑后甘愿投牢就义；有的遭到悬赏捉拿后，易容出逃，遭警惕的官员追踪；有的遭到持久的迫害，但总有地方官同情他们，拒绝执行逮捕命令；还有的地方官宁可丢官不做，也要给犯人自由；有的冒着个人风险，给逃亡者提供避难所；还有的则因为不愿意泄露朋友或其子弟的藏身之处而遭鞭笞至死。

士人的斗争，非但没有因为第一次的大规模逮捕行动而停息，反而增强了。短暂的缓冲期只能让他们更加团结，太学生给运动的领袖起了不同的称号，如“三君”、“八俊”、“八顾”等。灵帝继位后，皇太后之父窦武碰巧很同情士大夫，他联合了一些大臣，准备清除宦官势力，然而这次宫廷政变失败了。两名主事者被杀，皇太后进了监狱，宦官集团重新掌握了权力。此时皇帝只是个14岁的小孩子，易于操纵，第二道逮捕士人的命令很见成效，彻底打垮了“清议运动”，但是也终结了汉朝的统治。

169年，皇帝下诏逮捕“党人”及其同情者，第二次“党锢”开始。处死了100多人，党人五服内亲属被流放，受牵连被捕和死亡的人数达到六七百人。172年，有人匿名在宫门口写标语，公开抨击宦官集团和腐败的统治，1000多名太学生因此被捕。176年，皇帝又下诏，凡党人门生故旧、父子兄弟，皆被免官、逮捕。这时全国已经盗贼蜂起（待在监狱里的

士大夫倒很安全)，直到 184 年，黄巾军起义爆发，皇帝害怕老百姓同情起义者，废除了命令，流放近 15 年的党人家属，才得到允许回家——如果这时他们仍然活着的话。但这项措施来得有点迟了，因为身体健康和有才干的人都做强盗了。除了黄巾军的领袖张角外，全国还有 20 多个起义首领。国家因此一下子陷入彻底混乱状态，开启了所谓的“三国”时代。

综上所述，士大夫表达其对政府的批评的方式主要有：第一，歌谣；第二，联名上书和公务奏章；第三，使用他们所掌握的官方权力。他们不能完全取胜，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因为中国没有任何个人权利的观念。虽然有源自古代的隐晦的民主哲学，但是因为缺乏民意表达的法制机制，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尚书》载有最早的帝国文告之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很好地表达了民主的基本概念。这样的民主通常是无用的。因为，尽管老天爷可以选择听老百姓的声音，可是宦官、皇帝的嫔妃奶妈之流对此并不感兴趣，老天爷也毫无办法。

没有法制机制，也没有人权法案，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即便有公共新闻业，我也很怀疑它能有什么成绩可言。如果那时有报纸的话，最大的可能是，它会成为宦官和皇帝乳母的喉舌，刊登他们关于政治谋杀的一面之词和“忧国忧民”的宣言。除非编辑不怕死，甘愿为之坐牢，否则这种新闻业是没法像士人那样强有力地表达民意的。但从增加民族福祉的角度来看，在我们假想的编辑的被处死和汉朝士人的被处死之间，确实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

第五章

魏晋时期舆论的凋零

汉朝之后，公元3—4世纪的魏晋时期，公共批评进入了最低潮。然而，其消沉特征，对我们来说却别具意义。本章只想证明这样的观点，即公众对国事的冷漠，是缺乏宪法保护的自然而合乎逻辑的结果。东汉党锢之祸后，接下来的朝代里，士人对政治和国事变得冷漠起来。这是对前朝的屠杀、流放、迫害的直接而自然的反应。毕竟每人肩上只有一个脑袋，在人人自危的年代，他不应当因为选择了过不动感情的犬儒式的冷漠生活，或者纵情声色、不问世事的生活而受到责备。这样的选择是理智的教导，也是感性的反应。身为政府的批评者，一个人越是沉沦放荡，他就越无害；越是对政府无害，政府就越喜欢；政府越喜欢，他就越安全。

随着东汉的衰亡，道家的学说迅速流行起来。士人发起了一场运动，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浪漫主义运动。他们的个人生活习惯与其文学作品一样浪漫，后者的主题常常是酒、女人和隐士生活，充满了

对儒学的轻蔑，对当时的政治表现出超凡脱俗的冷漠。在党锢之祸的重压和国家大乱的形势下，儒家士大夫的责任感历经考验，终至分崩离析。士大夫也是凡人，他们知道唯有纵情声色、不问世事，方可保住颈上人头的道理。在中国人的说法里，东汉时期的“清议”，在魏晋时期已为“清谈”所代替。

从某种观点看，东汉的“清议”是积极的，这一时期的“清谈”运动，则是消极的。其旨趣不在于保持政治的清明，却在道家哲学的玄想中游来荡去，有脱离日常生活世界的趋势。从汉亡以后的几十年到我们就要讨论到的整个魏晋时期，孔子的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头一次声名扫地，失去人民的支持，为老庄的无为放任之学所代替。

在严酷的迫害中，在极度的悲哀中，人哪有什么非分之想？大家开始怀疑起入世的智慧来。范滂也许是“清议”运动中最有个人魅力的人物，他留给儿子的最后教诲意味深长。^{*} 捉拿范滂的诏书到达后，负责的官员和当地县令俱为之哭泣，不愿让范滂知道。范滂听说后，委托弟弟照顾母亲，到县令那里自首。临行前，母亲开导他不要怕死，并说自己有这样的儿子，即使死了也高兴。受刑前，范滂对儿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范滂坚持正义，却落得如此下场，由他来告诉儿子行善是正确的，连他自己都觉得没有什么说服力。

一些士人不幸进了监狱，其他人则设法逃亡。亲戚朋友因大胆庇护他们而受到牵连。例如，张俭远走塞外，数十人因为曾收留他而遭到迫害，

* 《后汉书》卷六十七《范滂传》。

家族甚至乡邻都未能幸免。清议运动的另一位领袖夏馥听说这事后，长叹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夏馥剪须易容，逃入山中，为人做奴仆。他的弟弟带了些布匹来找他，在市镇上碰见了哥哥，不敢相认，直到听见声音，才认出来。两人夜里在一家旅店偷偷见面，夏馥说：“我易装逃进山中，是为了避祸，你来找我，不是给我找麻烦吗？”像夏馥这样在山中躲藏一辈子的士人很多。有一位甚至藏在一处没有门的土屋里，吃的东西全靠墙上的小洞递进来。所有这些士人，或隐身渔樵，完全不问国事；或如张俭一样，尽管在改朝换代之际重获自由，却坚决不再从政，选择退隐的生活，他们难道应该因此而受到责备吗？

可以肯定的是，士人中形成了新的思想风气。这在曹魏时期的七位诗人——“竹林七贤”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时人开始有乐天安命、玩世不恭、纵情声色、回归自然的种种表现。也许是当时最有才华的作家阮籍^{**}，常常赤身裸体在家里晃来晃去。有人问他为何这样做，他回答说，我以天地为家，屋室为衣，诸君为何钻进我的裤子里呢。^[1]他塑造了一位“大人先生”，旷达不羁，把遵守儒家规矩的礼法之士比作钻在他裤子缝里的虱子。他为不问世事所作的辩护，见于其名作《大人先生传》：

* 《后汉书》卷六十七《夏馥传》。

** 阮籍等人的故事，分别见郑樵：《通志》卷一三《阮籍嵇康传》，卷一七五《祢衡传》。

[1] “脱衣裸形”的是刘伶，而非阮籍，当是林语堂误记。事见《世说新语·任诞篇》：“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所记略同。

世人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裨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裨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裨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裨中乎！

这样的冷漠，确实很有诗意，它引领我们回归自然，回归道家哲学，实际上，中国所有的杰出诗人在精神上都是道家的门徒。如果说宦官和后戚导致了东汉的衰亡，那么他们也有可能催生了中国最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使后者写下了《归田园居》。中国文化受道家自然主义浸润两百年之后，人文精神才臻于道家和谐圆融的境界。宦官已给了诗歌第一推动力，魏国的统治者曹操，坦率地宣布正直的士大夫对他没有用，也帮了诗歌运动的忙。作家中的才智之士，如孔融、祢衡，皆因其智慧超群而遭杀身之祸，也为这一运动奠定了基础。甚至“竹林七贤”中最耀眼的明星、自然生活的大力鼓吹者嵇康，也因为不够聪明，不能玩世不恭以保护自己，而丢掉性命。这个时代的智者中，祢衡装过疯；后来建立晋朝的司马懿，为了不给曹操卖命，假装患风痹，曹操为了弄清司马懿到底有没有病，派人夜里拿刀刺他，虽然很痛，但司马懿却装得和没事一样。有一天，司马懿在院子里晒书，突然下起了雨，他忘了自己的“病”，跳起来把书抱进屋里，不巧为婢女看见，司马懿的夫人马上杀婢女灭口。正是在这种恐惧和没有安全感的气氛中，不问世事和纵情声色才成为风行全国的

潮流。

诗人也是人，所以我们可以原谅他们只求自保；但因为是人，所以他们的玩世不恭，只不过是為了掩盖内心的痛苦罢了。例如，阮籍的《咏怀》诗里，有这样的句子：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还有：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或者这样的诗句：

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

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

其他的诗人因此纵情诗酒。刘伶赞颂酒的文章，有“千古绝唱”之称。他常常驾车外出，携一壶酒，使人荷锺随之，说：“我死了，随便挖个坑埋了就行了。”阮咸是“竹林七贤”之一，他和婢女有不正当关系，阮夫人便把婢女打发走了，正在招待客人的阮咸得到消息后，向客人借了匹马，冲出去追赶被遣散的婢女，两人共骑一马返回，此事为其诗友目

睹。如果这算是丑闻，那么阮咸乐意让大家知道。这些受人爱戴的才子，遵循道家教导，有不测之智，却装作愚蠢可笑；思想深邃，却冒充玩世不恭，这样他们对统治者就一点儿坏处也没有了，惟有如此，方可保证他们晚年的幸福退隐生活。

也许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说的是事实：清谈之风导致了中华民族的衰弱和西晋末年的胡人入侵。但是，理解万岁——在没有宪法保护的情况下，仅仅对士人和批评家说一句“不要怕，奋勇向前”，他们是不会对政治取积极态度的，没有人会拿生命危险去冒犯统治者的。只有有了自由与法律的保护，活着有了更多的尊严和价值时，民众才会积极从事政治批评。

第六章

宋朝的学生请愿

每逢国家存亡之秋，公共批评总会应时而起。验之于南宋时期（12—13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此说可谓不虚。此时，中国的赵氏王朝正在金人、蒙古人连番侵迫的阴影下，以杭州^[1]为国都，勉力维持其统治，直至 1277 年为元朝军队所灭。^[2]我们之所以对这一时期特别感兴趣，是因当时的政局、士人的运动和舆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的局面。这就是历史研究的价值，它教我们以史为鉴，从过去中看到现在。我们细读南宋一朝的历史，看到那时的种种情状，不由得对当时的太学产生异常的亲切感：太学生大声疾呼对敌作战，政府却举棋不定，企图对太学生的呼声避而不闻，轮番使用镇压和利用两种手段来对付舆论。和平时期发生学生运动是

[1] 时称临安。

[2] 1276 年，元军入临安。三年后，元水师与宋水师交战于广东崖山海上，宋师残余力量始被消灭。

反常的；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发生学生运动，就完全可以理解了。等言论有了自由，舆论有较为顺畅的发泄渠道，可以在议院里说出来时，学生运动就不会有如此大的规模和影响了，就像英国历史上那样。政府如果不能善待民意，又堵死了正常的发泄渠道，导致学生运动就不足为奇了。同样不足为奇的是政府极力钳制言论的做派，因为天底下几乎没有哪个政府会承认，它其实不懂得如何统治，对于常人的头脑难以应付的大问题，它也找不出解决之道。

这个时期士人对政府的批评，和东汉时期有所不同。首先，东汉的士大夫运动只持续了30年时间，而宋朝的士大夫运动是经常性的，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其次，东汉士大夫运动的矛头所指的是宦官滥权，而宋朝的运动针对的是外来的政治威胁，因此它并无内乱和内讧的特点。第三，宋朝的学生运动不像东汉时期那样，有有组织的党派集团参与，因此也没有戏剧性的宫廷政变，士大夫的批评运动相当缓和，而且逐渐相沿成习，采取的主要形式是联名上书或集体到宫门前抗议。

另外，两朝的这些运动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无论是针对政治腐败的也好，还是针对游移不定、卑躬屈膝的对敌政策的也罢，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两次运动确实表达了真正的人民的声音。这两朝的舆论表达相当充分，士人公然藐视政府的愤怒，要求把最有权势的官员革职、处罚或处死，宰相也有被处死的。大臣李邦彦、韩侂胄、贾似道、秦桧都曾遭到这样的弹劾。这样做非常危险。因为南宋时的宰相是国家的实际管理者，独揽政治、军事和财政大权。向皇帝请求处死宰相，或者向皇帝告发宰相的贪婪、腐败或不称职，无异于自找杀身之祸。但每当国家陷于绝境，总有

勇敢的士大夫把种种后果置于脑后，挺身而出。

这些所谓的运动，多数由太学生操纵，通常采用联名上书或者伏阙请愿、示威的方式。这些请愿通常有以下特征：首先，它可以由数人递交——这些人或许是太学生，或许不是，也可以由一两百位太学生联名递交。其次，除学生运动特别活跃的时期外，递交这些请愿书的，通常是在职官员或没有官衔的普通士子。第三，递交请愿书通常伴随着宫门前的集体示威——起码有数次，平民也加入了请愿行列，示威活动蜕变为暴乱。第四，每有令人动容，或是表达了受到压抑的对时局感情的奏章，必有人誊抄并广为传播，官方的史书对这类奏折多有记载。第五，请愿者通常会提出罢免或处死宰相和其他大臣的要求，并推荐其他人选。有时，他们要与占领了中国北方的野蛮人处理战与和这个不断出现的问题，在皇帝免去爱国派官员的职务或不公平地对待爱国派时，他们又是精力旺盛的反对者。第六，如果一次请愿达不到目的，请愿者会发起另一次行动，最初的发起者遭到惩罚或解职后，自有同情者继承其事业。第七，这些请愿活动一般能够成功地推翻政府的决定，并在人事问题（官员任免）上达到目标。请愿如果失败，发起者有时会失去皇帝的宠爱，或被监禁、处死。

这类请愿活动也许可以追溯到 1109 年。这时，金军已越过了长城，来自北方的危险越来越近，北宋朝廷像所有面临这种形势的政府一样，登时慌了手脚。太学生陈朝老上书弹劾宰相^[1]，列举其蠹国之罪 14 条^[2]，

[1] 蔡京。

[2] 据《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这 14 条罪名为：渎上帝，罔君父，结奥援，轻爵禄，广费用，变法度，妄制作，喜导谏，钳台谏，炽亲党，长奔竞，崇释老，穷土木，矜远略。

尤其是其摇摆不定的国策和外交事务上的失误。^[1]16年后（1125年，三年后北宋就灭亡了），太学生陈东发起了针对宰相和其他五名大臣的请愿运动，要求“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结果其中两名大臣被免职，两名被处死。请愿运动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领土不断丢失，帝国即将崩溃，使民众的激愤到了顶点，陈东的请愿表达了公众的情绪，这正是其力量之所在。

然而朝廷却和以前一样茫然不知所措。看来，它从来就没有拿定过主意。此时，野蛮人^[2]已经渡过黄河，皇帝决定御驾亲征，率领军队抵抗入侵者，权臣李邦彦却建议皇帝逃离京城。李纲坚决反对李邦彦的建议，他以死相劝，说服皇帝固守御敌。数日后，一名将领提议夜袭敌营，结果劫营失败，皇帝再次变卦，极力谋求和议。他接受敌人的要求，派遣亲王做人质，保证双方和谈。为了增进同敌人的“友谊”，使敌军不再南下，朝廷决定孤注一掷，割让数座城池给敌人，罢免主战派李纲。这一切，都不可思议地发生在两个月之内。

罢免李纲以取悦入侵者的提议，导致京城出现当朝规模最大的集体示威。这次抗议活动仍是由太学生陈东的上书开始的，他是1127年^[3]2月这一运动中的英雄。《宋史》记载，陈东等太学生和成百上千的百姓聚集在皇宫门口，上书要求皇帝重新起用李纲、种师道，指责李邦彦*出于嫉妒，唯恐李纲成功而把他解职，此举正中敌人下怀。恰好，李邦彦退朝路

* 主和派。

[1] 金太宗于1125年10月下诏侵宋。

[2] 指金军。

[3] 应作1126年。

过，民众当众指出李邦彦的罪行，痛加斥责。官员吴敏出来讲话，民众不理睬，群起击登闻鼓，呼声震天。皇帝的卫队长怕生变故，乞求皇帝顺从民意。皇帝同意了，派一名官员当众宣读对李纲的任命。这名宦官宣读完圣旨后，遭到群众攻击，尸体被撕成碎片。皇帝任命李纲为“京城四壁守御史”。李纲和陈东的传记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跟上面的叙述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还提到有“数万人”不谋而合地自动聚在一起，可见当时民情之向背。

这已是北宋王朝的最后一年了，形势每况愈下。金人把皇帝徽宗作为人质掳往北方，他因此得以目睹金人的军营。徽宗之子钦宗，最终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命丧敌手。其间，陈东以一介太学生，五次上书，其中超过两次是在首都南迁杭州之时。有三次上书，他要求处死卖国的“六贼”。*

朝廷自然采取了措施，禁止伏阙上书，避免再出现类似的运动。但在“惊天地、泣鬼神”的紧要关头，群情激昂、事发于电光石火之际，朝廷的禁令就没什么用了。早有官员提议，要把示威运动的领袖处死，京师治安官建议把他们统统关起来。但考虑到当时的民情，朝廷恢复了陈东的官职，并被迫派代表赴太学以安抚太学生。陈东还被加封了官职，但他没有接受。**

可是陈东不得不死。1128年，南宋朝廷的头一年^[1]，陈东再次上

* 汪师韩：《韩门轶学》。

** 《宋史》卷四五五《陈东传》。

[1] 南宋朝廷始于1127年6月。

书，要求罢免黄潜善。黄潜善则请求皇帝处死陈东，以压制学生运动，皇帝同意了。两年以后，皇帝面对愤怒的舆论，不得不为此公开致歉，派人祭陈东墓，对他和一位追随者^[1]（也被处死）的家庭予以经济上的补偿。皇帝的歉意也许是真诚的，但也有别解。入侵者在山东建立的傀儡国家的首脑刘豫，为了纪念这两名爱国者，已经先行一步而为他们建了庙，在这种情况下，皇帝需要公众的支持。

高宗时期，臭名昭著的大卖国贼秦桧掌权，再也没有什么集体示威行动，也听不到半点批评的声音了。* 力主和议的秦桧，独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和平”地统治这个国家达19年之久。和议兴许有理，也可能是错误的。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只是秦桧夺取权力的方式：杀害所有政敌，禁止舆论的表达——直至秦桧逝世，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此时的金军，早已不复有昔日的善战，正如此后的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证明议和之论是错误的。如果南宋朝廷不杀害反对秦桧的将领和士大夫，灭自己士气，长敌人威风，金人恐怕也没有打胜仗的信心。岳飞于连连告捷之时，被蛮横而断然地召回，在狱中遇害。很难判断此事是国民之福，还是秦桧个人的胜利，这取决于反对派的政策，而它却没得到验证的机会。也许征服者的战斗力还不错，但是南宋军队也没有弱到一击即溃的地步。

无论如何，秦桧的手段是残酷而无耻的，从官员纷纷被勒令解职和监禁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位权倾一时的人物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不许有丝

* 高登是个例外，他曾五次上书要求与金开战，结果被贬到我的家乡漳州一带。

[1] 指欧阳澈。

毫反对他的声音出现。* 有一件小事颇可见秦桧的本性。一次，秦桧夫人蒙召参加宫廷宴会，皇后向来宾夸耀一种罕见的大鱼，头脑简单的秦夫人说，她家里也有这种鱼，比席上的更大，更好吃。她答应第二天一早给皇后送来尝尝。秦桧明白，如果皇帝知道进贡给宰相的东西要比给他本人的好，那就太不明智了。翌日晨，他让人给皇帝送去了一些腌制的干鱼，皇帝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秦桧无疑是个聪明人。无论是战还是和，皇帝都离不开他。皇帝兴许是在与敌斗争的过程中认识到的秦桧的重要性，也可能是在向敌投降的过程中认识到的。总的来看，把南宋变成附属国，每年交纳上百万的金银丝绸贡品，向敌人投降的前景是明晰的，这比战场上的较量容易把握得多。很难说，这不是个好办法。皇帝选择了投降，采取了内部谋杀、胁迫、消磨军民斗志的政策，使宋人变得浑浑噩噩，士气低沉。他因此可以证明，宋人不是入侵者的对手。或许他是的。

尽管秦桧已经活得够长了，可是总有寿终正寝的一天。对舆论的钳制，只能使民众对强制服从普遍产生不满，对投降路线日益貌合神离；如果政府允许抵抗，他们早就起来战斗了。当议和之举令举国蒙羞，这位大人物一旦一命呜呼，公共批评的熊熊烈火就燃烧起来了。

秦桧死后的 100 年里，个人或者太学生集体请愿的古老传统，仍然延

* 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六《秦桧文字之祸》条；《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 参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转引自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四，第 292 页。译者按：林语堂对这个故事作了改写，原文为：“宪圣召桧夫人入禁中赐宴，进淮青鱼，宪圣顾问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对以食此已久，又鱼视此更大且多，容臣妾翌日供进。夫人归，亟以语桧。桧恚之曰，夫人不晓事。翌日，遂易糟鲋鱼大者数十枚以进，宪圣笑曰，我便道是无许多青鱼，夫人误耳。”

续了下来，所以有理由把它视作已经相沿成习的制度。孝宗时，72名太学生联名上书；光宗年间，以王安仁为首的218名太学生联名上书；理宗时，蔡之润领导173名太学生，黄恺伯领导144名学生上书反对当时的宰相史嵩之。除上述事例外，这一时期，还有许多由士大夫个人发起的重要的上书和弹劾事件，这意味着，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的潮流，是一直存在着的。^{*}

朝廷竭力制止学生，但很快就发现没什么效果，因为这些请愿得到了舆论的支持。例如，1175年11月某日，皇帝下令禁止民主地表达意见。^[1]但就在同一天，72名太学生在张观领导下伏阙上书，要求惩办数名官员。由于有民意的支持，这些要求部分地得到了满足，朝廷任命了新的官员。在政府眼里，这种让步似乎是耻辱的。但通常来说，随着人民的民主意识越来越强，政府的“耻辱”会越来越多。治国者真正的威望，来自承担起领袖国民的责任，使民意得到切实的表达，而不是与它作对，总想钳制政治异见或不情愿地与之相随。

宁宗（1195—1224）时，韩侂胄居相位，他的不得人心，见之于这一时期一系列大胆的弹劾奏章里。^{**}国家再次陷入与北方入侵者是战还是和的争论中。在与道学集团赵汝愚、朱熹、彭龟年等人的斗争中，韩侂胄坚定了出兵抗金的想法。^{***}随着权力的巩固，请愿者或被鞭笞，或遭羞辱，

* 参见汪师韩：《韩门辍学》。

** 参见《宋史》卷四七四《韩侂胄传》。

*** 见上引书。

[1] 《宋史》卷三三《孝宗纪》：“（十一月）甲午，以黄榜禁太学生伏阙。是日，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书……”

或被流放，请愿活动慢慢中止了。1200年，布衣吕祖泰上书，请诛侂胄，以周必大为相，遭杖刑流放。是战是和，丞相摇摆不定。1205年，一名武学生因上书反对用兵而遭贬黜。到了1208年，却有一位士人因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主张对金用兵而被剥夺功名。这时，秦桧的名声暂时有所好转，反对当时国是方针的臣子，被一一贬黜。^[1]韩侂胄权倾一时，无耻之徒对他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一位士大夫因为在他的祝寿会上迟到，只好像丧家犬一样，溜进会场^[2]。士大夫赵师霁陪同韩侂胄在乡村散步，看到一处美丽的场所，韩侂胄评论说：“此真田舍间气象，只是欠犬吠鸡鸣。”一会儿，树篱间竟传来狺狺之声，越来越近。原来赵师霁为了博韩侂胄欢心，竟不惜学狗叫，理所当然地，赵师霁很快得到了提升。

随后的理宗年间（1225—1264），太学生公共批评的影响越来越大，变得棘手起来。这主要是因为，这种批评要求任免官员、干涉政治，而且，这些请愿活动看来卷入了狭隘的党派之争。尽管对太学生的这种做法一直有非议，但我认为这些让政府头痛的批评并不必然地对民族有害。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中国，人民赢得的权利，无论是行之有效的“人权宣言”、强大有力的国会、独立的民主新闻事业，还是太学生活跃的公共批评，都会限制君主和官员的自由。现代新闻事业和英国议院，其干涉官员任免的程度，正与宋代太学生同。并且，英国人已不再把公众的这种批评

[1] 《宋史》卷三七《宁宗纪》：“三月癸酉，以毛自知首论用兵，夺进士第一人恩例。戊子，下诏戒飭内外群臣。复秦桧王爵、赠谥。”韩侂胄被杀害于1207年11月，上文所述两事，均发生在此后。

[2] 此指吏部尚书许及之，看门人捉弄他，故意把大门关上，他从水洞中爬进去。因此被时人讥笑为“由窦尚书”。

视为“给政府添麻烦”了。

不管怎么说，理宗年间太学生所发起的弹劾与反弹劾运动达到了顶峰，这是没有疑问的。攻击朝臣的请愿书如雪片般飞来，其中尤以针对丁大全和史嵩之的为著，结果参与攻击丁大全的太学生统统被监禁，请愿上书也被禁止了。弹劾史嵩之时，出现过以黄恺伯领导的144名学生联名上书的场面。这时期还有两起特别的事件：两名上书请愿者猝死，学生怀疑是谋杀，群起抗议。其中一名死者，是173位联名上书弹劾史嵩之的太学生之一。就在宋王朝大厦将倾之际，还有太学生冒死弹劾权相贾似道，这是四平八稳的批评者无法做到的。因为当时的皇帝度宗对贾似道既尊重又害怕，称贾似道为“师臣”，而不直呼其名，在贾退朝时，皇帝总是起立相送。

士人周密对南宋末年史事，有很多评论。他激愤地写道：

三学之横，盛于景定、淳祐之际。凡其所欲出者，虽宰相台谏，亦直攻之，使必去权，乃与人主抗衡。或少见施行，则必借秦为喻，动以坑儒恶声加之，时君时相略不敢过而问焉。其所以招权受赂，豪夺庇奸，动摇国法，作为无名之谤，扣阊上书，经台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贾，无不被害，而无所赴愬。非惟京尹不敢过问，虽一时权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恤行之，亦未如之何也。*

* 周密：《癸辛杂识后集》。

周密的记述，看来揭示了事情的另一面，这种情况无疑是真实的。

在我看来，到继任丞相贾似道擅权时期，才说得上是“第四等级”的真正堕落。太学生因建言而收受贿赂，以前不是没有，但只是个案。这样的事情上世纪末就有过，但那时，这样的太学生马上就会被指为害群之马，从此声名扫地。总的来说，太学生为维系健全的公共批评潮流贡献了力量，尽管这些舆论有时失之偏颇，或囿于党派成见——可是，即使在今天，真正的“不偏不倚”的新闻，仍然很难做到。有这样的公共批评总比没有好。何况，有那么多对权臣的无畏的批评，足以抵消“太学之横”的一面。我们应该记得，这样强大的批评潮流，有震慑和预防的作用。学生所要做的，只是给政府找点“麻烦”。当然，对此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贾似道是中国历史上最冷血的奸臣之一。^{*} 中国历史学家毫不留情地贬低这位看着宋朝灭亡的人，我认为没什么大错。贾似道贬斥异己，独揽大权，蒙古人夺取南宋的城池，并不妨碍他与娼尼在珠光宝气的阁楼里斗蟋蟀。为消除反对的声音，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建立了所谓的内外一体的政府，使国内暂时得到了“平静”。本来，奸臣都是极为有才干的人——有无能的理想主义者，没有无能的骗子——因此，奸臣越是冷血，手段也就越卑鄙。他依靠谋杀和逮捕，在朝廷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可见其不凡的手段。最终，他得以独揽大权，宦官、外戚、朝臣，都为他所控制。对三学的学生，贾似道采用改善食堂伙食使餐有鱼肉、奖励考生、增拨学田的办法笼络他们。现存宋时的一块石碑上记载：“旌别人才，止付于鱼肉铢

* 《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两间，士大夫不以为羞，且逐逐然贪之。”*

贾似道的权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时人周密说，士人不说话了，尽管他们“虽目击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及贾要君去国，则上书赞美，极意挽留，今日曰师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无一人敢少指其非”**。

这里可以做个小结了。宋朝太学生的议政浪潮，发端于爱国的太学生陈东，在抗议卑鄙的投降派，反对把宋朝变成金国的附庸国中成熟。许多骨鲠敢言之士，冒着断送自己的前途甚至性命的危险，继承践履了批评宰相和大臣的传统，他们认为这些人辜负了民族的信任。学生的抗议常常引起内阁成员的变换，导致某一党派的升降。尽管总的来说，学生所支持的官员都是些正直之士，反对的都是腐败或不称职分子，但到头来总是有沆瀣一气、清浊难辨的可能：在南宋的最后几年，贾似道施展笼络手段，看来已成功地把“舆论界”拉下水，学生运动看来已“不灵”了。在铲除了所有的异己力量之后，再也听不到批评的声音，贾似道终于得以独揽军、政、财大权，一统天下，可以高枕无忧地在多宝阁里与娼尼斗蛐蛐了。这时，南宋的皇帝正落入蒙古入侵者手中。

* 邓志宏：《沙县重修县学记》，转引自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二，第297页。

** 周密《癸辛杂识后集》，亦见《齐东野语》。

第七章

明朝的宦官、御史和东林党人

宋朝的舆论，主要以学生请愿、示威的方式得以表达。然而到了明朝，因传统嬗变，御史变得十分活跃，强有力地表达着士人及官员对朝廷或皇室的举动及朝政的意见。最终，这种舆论表达行为，使御史和阁臣发生争论，到了凡是阁臣所赞成的，士人和御史就反对的地步，个中情形，就好像英国内阁碰到了在议会占多数的反对党。由此产生了派系斗争，士人清除内戚、宦官不成，便退居乡野，以东林书院为基地大力抨击时政，东林党运动由此发端。可是这些士人再次碰上了亚洲历史上的头号阉臣，难逃丧命和遭受迫害的厄运，运动最终以东林党人的屈服而告终。汉朝的历史重演了：举国上下，各级官员寡廉鲜耻，滥权用私，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最终导致明朝在满洲人的入侵下灭亡。如果说从这项研究中能得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除非有法律来保护公民权利，否则，士人为维护清明之治而作出的英勇牺牲和表现出的伟大的道德勇气，都是徒劳的。只

要一名宦官到皇帝跟前挤几滴眼泪，哭上几嗓子，数百名忠义之士为捍卫他们心目中的真理、正义而冒死作出的努力，连同民怨沸腾所形成的共识，可能就化为乌有了。

这种独特的帝国御史制度，为西方政治机制所无；它在帝制中国所发挥的公共批评功能，在现代通常为新闻业所承担。因此，这里顺便谈谈它的特征。这样做的理由，一是明朝御史的活动有增无减；二是研究任何制度的不二法门是考察它如何运作，而不是光看书本里的理论。就其实质而言，御史就是今天的时事评论家。^{*} 可以认为，他们的弹劾和请愿代表了人民的声音，或用古代中国的语言，是“天子之耳目”。

在帝国御史制度的后面，是古代中国的基本的政治民主原则。这一点有时会为西方研究者所忽视。不错，古代中国是彻底的君主专制，没有选民，没有议院，没有任何现代民主政治的外表。然而，中国自古以来的士大夫和哲学家，却一直根据这样的假设来行事：政府是建立在人民的善良意愿基础之上的，如果政府失去了民意，它注定要倒台。政府的倒台，标志着皇室气数已尽，“天命”转移到别家去了。怎样才能确定所谓的“天命”？只有听取民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元前12世纪的周武王才在誓词里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公元前5世纪的孟子，发展了这条民主原则^[1]，在书中引用了这句话，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在组成国家的要素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条哲

* 对御史制度发展史的概述，参见高一涵：《中国御史制度之沿革》，商务印书馆。

** 《尚书·泰誓中》。

[1] 孟子生卒年不详，一般认为他的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72年至前289年。

学原则为大家所认可，成为中国历史上深得人心的观念。大家相信，政府如果（表达民意的）“言路”通畅，就是好政府；如果“言路”壅蔽，下情不能上达，肯定会走向灭亡。

中国历史上与“言路”相关的政治设计，是御史监察制。御史又称言官，他们在政府中的任务，就是采用“建言”（即批评）的方式，为国家维持政治的良性运转。如前所述，身为天子之耳目，御史的职责是批评政治中错误的东西，包括皇帝本人的行为，官员的腐败等，提出惩罚建议。帝国监察机构监察的对象，是政府和皇帝本人，而不是人民或新闻媒体。按中国的治国之道，监察机构在政府中应当履行净化之职，绳愆纠谬，祛除政治机体中的病灶。

西方国家最高法院的法官是享有个人豁免权的，然而中国的政治哲学家却没有为帝国御史设计类似的保护制度。御史的职责是揭露所有朝廷命官的不法行为，如有必要，上至宰相，下到州县小吏，不放过任何人，专以他们为敌。御史的另一职责，是要当面批评皇帝的目光短浅、轻信谗言、荒废政务，等等。御史的所有这些作为，得不到任何人身保护。敢于直言的御史，总会得到舆论的支持，其独立言论也受到景仰，但是从法律上说，却要面对各种惩罚：罚俸、降职、监禁、流放，甚至性命难保。很难想像有人喜欢御史这份自讨苦吃的差事，这在西方，就像为了混碗饭吃而甘愿冒生命危险去当雇佣兵一样不可思议。但就像在中国总有士人喜欢当御史一样，雇佣兵也不愁招募不到新人。想来，大多数士兵在和平时期入伍，如果没有战争，他们仅靠行行军、擦擦刺刀就可以领到军饷，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道之处。战争爆发时，仅仅是责任感和公平交易精神让他

们继续待在军营里，并驱使他们沙场赴死——因为他们为此已拿了报酬。或许多数御史也是在太平时期，怀着政治可能会清明的侥幸心理当了言官。一旦情况恶化，有的就出卖良知，投靠权门；其他的则在责任感的驱使下，做“一士之谔谔”，尽政府监察者的职责。然后，他们会起草奏章，或当面指出皇帝的疏失。其心情，正与士兵走上战场当炮灰相同。

观察帝国御史的运作，因此极为有趣。就像观看古罗马角斗士的格斗——在御史势力的全盛时代，其姿态确实很像古罗马角斗士。御史运作机制有这么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御史有“抱团”作战的传统，前排的倒下了，后面的又站出来。如果首先请愿或抗议的失败了，马上会有一大批后继者继续提起请愿或抗议，有时可以六七次，甚至十四五次就一事重复建言，至死方休；有时最初的上疏者被监禁，其他御史或士人敢于面对同样的惩罚去营救他。1519年3月，武宗皇帝决定离京南巡，诏书下来后，文武官员，包括御史，接连上疏，以为不可，尽管很多人为此受了惩罚，但上疏势头并未为之稍减。这次集体行动，最初是由2名御史发起的，另有7名御史接着第二次上疏，第三次上疏有3个人，第四次上疏由14人联署，第五次53人联署，第六次16人联署，第七次又是16人联署，第八次10人，第九次20人，第十次，仍有多人联署——但是皇帝仍然成行了。^{*}上疏者分别遭到监禁、流放、廷杖、罚跪午门等处罚，11人被处死。嘉靖年间还有一次规模很大的请愿事件。世宗登基后，有意把

^{*} 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四“正德中谏南巡受杖百官”条；《明史》卷一七四、卷一八九。译者按：这次上疏行动实际上阻止了武宗当时的南巡举动。赵翼原文作：“……然是时南巡之行究因群臣之谏而止，其后南巡，则又自宸濠之变借为词耳。”

“皇考”尊号加诸生父兴献王，而不是伯父孝宗，3年间因此导致30次谏阻。^{*}

这些伏阙请愿或上疏的后果可想而知。碰上了励精图治的皇帝，或者无道的昏君，御史都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这就像劝酒鬼改邪归正，滴酒不沾的人当然用不着救世军^[1]；对贪恋杯中物的人来说，救世军拿他又没办法。没有酒鬼喜欢被强制戒酒，西方的女流浪者宁愿待在公园里睡觉，也不愿入住基督教女青年会^[2]提供的住所。皇帝若是个昏君，肯定有同样的心理——万历就是个好例子，在他治下，对御史的惩罚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罚俸半年、廷杖、系狱、流放，不一而足。

奇怪的是，每当朝政腐败，需要直言不讳的大胆批评时，总有义愤填膺的御史或其他官员挺身而出。正德年间（1506—1521），宦官刘瑾乱政，御史蒋钦上疏弹劾，结果遭杖责三十，再劾，又杖三十。一天夜里，他又在灯下起草弹劾疏，忽然听到鬼的动静，蒋钦知道是祖先显灵劝阻，就说：“此身业已交给了朝廷，就不能再患得患失了，死即死，这弹劾疏

* 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四“成化嘉靖中百官伏阙争礼凡两次”条。译者按：此事史称“大礼议”，是明史上的一宗大案。背景是，明孝宗朱祐樞传位于其子朱厚照，是为明武宗，厚照无子，死后，孝宗之弟兴献王之子朱厚熜以藩王入继，是为明世宗，群臣以为，世宗是入继之君，应当以其伯父孝宗为“皇考”，以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世宗很恼火地说：“父母可易乎？”争议遂起。

[1] 救世军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社会活动组织，1865年成立于伦敦，专在下层民众中宣传宗教，并举办慈善活动。仿效军队编制，成员着统一制服。

[2] 基督教女青年会，基督教新教社会活动机构。1877年由英格兰南部的祈祷联合会与伦敦的女店员住宿机构合并而成。以“增进女青年在体育、群育、智育、德育和灵育方面的成长”为宗旨。活动项目包括救济贫寒、生活辅导、教育事业、夏令营、文娱活动等，为离家自立的妇女提供住宿，后扩展到世界各地。

我是上定了!” * 疏上后, 蒋钦被杖三十而死。这种英勇赴死的精神, 也可以在以“尸谏”闻名的许天锡身上见到。许天锡知道, 弹劾刘瑾必死无疑, 于是在夜击登闻鼓后自缢。他事先嘱咐家人在他死后把弹劾疏文递交皇帝。** 奸相严嵩当国时, 士大夫杨继盛等因弹劾严嵩被杀, 虽如此, 仍有 20 名士大夫继起弹劾, 廷杖谪戍, 至死方休。*** 嘉庆年间, 皇帝以为杖戍不足为言官惧, 便采取长期监禁的办法。士大夫沈鍊为此系狱达 18 年之久。

懂得了当时的政治背景, 以及迫使这些士大夫甘愿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也要出面抨击权贵的形势后, 也就不难理解这些殉道者的精神了。是的, 这些弹劾性质上是揭露黑暗的, 这与当代新闻事业的职责并无二致。上文提到的蒋钦, 第三次冒死上书时, 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因卖官鬻爵而臭名昭著的刘瑾。蒋钦提到, 普通官员参见刘瑾, 按例要交纳一千两银子, 甚至有四五千两者。**** 据稗史记载, 布政使则须纳两万两。史载, 刘瑾的罪行曝光后, 罚没他的家产时, 抄出黄金 250 万两, 白银 5000 万两, 珍宝不计其数。刘瑾弄权不过六七年, 所积已如此。***** 严嵩事败, 抄出黄金 3 万两, 白银 200 万多两, 珠宝玉石不可胜数。***** 严嵩之子与其父一样贪婪成性, 据说他和老婆背着严嵩, 把每 100 万两银子融化成银球, 密藏

* 《明史》卷一八八《蒋钦传》。

** 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五“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条。

*** 同上。

**** 《明史》卷一八八《蒋钦传》。

*****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五“明代宦官”条。

***** 同上。

在一个地窖里，这样的地窖有十多个。严嵩得知后，并没有表示反对，只是说，藏这么多金银财宝，可能会给他家里招来坏运气。数额如此巨大的财产，只能是靠纳贿和公开出售官职的办法得来的。为反对严氏父子的巧取豪夺，沈鍊上书指出，所有官职都被严嵩出售，即便州县小吏也不放过。结果沈鍊被处死。杨继盛弹劾说，严嵩升迁文武官员，不问其才干如何，只问贿之多寡。为向他行贿，将军克扣军饷，地方鱼肉百姓。结果杨继盛也被处死。首起弹劾严嵩的两人被杀害之后，严峻的形势促使其他官员挺身而出。王崇茂对皇帝说，国库里的钱不够边防一年之用，而严嵩的家财可支数年。他向皇帝建议：“朝廷与其公开卖官鬻爵，何如抄了严嵩的家，以解燃眉之急？”*

喜剧有时是同悲剧混在一起的，这些戏剧性事件并非全都如此严峻。皇帝和御史的斗争有时会很有意思。嘉靖年间，群臣相继弹劾皇帝的一位宠臣。皇帝数次暗示群臣对他这位宠臣“宽大为怀”，然而御史并没有迎合皇帝，而是苦苦相劝，建议对之“严肃处理”。万历年间，围绕是否册立太子问题^[1]，皇帝和御史展开了长达16年的争论。当时，皇后无子，皇长子朱常洛之母王恭妃无宠，郑贵妃最得皇帝宠幸，欲恃宠为其子朱常洵谋取皇位继承权，群臣根据“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屡次上疏请立常洛为太子，皇帝意在常洵，对册立太子之事一再推托。言官和朝官一方连连上疏，在1586年，1587年，1588年，1590年，1591年，1592年，1593年，1594年，1600年，1601年间一再提起这个话题；皇帝却一

*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五“明代宦官”条。

[1] 史称“争国本”。

意孤行，迟迟不予立储，对上疏者予以种种处罚，似乎有点乐此不疲。他有点孩子气地在1586年，1590年，1600年间一再声明，如果群臣不再为此事上疏，他会在次年册立太子，如果有人上疏打算劝说他，就不办了。1590年，皇帝宣布，如果有人胆敢再提这件事儿，他就等皇长子年满15岁后再说。1591年，皇帝说因为大臣给他施加压力，所以这件事儿要再等一年。到了1600年，皇帝又说，如果不是言官和大臣总逼他，他早就主动立储了。官员们好像很乐意行使向皇帝建言的权力，打算把游戏一直玩下去，直到把皇帝弄烦了，认输为止。结果这件事就一直这样悬着。钱一本在1593年写道：

前者有旨，不许诸司激扰，愈致迟延，非陛下预设机阱，以御天下言者乎！使届期无一人言及，则佯为不知，以冀其迟延。有一人言及，则御之曰“此来激扰我也”，改迟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则又曰“此又来激扰我也”，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无一人敢言而后已，庶几依违迁就，以全其衽席昵爱之私，而曾不顾国本从此动摇，天下从此危乱。^[1]

如果天下太平，执政者比较开明，御史在言论上相对就比较独立，批评起来就没有什么顾忌的，而且会受到不成文传统的保护。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再加上官吏的任免和黜陟，按程序也掌握在御史和吏部之手，他们

[1]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钱一本传》。

才敢同皇帝抗争。皇帝要越过这一技术程序而独揽大权，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御史摆出来的事实够硬，为了保住面子，就算是假的，皇帝或多或少也得讲一点正义。明朝的监察机构可分两种，一是对地方的朝廷监察机关都察院，二是对六部的中枢监察机关六科。六科稽查六部百司之事，审查检核所有的官方文书。明制，六科给事中有封驳权，可以封还上谕，驳正臣下有违误的章奏。六科经常行使封驳上谕的权力，例如，嘉靖年间，皇帝在上赠生父尊号时与群臣发生争执，御史就行使了这一权力；1592年皇帝打算处罚一名御史、1601年皇帝宣布推迟立储时，都曾出现过封还上谕的情况。有纠弹百官、规谏皇帝的制度保证，而且这种保证并非具文，御史的腰杆自然就硬起来了。除非是和权阉发生直接冲突，御史一般不会受到十分严厉的处罚，后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非下毒手不可。有时，御史如果官阶较高，或是很有名望的士大夫，意见如果得不到皇帝的采纳，会主动要求致仕，以示抗议。皇帝则会根据其态度和声望，决定挽留与否。

到1590年，万历皇帝登极已18年，在位日久，倦于政事，既不上朝议政，对御史的章奏也不加理睬。皇帝怠于听政，加剧了御史与阁臣的直接冲突，形成对立的朋党，进而出现了无锡东林党人的清议运动。由于皇帝不理朝政，政府官员乐得相互结党倾轧。张居正任首辅时期，御史不是噤若寒蝉，就是以张居正为进退，曲意奉承，成为党争工具。此后，阁臣与御史、文官争斗不休。不久，这些文官被迫致仕返乡，他们聚集于东林书院，讲学之余，讽议朝政，月旦人物，以求政治之清明。四面出击的结果，自然是四面树敌，遭到不同派系的反对。

总体看来，或许可以说，东林党人的运动是从澄清吏治开始的。这场值得称颂的运动的领袖人物，是赵南星和他的朋友顾宪成。他们从罢免自己子侄的官职入手实施改革，企图选贤用能，罢黜了一些宦官和大臣的门生、姻亲，因此得罪了首辅王锡爵。正如顾宪成所说，在一场“君子”与“小人”的斗争中，这样的改革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党争，这是很正常的。但要是说明朝的灭亡应归咎于这些士大夫，而不是腐败的宦官和不知羞耻地依附于宦官的官员，那就太荒谬了。毕竟，没过几年，这些正直的官员就相继离开了官场。顾宪成去官以前，与首辅王锡爵有一场谈话，王说：“近有怪事知之乎？”顾问：“何也？”王曰：“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

顾宪成 1594 年罢官，退处书院讲学，是最后离开朝廷的。他开启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继承了清议运动的传统，这种运动一直延续了半个世纪，直至明朝灭亡。顾宪成等几位东林党领袖以忠臣之名深孚众望，东林书院声名远播，于是各地的士子，以及因同样事由而遭贬黜的官员蜂拥而至，讲学与议政并举之风，由是大振。东林书院因而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令阉党深为恐惧。

关于这一点，朝廷公报也曾发挥作用。李三才居官颇有政绩，在其辖区内，翦除盗贼，裁抑矿监税使所雇用的无赖强盗，逢灾荒之年，则减轻百姓的负担，因而得到东林党人的赏识，顾宪成等向朝廷推荐李三才廉直可用，遭到政敌的攻击。这一事件的不寻常之处在于，由于皇帝怠政，李三才的去留问题，悬而未决竟达数年之久。在此期间，李三才可以说是官

不官，民不民，进退不得，成为1609年东林党人与其政敌争论的焦点所在。一名同情顾宪成的御史把顾宪成向大学士推荐李三才的信，刊登在邸报上，结果更使舆论大哗。

不幸的是，东林党人碰上了魏忠贤，此阉臣之恶毒，中国历史上可谓无出其右，东林党人所受迫害的残酷程度，也就史无前例了。他们弹劾魏忠贤，魏则以结党的罪名施以迫害。但此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其实，他们的树敌，乃因毫不妥协地批评得罪了一些官员，这些人便伙同阉臣挟私报复。

东林党的矛头所指，以及致使对立的双方营垒分明的事情，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与后来他们受到的惩罚全不相称。但是这些事件有助于理解这些争论的实质：这种题目，即使是当代的新闻业也会感兴趣的，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册立太子的争论。还有其他例子，如揭露首辅之子涉嫌科场舞弊，大将军遭到错误的指控，蒙受不白之冤等。^[1]但最著名的三个案子，却出现在神秘的皇宫中，分别是挺击案（谋杀太子案）、红丸案（年

[1] 此二人当指翟奎、熊廷弼。翟奎，嘉靖二十一年（1542）任首辅，次年，奎子汝俭、汝孝同举进士，严嵩唆使言官劾其舞弊。嘉靖二十三年，翟奎被削职。熊廷弼为明末军事统帅，天启元年（1621），后金取沈阳、辽阳，明廷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并以王化贞为巡抚。两人一主守，一主战，意见不合。这时朝廷主政者是以叶向高为首的东林党人，熊廷弼早年属楚党，为御史时，“以排东林、攻道学为事”，而王化贞拜叶向高为座主，东林党人处处袒护化贞，熊廷弼的防御计划无法实现。王化贞拥重兵于广宁，熊廷弼仅有数千军士。天启二年（1622）广宁失守，熊、王都被追究责任。东林党人不顾熊、王两人的责任轻重，主张把两人一并处死。熊廷弼无奈，只好乞救于阉党，“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结果又拿不出银子来，得罪了阉党，“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阉党一恨廷弼，东林党人又纷纷改其初衷，申救其冤。这样，魏忠贤又以为熊廷弼贿赂了东林党人，于是熊廷弼就非死不可了。天启五年（1625）被冤杀，“传首九边”，成为东林党人与阉党斗争的牺牲品。熊廷弼事，详见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3—395页。

轻的皇帝死于非命案)、移宫案(皇贵妃企图干政案)。三案扑朔迷离,一时议论汹汹,成为党争的焦点。在后人看来,东林党人在三案中的立场,无疑是正确的。只要他们掌握朝中权力,便总以道义为重,维持着言路的畅通。

第一件案子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一天,一个农民持木棍闯入太子居住的宫殿,显然欲行刺太子。我们知道,万历帝并不喜欢太子,而且,他宠爱的郑贵妃曾积极为自己的亲生儿子谋求皇位继承权。对这个农民的审讯持续了好几年,疑云密布。最初的审讯者认为这个农民是个疯子。按明制,御史有权参加重大刑狱案件的审问。他们要求和最高司法机构一道重新会审。据时人的笔记记载,再审的结果,这个农民并不疯,相反,他很可能是受郑贵妃及其帮凶的雇用前来行刺杀害太子的。案子的曝光,自然会置郑贵妃于尴尬之地,于是,皇帝亲自出面,着人在宫内秘密处决了行凶的农民和两位知道内情的宦官。这一举动,适足证实民众的猜疑:郑贵妃是案子的主谋。

另一件神秘的案件是红丸案。前面提到的那位倒霉的太子,即位才三四天就得了病,腹泻不止,吃了一名内医的药之后,病情反而加重了。大概是觉得前景不妙,皇帝及时准备了遗诏。这时,有人^[1]向皇帝推荐了一位方士,进献所谓的仙药(“红丸”),皇帝早晨服了一粒,渐觉舒畅,下午又服了一粒,睡到第二天凌晨,驾崩了。这时方士早已出宫了。

[1] 指鸿胪寺丞李可灼。

第三件是移宫案。抚育过皇长子的皇贵妃李氏，图谋借皇长子（未来的天启帝）年少之便，垂帘听政。皇长子是个16岁的孩子，李氏挟以自重，企图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她一度把皇长子藏起来，招致朝臣的抗议。她自己住在按礼仪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居住的乾清宫里，而把皇长子藏在另一所宫殿里，想觐见未来皇帝的官员必须先得到她的同意。朝官多人合疏要求李氏马上从乾清宫搬出去。在群臣的强硬要求下，李氏不得不妥协。争论接踵而至：朝官有没有权力如此粗暴地对待皇室成员？东林领袖的态度是，非如此驱逼，皇长子则势难登基。

然而，这个少年皇帝的即位却给东林党人以毁灭性的打击。李氏移宫后，皇帝在内廷无所依恃，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客氏的相好^[1]，就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魏忠贤（也是整个亚洲最有权势的宦官。由于只有东方才有宦官，也可以说魏忠贤是世界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太监）。魏忠贤和客氏都目不识丁*，却逐渐控制了皇宫内外的局面。在宫中，他们把四名指责或得罪过自己的妃嫔处死，一名革去头衔，就连皇后也难逃迫害，她怀孕时，客魏派自己的亲信服侍，皇后不久就流产了。朝官同样遭到谋杀。先后约有百余名朝官上疏，弹劾魏氏，但相继遭到陷害。此后，就没有人敢反对魏氏了。在少年皇帝登基后的前四年再度得势而大权独揽的东林党人，纷纷被罢黜。由此可见，对付宦官的专权，徒有道德勇气是没用的。或许会有人认为，这时无畏而正直的御史应当挺身而出，前仆后继地

* 中国风俗，王子或富家子弟的奶妈在孩子长大后可以留在主人家，并受到尊重。

[1] 明朝习俗，宫女与宦官可以结为名义上的夫妻，称为“对食”。

和宦官作斗争。但是，如果宦官已经拿定主意，对敢站出来的御史见一个杀一个，最终的胜利就不是御史而是刽子手的。这一点，魏忠贤心里很明白，他对付政敌心狠手辣，充分表现了“干练”的个性，成功地把正人君子赶出朝廷，最终操纵了朝中一切大权。为了打击报复东林士大夫，魏忠贤的亲信开列了一百多名不阿附于魏的官员名单，给他们加上恶名，统称为“邪人”，一一赶出朝廷。又列出依附魏党的官员六七十人——按他们自己的说法，这些是“正人”——以备进用。说得倒是好听，但在这个胸无点墨的太监的淫威之下，就像我们要看到的那样，凡是有自尊的人，又如何既能做个关心社稷的“正人”，又继续留任于朝中或地方呢？

东林党人的受难史，就是一部常人难以想像的酷刑史。^{*} 严刑拷打之下，不怕你不招供，正直的大臣被罗织成罪，判处死刑。阉党爪牙四处访查，有敢议论魏忠贤奸恶者一律处死。只要魏忠贤还在台上，大小官僚就会继续阿谀奉承他，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历史的逻辑给我们的教训是，无论何时，杀人如麻者反能得到一时的称颂。公元9—23年建立自己的统治、盗窃汉家天下的王莽，未篡位前，先后有487572人上书要求升他的官，敦促他篡位自立。^[1] 如果魏忠贤有心搞公民投票的话，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99.98%的多数支持。一位士人建议，魏忠贤和魏父应该得到全国

*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四。

[1] 钱穆认为王莽的代汉，是汉儒变法让贤思想的自然结果，应当称为“受禅”，而非“篡权”。王莽失败后，变法禅贤的政治理论就消失了，此乃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大失败，非徒王莽一人的失败。参见钱氏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0—153页。

百姓的尊奉，在孔庙里和孔子父子一体受祭。^{*}还有人称颂魏忠贤“尧天地德，至圣至神”！朝中和地方充斥着这种寡廉鲜耻的吹鼓手，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保住位子。浙江官员首先想出一个聪明的办法，在西湖边上建了一座魏忠贤祠。这可有点不同寻常，因为通常祠堂都是为纪念死者而建的，于是只好把给魏忠贤建的祠堂叫“生祠”。各地官员争相效尤，生祠几遍天下。每建一祠，多者费几十万两银子，少者费几万两，“不但朱户雕梁，甚有用琉璃黄瓦，几同宫殿。不但朝衣朝冠，甚至垂旒金像，几埒帝王”。^{**}开封地方建祠，竟拆毁民舍两千余间。有的地方官奏请建祠的时间稍迟一点儿，就丢了脑袋。由此不难明白，兴建生祠为什么会成为风气了。阉党还强迫百姓尊奉魏忠贤，凡人祠不拜者，也要处以死刑。魏忠贤、客氏还有许多干儿、干孙子，连同魏忠贤的其他爪牙，号称“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都是魏忠贤的忠实党徒。按照中国的礼节，见了皇帝要高呼“万岁”，好比英国人见了英王要喊“天佑吾皇”。魏忠贤的轿子所到之处，士大夫遮道拜伏，山呼“九千岁”，表示他比皇帝仅差了一点儿，可魏忠贤连眼皮都不会抬一下，更别说回礼了。

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即位后，魏忠贤和他手下的另一个太监头目自缢，客氏也被处死。阉党由此威风扫地。士大夫又可以表达意见，舆论再度活跃起来。依附阉党的官员早已臭名昭著，无法再在朝廷容身。当年的

^{*} 这位士大夫没能看到自己愿望的实现，真让人扫兴。他的上疏递到朝廷后，皇帝已经换人了，新皇帝读到这样的上疏，付之一笑而已。译者按：出这个主意的是监生陆万龄。他的上疏，把魏忠贤与孔子相提并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十足一位马屁精（《明史》卷三〇六《阉党》）

^{**} 郑仲夔：《玉座新谭》卷七《丑媚》。

东林党人此时多已故去，但议政传统却为复社这个文学团体继承了下来。那时，阉党余孽阮大铖在南京公然谈兵论剑，招摇过市，复社同志写了一篇讨阮的文字，四处张贴，阮大铖只好从南京溜走。崇祯帝在煤山自杀、北京城易主之后，福王在原明朝官僚的拥戴下在陪都南京登基，是为昙花一现的南明小朝廷。阮大铖得到重用后重修旧怨，良将能臣俱为大铖所害。在形如累卵的时局中，还要闹家务、存门户之见，明朝也就走到了尽头。大铖自己，早早地向满族人的军队投了降，在随军进攻福建途中，僵卧路边石上而死。复社诸同志，有的死在任上，有的起兵作徒劳的抵抗，有的归隐佛门，避居山野。没有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公共批评最后只能落得如此下场……甚至，宦官的威势也会盖过宪法，在民主和独裁的斗争中，纸上的宪法敌不过独裁者的刺刀，独裁者会在“九千岁”的山呼声中，轻而易举地战胜民主政制的花架子。

第二編

現代

第八章

现代报业的开创（1815—1895）

前面几章关于历史的概述，有助于坚定这样的信念：传统中国的议政（政治批评）精神，在适当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会再度开花结果，作为当代新闻事业中真正的民主力量而出现。就新闻事业的技术手段和普及性而论，传统中国谈不上有什么大众新闻事业，有的只是在京城和各省省会特意为一干官僚印刷的政府公报罢了。宋代的时候，这些政府公报已经在士人中十分流行了，到了明清时期，政府公报* 在读书人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16 世纪，已经开始使用活字版印刷**，官办的驿传系统也开始用来传送政府公报。*** 清中叶，出现了商业性质的报房，他们在内阁中雇用线人，抄出当日新闻，然后大量印刷出售，从中牟利。19 世纪时，政

* 参见第二章。

** 参见《亭林文集》，卷三，第 15 页。

*** 参见第二章。

府公报每天出两个版本，晚上出的，只是重要新闻摘要，午夜出的，方是报道的全本。因俱用泥版印刷，墨色黯淡，质量比较差。行销全国的京报，10文一份。在京城，除此之外还有宫门抄，每月取费200文。省城的辕门抄，除了转载京报上的消息外，也有当地新闻。兵部主管的驿传系统，历久生弊，效率低下。私营的报纸，如京西良乡发行的所谓“良乡报”，建立了自己的发行系统，送报很及时，各省常自出资购买之，月费三五千。这时的送报人，一般也兼作私人信差。^[1]

中国的所谓现代新闻事业，即其编辑和出版均以公众利益为目的的新闻事业，肇始于19世纪初，在早期传教士的努力下，得到很大发展。和兴办基督教医院一样，传教士把办报看成“攻心之术”，把它作为传教活动的重要而有影响的部分。有西方报刊的先例，他们当然很明白报刊的宣传功用，而现代报刊所需要的设备，他们也一应俱全，因而外人来华办报的兴起，诚可谓水到渠成。有眼光的传教士，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本来就书卷气十足，很自然地就把精力主要用在了写作上，布道反而没那么重要了。并且，他们以为自己有着远大的使命——马礼逊、麦都思、林乐知（Young J. Allen）、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从更宽广的意义上理解传教，他们解释说，自己的任务就是让中国人觉醒，因而也把介绍现代科学知识作为他们传教的内容之一。现在回过头来看19世纪传教士的活动，功劳最大的可能就

[1] 著于1720年前后的小说《儿女英雄传》中有关于这种送信服务的描写。译者按：一般认为《儿女英雄传》“成书当在道光末或咸丰初”，即1850年左右。参见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下，第606页。

是他们所充当的为这个国家引进现代科学知识的角色了，这对旧秩序的解体，起了很大作用。这个事实，会随着下面的研究而更加清晰。

传教士来华所办报刊，最初为月刊，次为半月刊，直至 19 世纪中叶时，方出现华文日报。中文报刊的发展，大概可以划分为 3 个时期：现代报刊的开创时期（1815—1895），辛亥革命前的新闻事业（1895—1911），辛亥革命后的新闻事业（1912 年至今）。研究中国现代新闻事业，有两位水平很高的开拓者，这便是戈公振与白瑞华（Roswell S. Britton）。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写于 1926 年，次年出版，至今已出了 4 版。^{*} 白瑞华是美国人，他在 1931 年用英文写作了《中国报刊（1800—1912）》（*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出版于 1933 年。^{**} 在这个领域里，两人都是肯坐冷板凳的相当称职的研究者。戈公振积数年之功，搜集了大量罕见资料，包括许多早期报刊的图版和重要文献的复制品。白瑞华借鉴戈著，在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开展自己的研究。出于对事实的尊重，白氏补充、肯定了戈著，尤其是戈氏关于传教士来华办报活动的研究。他的著作里收集了现保存于国外博物馆的早期报刊图片 24 幅。这里就不用亦步亦趋地重复他们的工作了。我会把自己的叙述限定在主要的发展脉络上，在第八、九、十章，主要使用表格，以供读者参考。

19 世纪上半叶，报刊史的主角是米怜（William Milne）、马礼逊、郭士立（Charles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理雅各（James Legge），最活跃

* 上海，商务印书馆。

** 别发洋行（Kelly & Walsh, Ltd.），上海。

的则是麦都思。19世纪下半叶，出现在传教士办报先驱名单上的，是一批汉学家：奚礼尔（Charles Batten Hillier）、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艾约瑟（Joseph Edkins）、李提摩太，其中为首的要算林乐知。这些传教士往往都有中国助手，比较知名的如梁发之于马礼逊，王韬之于理雅各，蔡尔康之于林乐知。王韬本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大学者，或许可以称之为中国记者之父。1860—1870年间，在伍廷芳、容闳等几位早期归国留学生的推动下，华文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厉行禁烟、从而加速了鸦片战争爆发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是第一个注意到西方报刊的官员。他的下属魏源，也是有清一代的著名学者。两人派人翻译西方报刊，借此扩大中国学者的视野。1872年，现代中国最大的日报《申报》创刊，这张报纸现在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1893年，另一大报《新闻报》创刊，成为《申报》的竞争对手。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国人愤而觉醒，导致一大批鼓吹激进的政治与社会改革的报刊出现，开启了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新时期。可以说，1911年的革命，就是这些报刊的作者冒着极大的风险利用各种方式煽动的结果。这个时期（1895—1911），可以说是中国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如果不考虑辛亥革命后发行量的增长和其他单纯由于生产的发展而导致的技术进步，当代报刊的质量是无法与那时相比的。就现代报刊的社会功用和存在价值而言，中国报刊在作为人民代言人方面，进步得异常缓慢。这首先应归咎于袁世凯的统治。其次，应归咎于1927年后反常的政治环境。在作为人民的耳目喉舌方面，当代报刊的作用甚至无法与公元200年时的议政相比。

这里有必要先把那些开创了辉煌的名字列举出来，以便于下文的叙

述。1815年8月5日，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这是第一份中文月刊。1833年8月，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第一份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月刊。1858年，在伍廷芳推动下，第一份中文日报《中外新报》创办，它是香港英文报纸《德臣报》(China Mail)的中文版。^{*} 1864年，《华字日报》在香港创刊，它是现存中文日报中历史最悠久的一家。^{**} 1873年，第一家由中国人在内地创办的中文日报《昭文新报》在汉口出版。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且后来能长期坚持出版的报纸是《循环日报》，创办人是王韬。上海最早的中文日报是《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中文版《上海新报》，这家

^{*} 白瑞华认为《中外新报》是《孖刺报》(Hong Kong Daily Press)的中文版；这里我采用了戈公振的说法。译者按：林语堂的这个说法问题很多。新加坡学者卓南生先生根据新发现的报纸原件指出，《香港中外新报》的前身，创办于1857年11月的《香港船头货价纸》才是中国第一家以报纸形态出版、两面印刷的近代化中文报纸，它是英文报《孖刺报》附设的中文版，每周二、四、六出版，内容以船期、货价、行情和广告等商业信息为主，1864—1865年间易名为《香港中外新报》，大致每周二、四、六出版“新闻纸”，一、三、五发行“行情纸”，1873年改为名副其实的日报。参见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9—115页。白瑞华的说法是正确的，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把《孖刺报》、《德臣报》混淆，无法予以采信。前辈新闻史家、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在为卓著所写的书评中指出：“林语堂出版于1936年的《中国报刊和舆论史》一书，关于香港早期中文报纸的简略介绍，完全依据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其错误可想而知。……林语堂却起而声称不同意白瑞华的意见，已经到了盲从的程度了。”参见宁树藩：“新加坡人对中国报业史研究的新突破”，载卓南生前引书，第251页。

^{**} 根据卓南生的研究，《香港华字日报》创刊于1872年，而不是林语堂所依据的戈公振所说1864年。参见卓南生前引书，第153—178页。

[1] 原文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时间误为1815年8月6日。以下译文对报刊史实的订正，除注明者外，均据宁树藩等：“《中国报学史》史料订误”，《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后文不再一一注明。

短命的报纸出版于1862年。^[1]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由梁发协助米怜和马礼逊出版。梁发后来成为第一位华人牧师。汉学家马礼逊除了办报外，还致力于翻译《新约》，编纂第一部《华英辞典》（这部字典现在很难找到了）。为给译经制板，马礼逊安排米怜和一位最早的中国教徒并刻字工人远赴域外的马六甲，并出版杂志。^[2]初期中文报刊并无市场，只是每逢广东省县科举考试时，由梁发携至考棚，与宗教书籍一起散发。后来，销路渐畅，每期增至两千份，销售于广东及暹罗、安南、马来半岛的华商荟萃之地。^[3]

《中国丛报》第二卷刊文谈到《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里面提到这份杂志的宗旨和有趣的故事：

已故的米怜博士，定居马六甲不久，即创办了一份定期发行的中文出版物，该刊第一号于1815年8月5日付梓刊行，至1822年米怜博士逝世时停刊。米怜博士在这份杂志上发表的评论值得注意。米怜天性热忱，思想开明，行事周密，长于人伦之鉴，能够机敏地抓住各种机会，以研究中国人的性格，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他知道中国人的偏见，知道该如何抨击他们；也了解中国人的苦难，为使他们得

[1] 《上海新报》创刊于1861年11月，而非1862年。这家报纸一直到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1873年1月18日）才停刊。似亦不能称“短命”。创办初期是周刊，1862年改为每周三刊，《申报》创办后，方改为日报的。

[2] 清朝政府禁止传教，马礼逊在出版传教著作时，出现过工人害怕官府追查，而把雕版付之一炬的事故，故有远赴马六甲之举。

[3] 梁发曾于1830年和1833年赴考棚散发宗教小册子，那时他已任牧师并返广东定居，《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已停刊多年了。此亦袁戈公振之误。

到解救而奋斗，至死而后已。1819年，在这份杂志出版四周年之际，米怜曾自述其办报旨趣：

第一期本报文字印刷，胥不免于简陋之讥。惟积学之士，当能心知其意，而曲为之谅。记者深愿此后假以时日，俾得于中国文字研究益深，而逐渐加以改善。至本报宗旨，首在灌输知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本报虽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惟一急务，然其他各端，亦未敢视为缓图而掉以轻心。智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又安可忽视之哉。中国人民之智力，受政治之束缚，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拔者，相沿迄今，二千余载，一旦欲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使之发扬蹈厉，夫岂易事？惟有抉择适当之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不懈，庶几能挽回于万一耳。作始虽简，将毕必巨，若干人创之于前，若夫辈发挥光大，则后之学者，责无旁贷矣。是故不揣谫陋，而率而为之，非冒昧也，不过树之风声，为后人之先驱云耳。

本报篇幅有限，种种资料，自不能网罗无遗，然非割弃或停止也，将循序而为之耳。前此所载论说，多属宗教道德问题，天文轶事传记政治各端，采择甚寡。此则限于地位，至较预计为少，非本意也。

欲使本报随时改良，以引起读者之兴味，非竭教士一人半月之时间以从事于斯不为功，且须征求外来稿件，以补其不足。记者甚愿致力于是。他日国人（指英人）之习华文者日多，当有佳作以光本报之

篇幅，而年来最不易得者，即此项资料是也。本报发展，尚在萌芽时代，更无报酬可言。三年来月印五百册，藉友人通信游历船舶之便利，以销售于南洋群岛、暹罗、交趾支那各地华侨荟萃之区，而内地亦时有输入焉。近者改印一千册，需要大增，销路渐畅，三四年后，或能增至二千册以上，未可知也。

这里不能不提《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第一份在中国本土出版的中文报刊。此前，曾有两份在海外创办的近代中文刊物：《特选撮要每月纪传》，1823—1826年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出版；《天下新闻》，1828—1829年在马六甲出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办者郭士立，是为荷兰布道会工作的传教士，由于在暹罗（泰国旧称）时被华人家庭收养，郭士立成为一名“归化华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一份“西方文明的辩护书”，通过介绍西方的天文、地理、机械知识，展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用这种方式，西方传教士掀起了用科学文化知识来唤起中国文化觉醒的第一波。《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其中之一，它创办于1833年，于1837年休刊。期间一度改由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接办。后迁至新加坡复刊，在广州由郭士立和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任编辑，在新加坡由麦都思任编辑，只办了一年就停刊了。

传教士来华办报史上的这些先驱人物，同时也是赫赫有名的汉学家、学者。他们知道，在向中国人传播宗教或为传教做准备工作的同时，他们自己必须理解中国文明。理雅各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这一时期，条件不可谓不艰苦，基督教传教士中犹能出现这么多伟大的才智之士，看起来似

乎使人不解，但也并非没有道理。早期传教士做的是筚路蓝缕的工作，敢于投身这一事业的，本身就是精力过人、头脑活跃之士。那时汉学研究之难，譬如一次漫长而精细的自杀，有勇气从事这工作的，想来也不是等闲之辈，因而能践行初志，庶几有成。生命的异常之处就在于，一个人工作越刻苦，他就越多产；一个人打自杀的主意久了，方能感觉生命的存在，这正像许多妇女在生产之后，体格反而健壮了一样。除了理雅各和马礼逊外，这个名单上还有一大串名字。麦都思，中文期刊界最活跃的一位，几乎在每家中文期刊后面都有他的影子。他参与编辑的报刊计有：《特选撮要每月记传》、《各国消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天下新闻》，等等。他还是《遐迩贯珍》最早的主笔。在他之后，奚礼尔、理雅各相继接替他的职位。伟烈亚力创办杰出的科学杂志《六合丛谈》。艾约瑟、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协助林乐知主办《教会新闻》。19世纪最后25年里，林乐知成为报刊史上的主角。为了教会的利益，1868—1902年，他不知疲倦地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知识。《教会新闻》创刊于1868年，初为周刊，1875年易名为《万国公报》，改为每月发行^[1]，由于它也关注非宗教性的新闻，存在的时间又长，加上主笔林乐知独有的个性，《万国公报》成为很有影响的刊物。^[2]1876年，增出《益智新录》，为专言科学之姊妹刊，1891年又增出《中西教会报》。在所有的传教士中，只有林乐知认识到非宗教性报纸的价值——有助于扩大中国人的知识领域，使其观念

[1] 1889年成为广学会机关报后方改为月刊。

[2] 《教会新闻》，当作《教会新报》，1868年9月创办于上海，初创刊时名为《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9月改名为《万国公报》。

现代化。甲午战争期间，林乐知又把《万国公报》上先后发表的文章，增订为《中东战纪本末》专刊，单独印刷，成为这一事件的重要文献，一时销路大畅。

如前所述，19世纪西方传教士所办的报刊，起到了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知识（特别是天文、地理、生理和自然科学知识^[1]），了解西方国家情况的作用。在开拓中国人的天文视野上，17世纪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教士，有很大的功劳。实践证明，西方文明中最能展现其优越性、较少引起争议，且最早打动中国知识分子的，是自然科学的不同分支。

前面提到的郭士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最早致力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报刊。1857年，伟烈亚力创办了综合性刊物《六合丛谈》，内容正如刊名所示，是讨论整个宇宙（“六合”）的。1872年，北京某医院编辑出版《中西闻见录》，该刊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杂志，它致力于报道中西近事，也有文章讨论电报、玻璃、钢铁制造、照相术、蒸汽机等。当时北方多雨，该刊刊登预防水灾之法，一时颇为畅销。1876年易名为《格致汇编》，改由上海发行。^[2]又有天主教所办杂志《益闻录》，

[1] 这里的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包括化学、生物、物理等学科），是相对于地球科学（Earth Science，包括地理学、地质学等学科）和生命科学（Life Science，包括动物学、植物学等）而言的。

[2] 《中西闻见录》是英美等国传教士所成立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机关刊物。负责编辑工作的是丁韪良、艾约瑟、包尔腾。1875年8月，“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决定解散，该刊随之停刊，所有订户及撰稿人都转到傅兰雅在上海筹办的《格致汇编》。有学者认为，不能把《中西闻见录》、《格致汇编》视为不同名称的同一刊物。参见前引《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366页。

1878年发行于上海，1898年与另一家科学杂志《格致新闻》合并，易名为《格致益闻汇报》，1908年又出版科学增刊，每周发行^[1]。1876年，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也出版了科学增刊《益知新录》。事实上，林乐知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扩大中国人的知识领域上了。脚踏东西方文化的他，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历史、哲学和文化制度。他在中国的启蒙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绝不可小觑。可以说，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这类刊物，均刊登有关西方的新闻和介绍文章、科学发现等，如奚礼尔的《遐迩贯珍》、《各国消息》，麦都思的《天下新闻》，对西方文化渗透进中国，颇有助益。诸如基督教传教士兴办的医院之类的西方科学，是传教士手里的王牌，也是最能使思想进步的中国人感兴趣的东西。

伟烈亚力为《六合丛谈》撰写的“小引”，揭示了这类刊物的办刊旨趣，它想走的是一条融科学与宗教于一体的奇特路线，现摘引如下：

是书中所言天算舆图及民间事实，纤悉备载。粤稽中国载籍极博，而所纪皆陈迹也。如六经诸子三通等书，吾人皆喜泛览涉猎而获其益，因以观事度理，推陈出新，竭心思以探突略，舍旧说而创妙法，惟在乎学之勤而已。比来西人学此者，精益求精，超前逸古，启名哲未解之奥，辟造化未泄之奇，请略举其纲：一为化学，言物各有质，自能变化，精识之士，条分缕析，知有六十四元，此物未成之质

[1] 《益闻录》创办于1879年3月，不是1878年，1898年与之合并的是《格致新报》，而非《格致新闻》。合并后，易名为《格致新闻汇报》，为半月刊，内容仍为时事与科学各半。1908年简称《汇报》，分别出版《时事汇编》（半周刊）与《科学汇编》（双周刊）。参见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上，第59—60页。

也；一为察地之学，地中泥沙与石，各有层累，积无数年岁而成，细为推究，皆分先后。人类未生之际，鸿蒙甫辟之时，观此朗如明鉴，此物已成之质也；一为鸟兽草木之学，举一骨即能辨析入微，知全体形状之殊异，植群卉即能区别其类，如列国气候之不同；一为测天之学，地球一行星耳，与他行星同，远地球者为定星，定星之外，则有星气，星气之说，昔以为天空之气，近以远镜窥之，始知系恒河沙数之定星所聚而成，今之谈天者，其法较密于古，中国古时有天元求一诸法，今泰西代数最深者为微分法，以之推算天文，无不触处洞然矣；一为电气之学，天地人物之中，其气之精密流动者曰电气，发则为电，藏则隐含万物之内，昔人畏避之，以其能杀人也，今则聚为妙用，以代邮传，顷刻可通数百万里，别有重学流质数端以及听视诸学，皆穷极毫芒，精研物理。凡此地球中生成之庶汇，由于上帝所造而考察之，名理亦由于上帝所异，故当敬事上帝，知其聪明权力无限无量。盖明其末必深其本，穷其流必溯其源也。泰西历代相传之圣经新旧约书，自开辟宇宙以迄圣子降生，上下数千年间，治乱兴废之事，靡不悉举，读之深信不疑。浏览古今，援考史册，知圣经所言，若合符节。今于是书中，亦当详论之，以明非世人所能臆说其言。帝子耶稣，为世救主，普天之下，咸当敬畏，率土之滨，并宜尊崇，吾侪托其宇下者，自宜阐发奥旨，藉以显其荣光……

这一时期报刊的另一个有趣的特征是，以外报中文版或中文专号形式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的最早的中文日报以及当代发行量最大的两家中文

报纸，均发端于外人之手。1858年，香港《孖刺报》增出中文晚报《中外新报》，成为最早的华文日报。^[1]《德臣报》则创办中文版《华字日报》^[2]。上海《字林西报》则相继出版了中文版《上海新报》、《沪报》。1872年英国茶商美查（Ernest Major）创办中文《申报》，1886年^[3]天津海关税务司英籍德国人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在天津创办《时报》，延英人李提摩太为主笔。上海第一家老牌中文大报《申报》的劲敌《新闻报》，创办于1893年元旦^[4]，初为中外商人合组公司创办，后来该报在美人与英人间数次易手，1929年归华商所有。

可以说，外人（包括传教士和商人）是中国商业报纸的先驱。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外文日报为了扩大读者面，自然想出版中文版，而且他们并不缺乏印刷设备，大多数印厂都有中文活字可资利用。那时，印刷机价格不菲，如果只用来印报，难以收回成本。很多印刷厂就开辟副业，兼印书籍、小册子之类。后来成为首任驻美公使的伍廷芳，看到《孖刺报》印刷厂的中文活字长期闲置，便建议用来出版一期中文专号，这就是《中外新报》的由来。《中外新报》实为华人单独持有，所有营业权利皆属华人。其互惠条件为，《孖刺报》向《中外新报》免费提供印刷设备，《中外新报》则免费刊登《孖刺报》所招徕之西人广告。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在《字林西报》的印刷厂里看到了《上海新报》停刊后弃用的全副中文活字，以为可惜，遂以之续出《沪报》。

[1] 参见第85页注*。

[2] 参见第85页注**。

[3] 原文误为1866年。

[4] 公历为1893年2月17日。

美查 1872 年 3 月 20 日^[1]创办《申报》，纯以赢利为目的。他起初与其兄贩茶于中国，后见日报勃兴，有利可图，遂改事报业。为了不被指责怀有文化动机，他还创办了点石斋石印书局、图书集成铅印书局（用活字重印康熙时代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申昌书局、燧昌火柴厂与江苏药水厂。美查是位颇有远见的商人。他明白中文报纸必须抛弃任何宣传动机，应当为公众利益服务，除了中国人想知道的新闻外，这份报纸不会刊载别的东西。这种提供新闻而非宣传的个性，使它能继续出版到今天。1889 年，美查忽动故国之思，乃添招外股，改为美查有限公司，收回其成本归国。1906 年，由报馆买办席子佩接办，名义上仍归外人所有。^[2]1911 年^[3]，《申报》售与史量才，于是完全归于华人。史量才为该报的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直至 1935 年被暗杀。^[4]这份报纸目前仍属史家所有。

继外国人开创华文报纸之后，19 世纪 70 年代，国人开始创建自己的日报。其中最早的是 1873 年在汉口创办的《昭文新报》，不久就停刊了。之后，1874 年，广州出版了两份华人报纸。^[5]中国新闻记者的先驱王韬，创办了至今仍在出版的《循环日报》。王韬投身新闻事业，实为造化

[1] 《申报》创办日期公历为 4 月 30 日，阴历为三月二十三日。

[2] 席子佩接办申报当在 1907 年，原文误为“售于报馆买办之子”（sold to the son of the comprador of the daily），或是误读《中国报学史》“由申报馆买办席裕福（子佩）借款接办”所致，见该书第 75—76 页。席子佩当是前任买办席子眉（裕祺，1840—1897）之弟。

[3] 1912 年 9 月，著名资本家张謇、应德闳、史量才等人斥资 12 万元购进了《申报》，次年方由史量才接办。据前引《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 1019 页。

[4] 史量才被暗杀于 1934 年 11 月 13 日。据前引《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第 454 页。

[5] 此说似无根据。

所弄，他曾向太平天国某亲王上书，不久，由于太平天国军事失利，王韬的禀帖落入清军手中，被以“通贼”的罪名通缉，避祸香港。在那里，他与理雅各时有往还，并以其渊博的学识，与理雅各合作翻译中国经书。《循环日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长处是王韬撰写的社论，鼓吹学习西方，变法自强，在当时很有影响。这些政论文章后来收入《弢园文录外编》，对爱发怀旧幽情的读者来说，此书仍可一读。王韬的书信，已辑为《弢园尺牍》出版。有趣的是，王韬还主编过一套《香艳丛书》，专收记载文酒伎乐之事的小说。如果你知道中国报纸的副刊一直充斥着这类才子佳人的逸闻趣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如传教士是中文报纸的先驱一样，早期归国的一些留学生和激进派官僚也热衷于办报。1874年5月3日^[1]，近代中国第一位留洋归国学生容闳在上海创办了《汇报》。伍廷芳也是最早留美归国的学生之一^[2]。1886年5月23日^[3]，另一位留学生邝其照创办了《广报》，他还仿照马礼逊的样子，主编了第一本《英华字典》。^[4]

不消说，这一时期的报纸是很粗糙的。从业者的社会地位也不高，封疆大吏左宗棠^[5]一怒之下，批评“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之末路”，颇可代表当时一般人对记者的看法。迨梁启超以学者的身份，出而

[1] 西历6月16日。

[2] 伍廷芳为留英学生。

[3] 西历6月24日。

[4] 一说为协助马礼逊编辑《华英字典》，参见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邝其照”条，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93页。

[5] 林语堂原文误为张之洞，盖张、左均谥文襄，故有此误。

办报，以之为鼓吹变法的媒介，笔锋常带感情，文体独具一格，为报刊文章博得了文学的声誉，新闻记者的地位方为之一变。梁启超开一代文风，诚舆论界之骄子也！当时社会对报纸的看法，从《上海闲话》刊载的一篇文章可以得其大概。这篇文章记载了当时报童沿街兜售报纸的方式和由此给商店造成的困扰：

昔日每日发行之报，无过数百份。每份仅一纸，其事务之简单可知。而偏有一种雇用之人，为今日之所无须，乃为昔日之所必有。其人惟何？则每日挨门送报之人是也。缘今日各报，其发行本埠之报纸，均由贩报者先时订定或由一人承包，已为今日沪上一种专业，若彼时则无有也。而社会间又不知报纸为何物，父老且有以不阅报纸为子弟勸者。故每日出报，外埠则托信局分寄，而本埠则必雇有专人，于分送长年定阅各家者外，其剩余之报，则挨门送于各商店。然各商店并不欢迎，且有厉声色以饬之者。而此分送之人，则唯唯承受惟谨。及届月终，复多方善言，乞取报资，多少即亦不论，几与沿门求乞无异。惟其中有一事，至可为吾人纪念者。报馆每日所出之报，其总数无过于数百份，而社会之不欢迎又如上述，则所谓长年定阅之各家，究系何人？盖大率洋商开设之洋行公司，及与洋商有关系之商店为多。噫！中西人知识之侔，于此可见矣。

1922年，为庆祝《申报》创刊50年，《申报》馆出版了《最近之五十年》，记载了当时报纸的特色和一般内容：

彼时报纸所摭拾报告者，大率里巷琐闻，无关宏旨。国家大政事大计划，微论无从探访，即得之亦决不敢形诸笔墨。故报纸资料，大半模糊而琐细。核其门目，约分数端：一为谕旨、奏折、宫门抄、辕门抄等，备官场中人浏览，借知升迁降调之情形与送往迎来之事迹；盖宦海之珍闻也。一为各省各埠琐录，如试场文字、书院题目，与夫命盗灾异，以及谈狐说鬼等，备普通社会阅之，借为酒后茶余之谈助；盖裨官之别派也。一为诗词，彼唱此和，喋喋不休，或描写艳情，或流连景物，互矜风雅，高据词坛，无量数斗方名士，咸以姓名得缀报尾为荣，累牍连篇，阅者生厌；盖诗社之变相也。此外如商家市价，轮船行期，戏馆剧目，等等，皆属于广告性质，借便一般人士之检查；是又游客之指南针，旅人之消遣品也。要而言之，其时开报馆者，惟以牟利为目标，任笔政者，惟以省事为要诀。而其总原因，由于全国上下皆无政治思想，无世界眼光，以为报纸者不过为洋商一种营业，与吾侪初无若何之关系。

早期中文报刊一览表 (1815—1895)

报刊名称	时期	发行地	备注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i>The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or A Monthly Record of Social Manners</i>)	1815—1821	马六甲	最早的中文期刊，米怜主编，马礼逊、麦都思和梁发曾短期协助编辑。7卷，573页
特选撮要每月纪传 (<i>The Monthly Magazine or A Monthly Record of Important Selections</i>)	1823—1826	巴达维亚 (今雅加达)	4卷，内容涵盖时事报道、历史、宗教、杂文
天下新闻 (<i>Universal Gazette</i>)	1828—1829	马六甲	麦都思主编 ^[1] ，活字印刷

[1] 主编《天下新闻》的是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纪德 (Samuel Kidd, 1799—1843)。

续前表

报刊名称	时期	发行地	备注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i>Eastern-Western Monthly Magazine</i>)	1833—1835	广州	郭士立创办主编, 后改由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接办, 第一份在中国出版的刊物
	1837—1838	新加坡	
遐迩贯珍 (<i>Chinese Serial</i>)	1853—1856	香港	麦都思、奚礼尔、理雅各相继担任编辑的月刊
中外新报 (<i>The 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i>)	1854—1860 ^[1]	宁波	双周刊, 1856年后改为月刊, 玛高温(D.J.MacGowan)主编
六合丛谈 (<i>Shanghai Serial</i>)	1857—1858	上海	月刊, 伟烈亚力主编
中外新报 ^[2] (<i>Chung Ngoi San Po</i>)	1858	香港	第一份中文日报, <i>China Mail</i> 之中文版
上海新报 ^[3] (<i>Shanghai Hsin Pao</i>)	1862	上海	《字林西报》(<i>North China Daily News</i>)中文版, 起初隔天出一期, 后改为日报
香港新闻 ^[4] (<i>Hongkong News</i>)	1861	香港	<i>China mail</i> 的商业增刊, 8卷
中外杂志 (<i>Shanghai Miscellany</i>)	1862—1868 ^[5]	上海	月刊, 麦嘉湖(John Macgowan)主编
华字日报 (<i>Wa Tze Yah Pao</i>)	1864? ^[6]	香港	香港《德臣报》中文版, 现存中文日报中最老牌的报纸
中西教会报 ^[7] (<i>Missionary Review</i>)	1868	上海	林乐知主编, 初为周刊, 后改月刊, 300期后易名为《万国公报》

[1] 《中外新报》停刊于1861年。

[2] 此即指《香港船头货价纸》，它是*Daily Press*（《孖刺报》），而非*China Mail*（《德臣报》）的中文版。

[3] 《上海新报》创刊于1861年，英商《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 1864年改为*North China Daily News*)馆所办。起初为周刊，自1862年起改为每周出版三次，1872年改为日报。

[4] 据卓南生研究，《香港新闻》实际上是《香港船头货价纸》的日本版，即所谓的“官版汉字新闻”，是日本幕府为了获取新知识与海外信息而把中文报刊改头换面的产物，中国从未出版过名为《香港新闻》的月刊。参见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第110—115页，第259页。

[5] 《中外杂志》创刊后，只出六个月即停。

[6] 参见第85页注**。

[7] 此当指《教会新报》，参见第89页注[2]。

续前表

报刊名称	时期	发行地	备注
中外新闻七日报 (<i>Chinese and Foreign Weekly News</i>)	1865	广州	查美司 (John Chalmers, 一译湛约翰) 主编
申报 (<i>The Shun Pao</i>)	1872	上海	美查创办, 当代第一大报
中西闻见录	1872	北京	对西方科学多有介绍, 1876年易名为《格致汇编》, 改由上海发行, 1890年停刊 ^[1]
昭文新报	1873	汉口	国人自办的第一份中文日报, 未几停刊 ^[2]
循环日报	1874	香港	王韬创办的日报, 1875年增出一份月刊
汇报	1874—1875	上海	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创办
万国公报 (<i>Chinese Globe Magazine or Wankuo Kung Pao</i>)	1875—1904 ^[3]	上海	林乐知主编, 1876年出版增刊《益智新录》
小孩月报 (<i>The Child's Paper</i>)	1875	上海	范约翰 (T. M. W. Farnham) 主编, 以插画精美著称。月刊
新报	1876	上海	初创刊时, 曾坚持出双语新闻
广报	1876 ^[4]	广州	邝其照主编
益闻录	1878 ^[5]	上海	初为半月刊, 不久改为周刊, 天主教报纸。1898年与一份科学杂志 ^[6] 合并; 1908年出版又出版一份科学半月刊。名字不断更易 ^[7] 。传教士所创办之杂志中, 当以此为最久

[1] 关于《中西闻见录》与《格致汇编》的关系, 参见第90页注[2]。

[2] 承宁树藩教授见告, 国人在沪所办《民报》(日报)创刊于1873年6月, 较《昭文新报》之创刊于1873年7月要提前一个月。详情可参见前引《宁树藩文集》, 第404页。

[3] 《教会新报》在1874年9月改名为《万国公报》, 至1883年7月休刊。1889年2月复刊, 成为上海广学会机关报, 1907年出至第227期停刊。

[4] 应为1886年6月24日。

[5] 应为1879年3月16日。

[6] 指《格致新报》, 参见第91页注[1]。

[7] 1912年更名为《圣教杂志》。

续前表

报刊名称	时期	发行地	备注
图画新报 ^[1] (<i>Chinese Illustrated News</i>)	1880—1912	上海	连史纸雕刻, 铜板精印
沪报	1883 ^[2]	上海	《字林西报》(<i>North China Daily News</i>) 中文版
点石斋画报	1883 ^[3]	上海	印刷精美的图画杂志(石版), 属《申报》馆所有
时报	1886	天津	李提摩太曾为之撰写社论
益文月报	1887	汉口	月刊, 内容以科学为主
新闻报	1893	上海	初为中外商人合组, 后为美国 Bu-cheister & Co. 所有, 1898 年 ^[4] 转为福开森 (John C. Ferguson) 购得。1906 年, 改组英国公司, 照香港法律注册; 1915 年 ^[5] 又改组美国公司, 照特拉华州法律注册; 1929 年为华人所有

[1] 应作《画图新报》。

[2] 应作 1882 年 4 月, 出至第 73 期时改名《字林沪报》。

[3] 应作 1884 年 5 月。

[4] 应作 1899 年 11 月 4 日。

[5] 应作 1916 年 5 月 1 日。

第九章

革命前的维新报业（1895—1911）

1895年，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受高涨的爱国热潮的激发，中国报刊史上的新时代来临了，自此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这段时期，堪称中国新闻史上的黄金时代。最终颠覆了满洲人统治的政治改革，主要就是靠几乎不考虑赢利、并且经常遭到政府查禁和迫害的报刊来煽动的。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潮都可以从这些出版物里找到：有揭露腐败政治，介绍西方“自由”、“民主”和“宪政改革”理念，呼吁立即推行政治改革的（康有为、梁启超）；有挟极端民族情绪，视驱逐满人为中国惟一希望，号召对异族统治实施致命一击的（章太炎、孙中山）；有鼓吹扩大视野，引进西学，主张自由之思想的（严复）；还有号召整理或保存国粹的（章太炎、刘师培）。这些思潮的交互作用，唤起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民族和政治意识，他们炽烈的爱国之情，汇成熊熊烈火，最终吞噬了满人的帝国。

在此之前，朝廷要人和士林领袖都认识到了报刊启发民智的重要性。封疆大吏袁世凯、张之洞，内阁大臣孙家鼐、文廷式、岑春煊，改革派领袖孙逸仙、康有为和梁启超，学者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纷纷发挥其影响，支持当时的报刊事业，他们与当时的大多数报刊都有密切的关系。为提高官员的觉悟，《时务报》等报刊开拓了官方发行渠道。张之洞在《劝学篇》里，鼓励民众阅读报刊。他与袁世凯在创办政府出版物方面都很积极。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康有为的维新派得以大展身手，畅行其志。变法失败后，维新派被迫转入地下，分裂为两派：保皇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革命派则要求推翻满人统治，建立中华民国（孙逸仙），并先后在上海租界和革命志士流亡地东京出版了机关刊物。1908年，慈禧太后逝世，要不是她在辞世前为确保光绪帝活不过自己，先令人毒害了光绪帝，中国本来还是有机会在满人统治下实行宪政改革的。由于继位的宣统帝尚是个黄口小儿，民众因此对清政府绝望了，加上种族革命的观点早已深入人心，这种政治上的鼓动，竟得以没有限制地在东京和横滨发表。国内的报刊，在批评政府、鼓吹改革方面，也愈来愈大胆，期望的结局终于到来了。

这一时期的报刊，因而产生了神圣的使命感。一般把“强学会”的建立视作这一时期的开端，顾名思义，这是个以读书救国为宗旨的团体，这是个不错的主意。维新派的领袖已经认识到，中国要强大，人民必须有良好的教养和现代的眼光；教育必须普及，而非仅限于少数文人雅士。正如

康有为在给学会机关报所作序言（1895年^[1]）中所说：“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百亿兆人共学。”正是这种崭新的思想意识，使维新派把报刊当做教育民众的重要媒介。本着这种精神，由大臣文廷式出面组织，于1894年^[2]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会中值得注意的成员还有张之洞、袁世凯、孙家鼐、陈宝琛、岑春煊等。此时，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正不断地向皇帝呈递鼓吹变法的万言书。康有为听说北京成立强学会的消息后，即北上参加。1895年，学会兴办图书馆，收藏译书，出版报刊，一时声名大振。袁世凯带头捐助了500两银子^[3]，出版赫赫有名的《中外纪闻》，编务由梁启超与英人李提摩太负责，日出一册^[4]，委托《京报》用木板雕刻印行，并随《京报》免费分送在京官员。同时，上海强学会发行机关报《强学报》，每日出一小册，亦不取费。守旧派见维新派报刊的影响力而忌之。1896年2月，皇帝下诏查禁上述刊物，文廷式亦被革职。诏书说：“御史杨崇伊奏参翰林院学士文廷式一折，据称文廷式在松筠庵广集徒众妄议朝政，及贿通内监结党营私事。虽查无实据，事出有因。文廷式着革职永不叙用，并即行驱逐回籍，不许逗留。”^[5]1895年开始的维新报业，乃告一段落。

[1] 应作1896年，序言指《上海强学报后序》。

[2] 应作1895年8月，正式开办约在11月间。

[3] 参见前引《中国报学史》第121页，“袁世凯首捐金五百”。

[4] 应为双日刊。

[5] 《强学报》创刊于1896年1月12日（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为五日刊，并非日出一册。清廷下谕封北京强学会和《中外纪闻》，是在1896年1月20日（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这里所引用的诏书，并非1月20日的，而是在强学会等关闭之后，弹劾文廷式的。

上海强学会遂于1896年7月，把原《强学报》改为《时务报》。《时务报》每周一册^[1]，每册20余页^[2]，平板印刷，用纸考究，所载以域外报译居多。时四方士子，慕强学会之名，群起而组织学会，如长沙之湘学会、衡州之任学会、苏州之苏学会、北京之集学会，其他如算学会、农学会、天足会（反缠足学会）、禁烟会等。每一学会必有一刊物以发表意见。湖广总督张之洞是《时务报》的主要发起人，除了捐款若干作开办费外，他还拨官费订购288份，发给全省大小衙门及书院学堂。年少气盛的梁启超，由于忍受不了张之洞专横跋扈的性格，很快离开了报社。梁启超与《时务报》另外一位创办人汪康年不合，两人不久就在报上打起了笔仗。汪康年透露，报社得到很多捐赠，计共收银11000余元，又2600余两，此外尚有订报费58000余元。维新派在失势前，把《时务报》改为官办，名称也改为《时务官报》。汪康年被迫把自己的出版物易名为《昌言报》。^[3]

接下来谈一谈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梁启超。辛亥革命能够发生，他那枝如有魔力的健笔，功不可没。淹贯文史的梁启超，以其聪明才智和满腔热情，把古典学识与他所热衷的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和制度，特别是自由、民主、宪政改革的理念结合起来，开创了一种不受束缚的文体，

[1] 应为旬刊。

[2] 应为30余页。

[3] 《时务官报》并未办成。汪康年实际主持《时务报》报务。康有为欲借帝力将报纸收回。光绪帝虽已下诏同意将《时务报》收归官办，但汪康年已抢先一步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了。维新派失败之后，此事遂不了了之。当时的舆论对康有为的做法颇多“隐讽”，皆“右汪而左康”。参见前引《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572页。

成为1917年文学革命之先声。维新运动失败后，慈禧太后悬赏缉拿梁启超，他被迫流亡日本。1898年，他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报纸的名字让人想到前面讨论过的东汉清议运动（第四章），每旬出版，内容包括他自己撰写的政论、“新书译丛”、“外论汇译”、“群报撷英”等，有不少篇幅是抨击满族大臣荣禄的。这份报纸发行了3年。在国内，它被清廷禁止。1900年1月15日的上谕，明令禁止刊行和康梁有关的出版物，可见它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之大与对清廷的困扰之甚：

前因康有为、梁启超罪大恶极，迭经谕令沿海各省督抚，悬赏缉拿，迄今尚未弋获。该逆等狼子野心，仍在沿海一带，煽诱华民，并开设报馆，肆行簧鼓。种种悖逆情形，殊堪发指。着南洋、闽、浙、广东各省督抚，仍行明白示谕，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逆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如该逆犯早伏天诛，只须呈验尸身，确实无疑，亦即一体给奖。此项银两，并着先行提存上海道库，一面验明交银，免致展转稽延。如有不愿领赏，愿得实在官阶及各项升衔，亦必予以破格之赏。至该逆犯开设报馆，发卖报章，必在华界。但使购阅无人，该逆犯等自无所施其伎。并着各该督抚实力严查，如有购阅前项报章者，一体严拿惩办。此外如藏有该逆犯从前所著各逆书，并着严行销毁，以申国宪而靖人心。

明明知道康梁俱已流亡日本，仍有报馆“必在华界”之语，中国公文之病，于此可见一斑。至于“但使购阅无人……”等语，尤见清廷之无可

奈何。由于梁启超的声望越来越高，中国革命志士流亡日本的越来越多，《清议报》及继起的《新民丛报》在海内外华人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新民丛报》1901年创刊于横滨^[1]，半月刊，共出72期^[2]，每册约40页，所载分论说、学说、小说、文苑等，极受学生欢迎，重印达十余次。1907年，梁启超复在上海创办《政论》月刊，旋为清廷封禁。1910年，他又创办《国风报》旬刊，出版于上海。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仍然没有放弃报刊活动。1911年^[3]，他在天津创办《庸言》半月刊，1915年在上海出版《大中华》月刊。直到生命中的最后时刻，他也没有放下那支不知疲倦的笔，一直积极写作政治评论，指导民族思想的前进。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这么说部分是因为，身为学者，梁启超不但精于国学，而且思想进步，满腔热情地鼓吹西方的政治理论和制度。从1920年代开始，梁启超把精力更多地用在向青年学子讲授中国的传统学问特别是历史学上。这位一代伟人，有36卷皇皇巨著传世。在《新民丛报》等报刊发表的政论，都收在《饮冰室文集》里。这本书流传极广，辛亥革命前夜，青年学子几乎人手一册。最能体现梁启超为变法图强所作的热忱请求的，或许是《中国魂》一书，在这本书里，他为中国人缺乏积极进取、高瞻远瞩的大丈夫气概作了有力的呼吁，读之令人心折。^[4]他的比较重要的历史著作包括：关于宋朝伟大改革家的《王安石传》、《中国历史研究

[1] 应作1902年2月。

[2] 应作96期。

[3] 应作1912年12月1日。

[4] 参见林语堂在《拾遗集·狂论》中的叙述：“梁任公于《中国魂》末篇《论进取精神》已指出中国无进取精神之病源……中国男子皆有好妇德，是梁任公之名言，记之记之。”

法》、《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 等。

翻译过亚当·斯密、斯宾塞、斯图亚特·穆勒著作的严复，虽然不如梁启超多产，却以其独特的方式，作出了同样卓著的贡献。1897年，严复参与创办了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报》，该报发行时间虽然不长^[1]，却极为优秀。严复为创刊号所写的“缘起”，典型地体现了那时受过西方教育、进步的中国人对待西方文明的宽容而开明的态度。在概述了维新派的报刊活动，指出那时诸报“大抵日报则详于本国之事，而于外国之事则为旁及；旬报则详于外国之事，而于本国之事则为附见”之后，严复写道：

然则今日谋吾群之道将奈何？曰，求其通而已矣。而通下情，尤以通外情为急。何者？今之国，固与各国并立之国，而非一国自立之国也。吾试言吾民不通外情之弊。今欧美教士，足迹遍天下，大都蒙犯霜雪，跋涉险阻，耗资财，劳筋骨，以求其所谓尽人事天之道。此不独在吾中国然也。而吾民之相遇者，视其劝善之书，则以为收买人心矣；得其治病之药，则以为迷拐人口矣。此不通西儒之所谓教也。游历之士，或登高山，涉大川；地学之家，或搜古迹，考物产，以求其所谓博物穷理之学。此亦不独在吾中国然也。而吾民之相遇者，睹其筹笔之记载，则以为侦探矣；见其测量之仪器，则以为魔术矣。此不通西士之所谓学也。尤甚者，见其男女之交际，而或疑为淫乱；见

* 此书曾由 L.T.Chen 翻译为英文，在伦敦开根宝罗 (Kegan Paul) 出版社出版。

[1] 由于政治环境恶劣，《国闻报》曾多次伪称卖给日本人，“挂洋旗”以自保。1899年才真正卖与日人。至1901年，改名为《天津日日新闻》。

其贵贱之杂坐，而或讥为野蛮。此不通西人之礼俗也。其诸类乎此者，更仆不可以悉计。坐是不通之弊，于是平居无事，则互相猜忌，积不相能。仓卒之间，毫毛之事，群然而哗，激为事变。数十年来，如闹教案，杀游士，不一而足。上烦九重之虑，下竭举国之力，仅而后安。不通外情，其流弊乃至于此，可胜痛哉！可胜悼哉！然则求吾民通知外情之道将奈何？曰，欲通知外情不能不详述外事，欲详述外事不能不广译各国之报。此国闻报馆之所为继诸家而起也……

因为《国闻报》是日报，为达到通外情的目的，又增出旬报《国闻汇编》，刊载俄、英、法、德、美、日各报译文。

百日维新期间，在变法大潮推动下，上谕一道接一道，在全国实施文化、政治方面的重大改革，推动了根本的变法。结果为慈禧太后扼杀，光绪帝被迫交出权力，实际上被幽禁起来。戊戌变法的失败进一步激发了民众对彻底变革政治秩序的要求。在崇高的爱国主义和神圣的使命感的激励下，中国出现了维新报业的大繁荣，为引进西学、重建社会和文化而摇旗呐喊。尽管当局对这些报刊活动，或查禁，或不屑一顾，全国各地还是涌现出大量报刊。这些报刊，品种繁多。在介绍西学方面，有章太炎的《经世报》（1897年创办于杭州）、长沙某书院创办的学报《湘学新报》、四川的《渝报》和《蜀学报》、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1901年创办，初为月刊，后改半月刊，可能是中国目前历史最悠久的杂志^[1]）。其他还

[1] 创办时间应作1904年3月11日。

有农、商、工各业的报纸，如《农学报》（1897）、《工商学报》（1898）；致力于物理学、算学的，有1897年在上海出版的《新学报》、1898年创办的《格致新闻》；专言教育的，有《教育世界》（1901）、《教育杂志》（1909），后者亦由商务印书馆创办，至今仍在发行。其余尚有种种专言女权运动、儿童教育、外国语、侨商、地理、法政的杂志，都曾繁荣于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

值得称道的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白话报，如《无锡白话报》，1898年由第一位女报人裘毓芳创办^[1]。知识界的另一个重要动向，是保存国粹运动的发起，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于1904年^[2]创办《国粹学报》。所有这些报刊，在1912年民国建成前，都有效地唤起了民众。

在公然反对清政府的政治鼓动中，《苏报》（1897^[3]，上海）、《民报》、《复报》（1905年、1906年分别创办于东京，前者刊载汪精卫、胡汉民鼓吹革命的文章）以及现任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的《民呼报》^[4]（1908^[5]）、《民吁报》^[6]（1908^[7]）、《民立报》（1909^[8]）扮演了杰出的角色。清政府眼看就要倒台了，于右任和他的同志奔走呼号，起了摧枯拉朽的作用，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 《无锡白话报》由裘廷梁创办，裘毓芳是裘廷梁的远房侄女，在报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并与裘廷梁共同主持编务。

[2] 应作1905年2月。

[3] 应作1896年。

[4] 应作《民呼日报》。

[5] 应作1909。

[6] 应作《民吁日报》。

[7] 应作1909。

[8] 应作1910。

《苏报》因为出现“文字狱”，而成为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报刊。《苏报》创办于上海租界，以创办人之妻（日人）的名义，在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创办人是一名被罢职的官员^[1]。《苏报》勇于揭露当时的官场腐败。其主张从起初的保皇，一变而为驱逐满族统治者，鼓吹种族革命。著名学者、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章太炎、蔡元培均与《苏报》有密切关系。1807年^[2]，革命作家邹容出版了政论小册子《革命军》，章太炎除了为之作序外，还在《苏报》发表了书评。^[3]清廷为之震怒，要求查封报馆，严拿编辑。结果吴稚晖逃脱，章太炎等人被捕获。^{*}在租界公堂审理此案时，《苏报》发表的更多的煽动性文章被揭发出来，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满人九世深仇”，“杀人主义即复仇主义，以四万万人杀一人（指皇帝），能不快心”等等。从法律上来说，这样的文章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揆诸常情，章太炎等本当处决，由于当时民气激昂，老百姓对这些革命作家多抱同情之心，清廷仅判决章太炎、邹容永远监禁了事。即使如此，仍不足以安抚民心，领事团亦有异议，遂改判邹容监禁两年，章太炎监禁三年罚做苦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清廷已无药可救。与民众的呼声为敌，清政府倍感绝望。

* 两人在书信里相互攻讦，成为中国“辱骂丑诋文学”（vituperative literature）之样本。

[1] 《苏报》创办人为胡璋（铁梅），其妻生驹悦系日人。原文所说的“创办人是一名被罢职的官员”，当指在胡璋之后出资买下《苏报》的陈范，陈范曾任江西铅山县知县，后因教案被罢官。《苏报》在胡璋时代，实为日本军国主义组织黑龙会控制的工具，到了陈范时代，才成为一张革命报纸。参见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第280页。

[2] 《革命军》出版于1903年5月。

[3] 《苏报》发表的书评是章士钊撰写的（1903年6月9日），笔名为“爱读《革命军》者”，同日在新书介绍栏刊发了一条书讯。6月10日刊发了章太炎的序言。

1906年，还是在东京，革命党人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与保皇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爆发了一场恶战。东京是革命志士最为活跃之地，留学生（多为被流放者）在这里办了20余种刊物，鼓吹政治和广泛的社会改革。论战虽发生于东京，事实上却席卷了为数众多的海外港口，如新加坡、爪哇、旧金山、纽约、温哥华和巴黎。各地报纸纷纷以主张的不同——保皇或革命——划分为两派。保皇党人认为，采用渐进的演变，避免翻天覆地的变革，中国就可以实现平稳得多的进步；但革命党人特别是那些激进派的回答是，只有驱除满人才是建立新政府的根本，他们只能接受共和政府。这些纸上的争论并没有解决问题，但清政府已失去了民心。如果它有诚心立宪，本来是可以挽救自己的命运的。

清廷之虚弱，于《苏报》案中暴露无遗。对身处其中的造反大潮，它既害怕，又无力抵抗。来自日本的留学生报刊的影响越来越大，尽管有官方的禁令，但仍能运用种种办法让国内的学生看到，就像溅出的水流总能找到地上的裂缝并穿透它一样。在这里，笔杆子比枪杆子的力量更可怕。在东京的孙逸仙博士和一班革命志士，经常向数千如醉如痴的留学生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们所鼓吹的思想，总能传回国内，激起强烈的反响。形势到了这样的地步：地方政府无力或者根本就不愿意干涉报刊的批评，除非有直接来自北京的命令。北京重新祭出查禁的法宝，但起不了作用。依照1900年的一条上谕，学生不得在报刊上刊布文章，不得充当报刊的主笔或访员，不得私自购阅革命报刊或夹带革命报刊进入学堂。另一条上谕，令人好奇地举“东西各国”为例，说明除非得到教育部门许可，外国学生也不准私自带书进入学堂，并下令学堂中如有购阅此类报章及为之寄

售散播者，学生应即时开除，并加以惩治，校方人员则一律撤职。

这些命令，与末代王朝颁发的其他命令一样，徒具形式，从来没有被严格地执行过。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里举了六七个不同省份查封报馆的例子，但多数是因为这些报纸攻击了当地的官僚。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据我所知这段时期只有一名编辑被杀，因为他揭露了重庆地方官员的腐败。这自然是非常危险的。^[1]

除了这类直接从事政治宣传的报纸以外，从报业的全面发展来看，这一时期值得特别介绍的日报还有《时报》。1904年创办这份报纸的狄楚青，现在是一名隐退的佛教徒，日以搜集古玩、刊印碑帖名画为事。他早年曾从事革命活动，失败后转而致力于经营和改进《时报》。《时报》体现了报业健康、进取的一面，它和《申报》在业务上的竞争，为中国报业开启现代化之路作出了贡献。每有大事，《时报》总要为民族福祉而鼓吹。它先后开设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文艺等增刊。《时报》的办报方针和个性，在它的《发刊例》里有大致的说明，基于以上原因，有必要在这里重温一下它的部分内容：

第一，本报论说，以公为主。不徇一党之意见……

第二，本报论说，以要为主。凡所讨论，必一国一群之大问题。

若辽豕白头之理想，邻猫产子之事实，概不置论，以严别裁。

第三，本报论说，以周为主……

[1] 当指《重庆日报》揭露知府鄂芳劣迹事，主笔卞小和被监禁，死在狱中。

第四，本报论说，以适为主……

第五，本报纪事，以博为主。故于北京天津金陵，均置特别访事；其余各省皆有坐访。又日本东京置特别访事二员，伦敦、纽约、旧金山、芝加哥、圣路易各一员，其余美洲澳洲各埠皆托人代理。又现当日俄战事之际，本馆特派一观战访事员随时通信。又上海各西报，日本东京各日报及杂志，皆购备全份，精择翻译。欧美各大日报，亦定购十余家备译。务期材料丰富，使读者不出户而知天下。

第六，本报纪事，以速为主……

第七，本报纪事，以确为主……

第八，本报纪事，以直为主……

第九，本报纪事，以正为主……

第十，本报特置批评一门，凡每日出现之事实，以简短隽利之笔评论之。使读者虽无暇遍读新闻，已可略知梗概……

第十一，本报每张附印小说两种，或自撰，或翻译……

第十二，本报设报界舆论一门，凡全国及海外，所有华文报章共六十余种，本报悉与交换。每日择其论说之佳者，撮其大意叙述之……

第十三，本报设外论撷华一门，凡东西文各报之论说批评，其关于我国问题及世界全局问题者，则译录之……

第十四，本报设介绍新著一门，凡新印各书，每礼拜汇录其目，及出版局名，定价数目，其善本加以评论……

第十五，本报设词林一门，诗古文辞之尤雅者随录焉。

第十六，本报设插画一门，或寓意讽事，或中外名人画像，或各国风景画，或与事实比附之地图，随时采登。

第十七，本报设商情报告表一门……

第十八，本报设口碑丛述一门，其有近世遗闻轶事，虽属过去，亦予甄录……

第十九，本报设谈瀛零拾一门，凡世界之奇闻琐记，足以新我辈之耳目者，亦间录焉……

第二十，本报于京钞及官私事件，取材务博，别裁务精，要者不遗，蔓才不录。

第二十一，本报编排，务求秩序。如论说、谕旨、电报及紧要新闻，皆有一定之位置，使读者开卷即见，不劳探索……

第二十二，本报编排，务求显醒。故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字模及各种圈点符号，俱行置备。其最紧要之事则用大字，次者中字……

第二十三，本报遇有紧要新闻特别电报，当发传单，以期敏速。

第二十四，本报别类务多，取材最富。既用各小字排入，尚虑限于篇幅，不能全录，特于每日排印洋纸两大张，不惜工资以求贍博，而定价格外从廉。

第二十五，本馆广聘通人留局坐办外，尚有特约寄稿主笔数十人，俱属海内外名士，议论文章，务足发扬祖国之光荣。

《时报》的编辑方针别开生面，它在业务上的改革，令当时的新闻界

耳目一新。例如特别通讯员的设置（第五条），短评的设立（第十条），版面编排上，给不同的文章以不同的位置（第二十一条），不同字体的运用（第二十二条）。熟悉今日报业的人，知道了当年《时报》在新闻采编上所定立的目标，不能不对《时报》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而赞叹有加！有些目标，现在的大报尚且不能做到。但最重要的是，与其深思熟虑的办报计划相辉映，狄楚青及其同仁为《时报》成功地注入了爱国精神、理想主义和真正的进步视野。

重要报刊一览 (1895—1911)

名称	创办时间	地点	备注
中外纪闻	1895	北京	强学会机关报，由清廷封疆大臣发起。1896年被禁
强学报	1895 ^[1]	上海	上海强学会出版
时务报	1896	上海	由上述两报被查封后改办。平板印刷；由张之洞发起。1898年收归官办，改名为《时务官报》 ^[2]
知新报	1897	澳门	最早每五天出一期，后改为每十天出一期。用纸考究。1898年停刊。变法时期报刊中较重要而有影响的一家 ^[3]
湘学新报 (简称湘学报) ^[4]	1897	长沙	旬报。致力于引进新知。长沙校经学堂机关报。维新派大本营之一
经世报	1897	杭州	章太炎等编辑，多译英法文报章
实学报	1897	上海	附刻中西文书籍甚多，均未全
渝报	1897	重庆	旬报。木刻贡川纸印。出至十六期而止
农学报	1897	上海	每半月发行，介绍农业知识。自1898年起改为旬报。共出315期
新学报	1897	上海	算学杂志

[1] 应作1896。

[2] 参见第104页注[3]。

[3] 知新报始为五日刊，自第20册起改为旬刊，至第112册起，又改为半月刊。到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1901年1月20日），出至第133册。停刊时间未详。

[4] 应作“自第21册起更名为《湘学报》”。

续前表

名称	创办时间	地点	备注
通学报	1897	上海	初为旬报, 1899年起改为月刊。英语及世界语爱好者的杂志
苏报	1897 ^[1]	上海	以出版人之妻(日人)名义注册于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吴稚晖编辑 ^[2] 。由于刊登煽动性的排满文章, 遭清廷迫害, 1903年被查封。编辑邹容及章太炎入狱 ^[3] , 成为耸人听闻的事件
国闻报	1897	天津	严复创办。出版有增刊《国闻汇编》
时务日报	1898	上海	《时务报》出版的日报。《时务报》改为官办后, 此报改名为《中外日报》
昌言报	1898	上海	《时务报》收归官办后, 主持者利用原有的设备创办
清议报	1898	横滨	旬报。梁启超主办
蜀学报	1898	成都	旬报。木刻印刷
东亚报	1898	上海 ^[4]	旬报
格致新闻 ^[5]	1898	上海	介绍自然科学的传教士报刊
无锡白话报	1898	无锡	第一份白话报 ^[6] , 主编裘毓芳女士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报人 ^[7]
求我报	1898	上海	提倡儿童教育的报纸, 连史纸石印
商务报	1899	上海? ^[8]	旬报。志在改良商业
中国日报	1899 ^[9]	香港	最早的排满革命报刊之一
新民丛报	1901 ^[10]	横滨	旬报。共出72期 ^[11] 。梁启超主办的极有影响、且有重要地位的报纸

[1] 应作1896。

[2] 陈范接手《苏报》后, 邀女婿汪文溥为主笔, 至1903年5月27日聘章士钊为主笔。吴稚晖未曾担任过主笔, 他自己曾说: “余并未主持《苏报》, 去年及今年不过常常采登余文而已。”参见《上海苏报案记事》, 《辛亥革命》第1册, 第390页。转引自唐振常: “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辨”, 载《香江论学集》,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140页。

[3] 邹容与章太炎均非《苏报》编辑。

[4] 应为日本神户。

[5] 应作《格致新闻汇报》, 参见第91页注[1]。

[6] 第一份白话报应为1897年11月在上海创刊的《演义白话报》。

[7] 参见第109页注[1]。

[8] 《中国报学史》未载报社所在地, 故作者加一问号, 以示存疑。1895—1911年间, 上海未有名《商务报》者。宁树藩教授认为, 此当指北京《商务报》。

[9] 应作1900。

[10] 应作1902。

[11] 应作96期。

续前表

名称	创办时间	地点	备注
东方杂志	1901 ^[1]	上海	可能是目前历史最悠久、发行量最大的中国期刊。初为月刊，后改为旬刊。商务印书馆出版
译林	1901	上海 ^[2]	翻译杂志，由一群福州学者编辑（林纾、林长民、魏易）
普通学报	1901	上海？ ^[3]	科学月刊
外交报	1901 ^[4]	上海	致力于外交事务的旬报，出至132期而止 ^[5]
教育世界	1901	上海	初为旬报，后改为半月刊，教育杂志
鹭江报	1902	厦门	旬报。出至86期而止
政艺通报	1902	上海	旬报。出至1909年而止
中外算报	1902	上海？ ^[6]	算学月刊，共出版20余期
大陆	1903 ^[7]	上海	归国留日学生创办的综合性杂志，共出版34期
浙江潮	1903	东京	留日浙江学生创办。月刊，共出版12期。这本杂志及下面要提到的两种杂志是1903—1911年间中国留日学生报刊事业的具有代表性的杂志
湖北学生界	1903	东京	湖北留学生创办的存在时间不长的月刊
江苏	1903	东京	江苏留学生创办，出版8期而止 ^[8]
国民日日报	1903	上海	由《苏报》中人发起，由外人高茂尔（A.Comoll）出面登记。因“恶毒”攻击清廷而被禁 ^[9]
时报	1904	上海	辛亥革命前十余年中最为先进的报纸，《申报》的重要竞争对手。狄楚青主办。现在已沦落为低级小报了
日俄战纪	1904	上海	关于日俄战争的刊物。商务印书馆主办
国粹学报	1904 ^[10]	上海	国粹派重要刊物。章太炎、刘师培主办。共出82期

[1] 应作1904。

[2] 《译林》编行所设在杭州，在上海印刷。

[3] 《中国报学史》未载报社所在地，故作者加一问号，以示存疑。承宁树藩教授见告，此报确为上海出版。

[4] 应作1902。

[5] 1911年停刊，共出300期。

[6] 《中国报学史》未载报社所在地，故作者加一问号，以示存疑。承宁树藩教授见告，此报确为上海出版。

[7] 应作1902年。

[8] 出至1904年5月15日第11、12期合刊后方停刊。

[9] 该报因编辑部与经理部闹纠纷而自动停刊。参见前引《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738页。

[10] 应作1905。

续前表

名称	创办时间	地点	备注
警钟日报	1905 ^[1]	上海	《俄事警闻》之后身，蔡元培等经营。因猛烈抨击清廷，编辑遭清廷逮捕。经理事先出逃
复报	1905-6	东京	著名的排满报纸。刘师培 ^[2] 创办
民报	1905-6 ^[3]	东京	影响重大的排满报纸。张继 ^[4] 编辑，汪精卫、胡汉民经常在这里发表观点犀利的文章。有明显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
京报	1906 ^[5]	北京	日报，汪康年创办。影响也很大。1911年停刊 ^[6]
国文报	1906	济南	旨在保存国学，后改名为《山东国文报》，出至28期而止
政论 ^[7]	1907	上海	梁启超主持的政闻社之机关刊物
农工商报	1907	广州	每旬出版，1910年停刊
国风报	1909 ^[8]	上海	每旬出版，共出53期，也是梁启超的机关刊物
民呼报 ^[9]	1909	上海	此报跟下面的两份日报，合称“竖三民”，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主办。共出版93天 ^[10]
民吁报 ^[11]	1909	上海	于右任资助出版，专以攻击日本为事，驻沪日本领事请上海道封禁。共出版42天 ^[12]
民立报	1910	上海	或许是辛亥革命前夜最有影响、编排最佳的革命报纸。1915年 ^[13] 停刊。革命领袖、据说遭袁世凯暗杀的宋教仁为执笔者之一。日销多至两万余份
地学杂志	1910	北京	地理月刊，1919年停刊 ^[14] 。
保国粹旬报	1910	广州	只出版六期

[1] 《俄事警闻》于1904年2月26日更名为《警钟日报》。

[2] 应作柳亚子。

[3] 应作1905年11月。

[4] 张继实为挂名，1—5期的实际主持者为胡汉民。

[5] 应作1907。

[6] 《京报》创办于1907年3月28日，同年8月26日被封。这里说的“1911年停刊”，当指汪康年的另一份报纸《中外日报》。

[7] 原书所附中文名为“正论”，误。

[8] 应作1910年2月20日。

[9] 应作《民呼日报》。

[10] 应作92天。

[11] 应作《民吁日报》。

[12] 应作48天。

[13] 应作1913年。

[14] 1919年并未停刊。1937年出版至第25卷第一期（季刊）。

续前表

名称	创办时间	地点	备注
小说月报	1910	上海	发行量很广的文学杂志，商务印书馆出版
蜀报	1910	成都	半月刊，共出版12期
法政杂志	1911	上海	月刊，1915年停刊

第十章

民国时期的报刊（1912— ）

前面已经提到，1895—1911年，或者说从中日战争到民国建立这段时期，是中国报业史上的“黄金时代”。这句话的含义是，如果把报刊作为表达舆论、自由而不带偏见地传播消息的公器，以这样的高标准来衡量的话，当前从1911年开始的报业，看来正在一步步地倒退（1915—1925年除外）。从物质条件方面来说，当前的报业在印刷、发行方面取得了不容置疑的进步，但这毕竟不能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说当代报业在倒退，看似荒谬，实则自有其“道理”，这就是，政府越“强大”，报业就越弱小，反之亦然。换句话说，一个长得胖了，另一个必然会瘦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就是明证。历来的德国政府，没有比在希特勒治下更“强大”的；也没有哪位美国总统在选举中获得过98%以上的多数。然而，倘若我们本着公平的精神，问一下德国和美国报业的相对价值，则不会有两个答案。对于中国的政府和报业也可作如是观。清末，由于清政府的统

治已处于强弩之末，所以革命前的新闻事业还是有所建树的；相应的，由于“共和”政府的统治能力比清廷强大得多，在自由公正地向公众提供信息和教育方面，这一时期的新闻事业就比以前差远了。

前面我曾把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比作马儿与骑师的关系，也曾这样定义政治体制的民主原则：它给马儿以同骑师对话并质疑其动机和智慧的权利。^{*} 在宪政国家或君主制下，都是如此。君主制下，骑师是政府，马儿是人民，骑师是把马儿引到牧地还是屠宰场，全凭君主个人的喜好。但在共和政府下，或许可以把这个比喻反过来讲。这里，人民是骑师，政府则是马儿。但如果骑师是个小孩子，不知道如何使用缰绳，马儿则是匹来自荒漠的未曾驯化的野马，麻烦就来了。它可以随心所欲地驮着年幼的骑师撒野，到它喜欢的地方去，可以使性子大咬嚼子，弄出种种动静，吓唬骑在它背上的可怜的孩子。可以说，这就是民国报业的现实。

舆论能否影响或实际主导政府的决策，是民主政治的最根本性的试金石。认可了这个定义，现代报业才变得重要起来。除非舆论的权力增强了，能使政府依照它的号令行事，就像用缰绳来操纵马儿的步伐和方向一样，否则，政府在形式上的任何变动都是无用的“花架子”。毋庸置疑，当前中国的人民正处于“训政”时期，从最最善良的愿望出发，可以说他们正处在“宪政”前夜。然而事实证明，所谓的“训政”时期，其实是这样的：马儿成为导师，教训它背上的孩子应该如何使用缰绳，并且这马儿还间歇性地发脾气，十分可怕。它老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听着，孩

^{*} 参见第一章。

子，你不能驾驭我，无论是骑术还是治国，你都一点儿也不懂，你需要做的，就是把缰绳放得松松的，让我独自行动，就会取得胜利。”由于人弱马强的情况经常出现，那动物就僭称自己有权禁止骑手使用缰绳，违者则处以重罚，这样做的理由则是，如果骑手经常牵制它，它就会被导向沟壑或者悬崖。老谋深算的马儿以为只有它自己才知道通往光荣的道路怎么走，对骑手的叫喊深具戒心，并且动不动就发脾气。对骑手，它是极为轻蔑的。

上面的这个比喻，可以说就是自 1912 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画像。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从袁世凯之死到国民革命期间（1916—1925），中国只有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在北京），由于政府控制能力不强，报业的力量自然相应地壮大起来。这里简要回顾一下民国以来的情形。自 1914 年起，袁世凯密谋推翻民国，复辟帝制，这标志着中国报业跌落至谷底。此后，1917 年，张勋的辫子军复辟，尽管只持续了 12 天，却关闭了 14 家北京报纸。随之而来的是北洋军阀的兴起，大大小小的军阀把中国划分为若干势力范围，形成割据之势，北京政府慢慢变成了影子。这是 1920 年代早期的事情了。我一直记得，段祺瑞允许其他作家，包括我本人，在报上发表文章，用一点儿也不恭敬的措辞批评他。他对舆论的宽容，真让人欣赏和感激。国民党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舆论的力量，发动了 1926—1927 年间的国民革命，进而从骑手位置上走下来，成了一匹听老百姓话的赛马。接下来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心理产生了微妙变化，它对嚼子和笼头也厌烦了。也许它背上的孩子真的不够成熟，这马儿也可能真的是匹识途老马，为了背上骑手的最大利益，它喜欢有自行其是的权力。这里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其中的对与错，而仅在于指出这样的事实：现在的政府所拥有的

统治能力，是满族皇室不能望其项背的。

民国肇建，中国一下子出现了 500 余家报纸，北京是首都，独占五分之一。鼓吹帝制的筹安会成立后，袁世凯又以威迫利诱、收买贿赂、笼络腐化、查封禁止、逮捕没收等手段对付报馆，结果北京只剩下 20 家俯首帖耳的报馆，上海只余五家，汉口只余两家。以“危害民国安全”的罪名关闭报馆、逮捕主编，并依照袁世凯在 1914 年颁布、1915 年修订的《出版法》加以惩处，竟成为一时之潮流。法律是和马儿而不是与骑手站在一起的。摧残报业，名誉扫地的是袁世凯，而非报人。为了得到民意的“支持”，袁世凯不得不关闭了许多报馆，以每人 20 个“袁大头”的价钱，外加一顿饭，雇用了一批流氓乞丐，组成一支代表“民意”的队伍，上演了一出“民意”敦促他早日登基的闹剧。事实上，选择停办而不是耻辱地继续出版的报馆占了绝大多数，到了上海剩下五家报馆、汉口只剩两家报馆的地步，这是民族血气未衰的表现。这种受压抑的民意，才是导致袁世凯迅速垮台的真正原因。所以表面上看来，中国的报业受到了挫折，但是中国的民意却在事实上取得了胜利。陈友仁曾在北京办英文《京报》，1915 年，他在即将粉墨登场的“天子”的眼皮底下，怒斥复辟帝制运动，不久即被迫离开北京。^[1]因为从

[1] 陈友仁 (Eugene Chen, 1878—1944)，广东中山人，生于英属殖民地特里尼达岛（今属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曾在当地做律师。1912 年回国，任北京英文《京报》主笔，曾被段祺瑞逮捕。1919 年作为南方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1924 年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孙逝世后，在北京编辑英文《民报》。1926 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先后主持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宁汉合流后，赴欧游历。1931 年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因主张抗日，被迫去职。1933 年参加李济深等在福州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外交部长，1938 年后闲居香港。日军侵占香港后，被拘捕，强迫移居上海，后病逝。1927 年林语堂曾应陈友仁之请，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

学理上评论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北京《天民报》被封禁。袁世凯及其党羽对付报馆的手段，由此可见一斑。只有租界报刊可以继续出版，但头上却有邮政禁令。日本人发现袁世凯不愿意充当他们征服中国的工具后，便转而反对他。北京的日人报纸《顺天时报》，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公开抨击帝制运动，因而受到读者喜爱，销量大增。参议院正式推戴袁世凯为皇帝时，尚存的北京的报纸（早已被收买）纷纷印红报以示祝贺。南方的形势稍有不同，袁世凯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报》^[1]两度被人投入炸弹。由于报馆附近住户纷纷抗议，它不得不搬出原址，终因为无人愿意赁屋与作馆舍而告停刊。

帝制筹划者不但要堵老百姓的嘴，还要遮袁世凯的眼，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内定要在未来的帝制朝廷担任宰相、人称“财神”的梁士诒，为了让袁世凯相信舆论真的支持他，每日把上海报纸上反对帝制的电文，易以拥戴字样，然后重新制版，再呈给老袁。一日，赵尔巽来拜访，在老袁屋里看见掺了假的报纸，发现了其中的差别，不觉流露惊讶之状，在袁世凯的询问下，他不得不解释：他家里那份报纸和眼前的截然不同。老袁便命他回家取来参看，至此方醒悟在梁士诒的愚弄下走上了一条自取其辱之路，懊丧不已。不久又传来他最宠信的将领也背叛的消息，羞愤交加之下，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随着 1915 年帝制图谋的破产和袁世凯的死去，中国进入了“分裂”的时期（也许可以这么称呼）。由于中央政权不够强大，盘踞一方、在各

[1] 应作《亚细亚日报》。

省做督军的北洋军阀——如浙江卢永祥、福建孙传芳（后来势力扩大到东部五省）、满洲诸省张作霖、河北（直隶）吴佩孚等——就团结不起来。北京政府对各省日渐失去控制。副总统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后，与担任国务总理的老资格的段祺瑞不时发生冲突，争权夺利。北洋军阀出身、先后继任总统的冯国璋、曹锟，对真正统一中国并不特别着急。能爬上总统的宝座，他们已经相当心满意足了。这样，在身后，这个头衔就可以列入长长的官方荣誉单，出现在讣告里。多么值得赞美的抱负！能取得这种现世的荣光，只要能维持一段，哪怕是种假象，或者仅仅是中国人所说的“回光返照”，也足以告慰亲朋了。由于中国人骨子里的不讲是非和知足常乐的习性，曹锟等人相当满足于现状。即便是在他逝世前不久，张作霖进入关内，企图夺取总统的位子时，也是如此。这当中体现的，不过是几个老头子一点小小的虚荣心罢了，他们关心的只是争夺空头衔，对国家的祸害还不是太大。另一位大总统徐世昌，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法国授予的宣扬东西方文化的勋章（表彰一战期间他对协约国的贡献），然而在治理国家方面，并无多少雄心壮志。真正具有睥睨一世之概的，惟吴佩孚一人，他自以为可用武力一统宇内，结果带来的只是一连串的内战。

所谓的中国政府，因之是十分虚弱的。这种情况对于强大的报业的生长却很相宜。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所激发出来的人民的热情和刚刚萌芽的做政府主人的意识（代替了臣民意识），尚未完全湮灭。事实上，袁世凯的垮台，愈加坚定了中国可以实行民主的信念。

这种气氛，加上北京“中央政府”的虚弱无力，于是出现了1917年的文学革命。从性质上来说，这场革命不单单是文学的革命，它有着相当

深远的政治影响：1. 在年青一代的推动下，民众的政治参与率提高了；2. 直接推动了杂志的大发展。或许可以把 1917—1925 年这段时期称做“中国的文艺复兴”。它既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也是满腔热情地介绍西方思想和文学的运动。这种文艺复兴运动的精神，使那时的杂志生机盎然。这段时期不仅包括文学革命，也包括 1919 年 5 月 4 日发生的学生运动、1925 年 5 月 30 日的群众运动。在这些运动里，觉悟了的学生在全国发挥着政治上的领导作用。

至于文学革命和报业发生联系，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开其端绪的是《新青年》月刊。这家杂志最初由北京大学的四位教授：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轮流编辑。^[1]胡适精通西学，钱玄同擅长国学，这使文学革命有了声誉上的保证。陈独秀那支锋利好战的笔，则成为文学革命的主要动力。采用白话代替文言作为书面语，使被压制已久的青年一代得以发言。因而文学革命的第二个结果就是中文期刊的勃兴。据估计，1918—1919 年间，全国共有同情文学运动的杂志 400 余种，分别由各省区的教师和学生创办。刊物的内容则半文学、半政治——整个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杂志，均是如此。他们对文学革新感兴趣，学习西方文学的样子，引进

[1] 《新青年》创办于 1915 年 9 月，最初由陈独秀一人编辑，在上海出版。第一卷称为《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更名为《新青年》。1917 年初，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新青年》随之北迁。自 1918 年第四卷第一号始，改变由陈独秀一人“主撰”的办法，由“社友”组成编辑部，共同研究，轮流主编，参加编辑部活动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轮流编辑人”，有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一种是所谓“客员”，即积极写稿并参加编辑部会议，参加讨论有关编辑、发行的重大问题，但不轮值主编，有鲁迅、周作人、高一涵（曾代刘半农编过一期）以及陶孟和、王星拱、陈大齐、张申府等人。参见前引《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 2 卷，第 14 页。

短篇小说、新诗、现代戏。但新生事物的影响和觉醒了意识的力量，又使他们对一般性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产生兴趣。运动中的另一股重要思潮，是重估中国既往之一切，对中国的哲学、历史和文学予以科学地再审视。引领这一潮流的，是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1]、《读书杂志》^[2]月刊和胡适创办的《努力周报》。^[3]

这场文艺复兴运动的第一个直接结果，可以在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里看出来。运动实由巴黎和会上中国得不到公正对待而激起。中国既已参加协约国一方，且曾向协约国前线输送10万华工（大半从事掘壕、运输、掩埋尸体等既苦且险的工种），等到巴黎和会召开，这才发现自己被协约国列强秘密出卖给了日本！一战中日本对协约国方的惟一贡献，就是在从德国人手里接管青岛时，消耗了几吨弹药！犹有甚者，当袁世凯图谋帝制之时，日本曾竭力强迫中国承认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中国在和会上的要求——收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均遭列强拒绝。考虑到《凡尔赛和约》的制定者在此前所持的对外政策，有此结果，也就不奇怪了。俗话说：老狗学不会新把戏。克列孟梭、劳合·乔治这样的人，脑袋里是不会有有什么新鲜货色的。被曾经极力拉拢自己入伙的协约国出卖，中国人感到极为不公。

[1] 创办于1923年1月，胡适为之撰写“发刊宣言”，并任编辑委员会主任。该刊横排版，作英文提要，成为中国杂志史上的创举。参见欧阳哲生：“开一代新风的文化前驱——胡适”，载赵建林编：《解读北大》，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

[2] 创办于1922年9月，最初作为《努力周报》增刊发行，后独立发行。1924年停刊，共出版18期。胡适撰有“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一文。

[3] 创办于1922年5月。译者按：坊间流行新闻史著作，不知是仍受阶级斗争史观影响，还是袭用前人陈说使然，对胡适参与创办的以上三种杂志，多避而不提。

舆论再次发挥了它的威风。首先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带领游行队伍，烧毁了亲日派曹汝霖的住宅。五四运动不仅意味着民国时期中国学生第一次积极地参与政治，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意志的一次蔚为壮观的联合表达。北京大学的学生虽然被关在了校园里，但全国各大专院校表示同情的罢课、主要城市和港口的罢市却踵之而起。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团被召回了。

在巴黎和会期间曾经发挥了杰出作用的舆论，在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前后仍然很活跃。巴黎和会遗留下来的中日之间的尖锐矛盾，在这次会上得到了继续讨论。美国人发起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及其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军备问题。中国新闻界表现得十分活跃，两次会议均派出了自己的代表。有报道说，中日之间的争端会留待日后，由两国单独直接谈判，消息传回国内（事后证明是不够准确的），整个国家陷入一片骚乱之中，面对国内汹涌如潮的舆论反应，中国代表团差点儿被逼回国。与那时的有力的舆论相比，今日中国新闻界在真正的外敌入侵之际的平静和恭顺，让人心里真不是滋味。

顺便讲一句，侵略者要的就是中国新闻界的一声不吭、不添乱子。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新闻界确实表现得很“乖”，正中日人下怀。提出“二十一条”时，日人要求不得刊登；签订《塘沽协定》时，日人要求中国对老百姓保密。日人更不希望中国报纸报道日本骑兵调动和向察哈尔渗透的消息。北京有一家报纸在一处不起眼的位置透露了一点相关的消息，日本代表马上跑到北海居仁堂，指责中国方面不支持中日友善。日人希望把中国报人的嘴巴全部堵住，把中国人全部蒙在鼓里，好像现代新闻业，电报啊，无线电啊，还没有发明出来，这样仅由几位驻北海的军官出

面，推杯换盏间就能完成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任务。

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之后中国舆论史上的又一高峰。它的特点是，组织更为严密，工会活动更加活跃，从知识阶层扩展到了普通百姓。在英、日纱厂的工人罢工中，工人领袖顾正红被枪杀，英国巡捕在“格杀勿论”的命令下，向聚集在南京路上表示抗议的示威群众开火，当场打死数人^[1]，这就是五卅事件。五卅事件像着火一样，迅速传遍全国，各地纷纷掀起罢工运动和抵制日货、英货运动，为1926年的国民革命埋下了伏笔。在这场运动中，民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组织和呈现。五卅运动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运动：报界、学生、商人、普罗大众。当时已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孙逸仙博士在遗嘱里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欲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现在经常恭读这句话并在口头上宣布向这位已故伟大领袖效忠的人，早就完全把这一指示置诸脑后了。事实上，1926—1927年的国民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因为唤醒了民众，利用了民众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在随后的抵制英货行动中，香港房地产的价格下跌了近50%，向来能够迅速面对现实的英国佬，被迫交回了他们在汉口的特权。1927年中国工会组织瓦解后，这类集体行动，甚至是一般的民众示威，几乎都湮没无闻了。抵制洋货的组织到处被镇压，对于当前正在上演的中日经济战——大大削弱了中国财政收入的大规模走私活动，报纸上甚至见

[1] 关于死亡人数，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作11人，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均作10余人，张岂之《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作30余人。

不到一点报道，连一点抵制（针对这种非法的经济掠夺，给予正常的经济报复）的暗示都没有。国人已经忘记，或者是被迫忘记，他们在过去30年里使用得驾轻就熟、极具效力的那种武器了。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自从1931年日本侵占满洲诸省、复于1932年轰炸上海闸北区（1月28日开始）后，中国人民就产生了强烈的仇日情绪。尽管这种仇恨从来不能在报刊上表现出来，但直到今天仍然是远东局势中确定不移的因素，并且势必影响未来的走向。同样的，关于抵制洋货运动，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所有的抵制活动都遭到中国政府的压制，但就日货而言，凡是中国人都是抵制者。很少有作家注意到这样的事实：日本人在上海国际租界所开的公司中，没有一家能像英国人开的福利公司、惠罗公司^[1]那样大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商店无法招徕到那么多的顾客。日本人不会这么无知，去犯这样的错误。凡是中国人，学生阶层也好，其他阶层也好，都会羞于被人看到进入吴淞路上的日本商店。日本产品要打入中国，必须包装成中国货或者英美货，然后通过中国的或外国的公司迂回运进中国（这些公司专门做这种勾当牟利），订购日本产品的，则要求在交货时去掉日本商标。在中国出售的日本商品，没见过有贴着“日本制造”标签的。去年的《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报道过这么一件事，东京商店里出售的日本制造的火柴上，竟然有“打倒日本！”

[1] 福利公司（Hall, Hartz & Co.Ltd.）是上海第一家百货公司，也是近代上海最大的一家外资百货公司。英国商人霍尔（Edward Hall）创办于上海开埠初期，1854年霍尔茨入股。福利公司与另外三家历史悠久的英资百货公司——泰兴公司（Lane, Crawford & Co.Ltd.，在香港的中文名称是连卡佛），惠罗公司（Whiteaway, Laidlaw & Co.Ltd.）和汇司公司（Weeks & Co.Ltd.）合称南京路“前四大公司”。1954年福利公司在上海歇业。

的标语，经调查发现，这些火柴出自聪明的日本制造商之手，他们以为贴上这样的标语可以吸引中国顾客，未料中国当局已经到了不敢进口这些带有反日口号的商品的地步，只好把这些火柴运回日本。由此可见当前中日贸易之一斑。

民国年间期刊的数量以及销量都有稳定的增长。戈公振引用的资料上说，1886年，中国共有78种报刊，香港6家，广州2家，台湾、厦门、汕头共5家，福州3家，宁波2家，上海32家，汉口5家，九江1家，天津1家，北京1家。其中有月刊36家，周刊8家，日报只有1家。^{*}然而到了1921年，据《第二届世界报界大会纪事录》载，全国共有报纸1137种^[1]，其中日报550种，两日刊6种，三日刊9种，五日刊9种，周刊154种，旬刊46种，两周刊5种，半月刊45种，月刊303种，季刊4种，半年刊1种，年刊1种，这意味着，与1886年相比，35年间报刊的数量增长了14倍。又据“中外报章类纂社”调查，1926年共有日报628种，北京数量最多，105种；汉口次之，36种；广州第三，29种；天津第四，28种；济南第五，25种；上海第六，23种。又有外文日报如下：英文26种，日文16种，俄文6种，法文3种，朝鲜文1种。戈公振估计，如果加上各种官报、学校报纸、社会团体报纸，和并非每日发行的杂志，1926年的报刊总数当在2000种左右。^{**}

杂志方面，期刊仍然承担着开启民智的使命。1912年，继《国风

^{*} 起码末尾这个数字看来是错误的，参见第八章附表。译者按，将各地报刊数相加，仅得58种。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亦作78种，参见前引《中国报学史》，358页。

^{**} 下一章末尾，有更详尽的数字。

[1] 应作1133种。

报》^[1]之后，梁启超创办《庸言》杂志，1915年他又创办了《大中华》。康有为在1913年主撰《不忍》月刊，以复兴孔教为己任。由于持反动的君主制立场，康有为的声望日渐下降，梁启超则早已成为共和党人，影响一直持续到文学革命时期。不可不提的人物还有章行严，他开创了“甲寅派”文体，这样称呼，是因1914年他在东京出版了《甲寅》月刊，这个杂志后来（1925年）在北京复刊，改为每周发行。“甲寅派”以简洁明快而著称，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严复的传统。章先生是学政治学的，喜爱西方逻辑学，文章因为讲究逻辑推理，论证有力，独具一格。他是当得起这样的称誉的，尽管他的逻辑并没有阻止他在北平^[2]教育总长任上时于1926年屠杀50余名学生^[3]。1916年，《民铎》月刊创建于日本，促进了政治、文化知识的普及。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这份杂志1916—1919年间成为陈独秀、胡适等北大教授发起文学革命的机关刊物后，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由一批北大学生创办的《新潮》月刊，有力地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因此也应一提。孙逸仙博士也于1913年创办了《国民》月刊，1919年又创办了有杰出影响的《建设》杂志。

纯文学方面，创刊于19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学研究会编辑的《小说月报》，在译介西方文学方面，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扮演着重要角

[1] 1910年2月，创办于上海，旬刊。共出版53期，至武昌起义时停刊。

[2] 应作北京。北京在1928年至1949年10月1日间改名为北平。

[3] 现在有研究者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三·一八”惨案发生时，章士钊正在天津，并且已于三个月前辞去教育总长一职，转任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参见丁仕原：“章士钊与毛泽东的特殊情谊”，《人物》杂志2000年第7期。

色。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中，值得一提的人有：鲁迅^[1]、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赵景深等。1922年，另一个文学社团创造社，在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人的领导下，出版了《创造》杂志，这是中国的“狂飙突进”运动。郭沫若通德语，是青年歌德的崇拜者。

1922年胡适创办了《努力周报》，才华横溢的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先驱顾颉刚，就是在它的颇有影响力的文学增刊^[2]上脱颖而出的。同一年，离开了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3]，创办了地地道道的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1924—1925年^[4]还有两家杰出的刊物问世：隐然奉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和以周氏兄弟（周作人和鲁迅）为领袖的《语丝》。日报的副刊也是重要的文学阵地，著名的有：《晨报副镌》、《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新思潮的传播。

随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文坛风貌为之一变。1927—1930年间，可以说是利用增长迅速、为数巨大的共产主义杂志全面介绍共产主义思想和作品的时期。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大量出现在书刊杂志上。等南京政府把眼睛擦亮，了解到形势的严峻后，这些杂志所鼓吹的思想早已渗透到年轻读者的心里去了。原是语丝派的鲁迅，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惟一明确加入到“普罗文学”的阵营中去的。由于官方的封禁，这些杂志通常都很短命，但他们却有办法改头换面，重新上市。《狂飙》、《莽原》（鲁迅

[1] 鲁迅并非文研会成员。

[2] 指《读书》杂志。

[3] 陈独秀在1920年离开北京后，把《新青年》迁往上海，继续编辑，1922年7月停刊。

[4] 《语丝》创办于1924年11月17日，《现代评论》创办于1924年12月13日。

编辑)、《水沫》、《大众》,从这些刊物的名字上,可以约略见识这股席卷中国的思想洪流。还有左翼杂志《海燕》,它的名字揭示了即将到来的暴风雨,本年度刚刚(1936)创刊,注定长久不了。严肃的纯文学刊物《文学月刊》,也可以说是左翼的。从1932年起,很少发现共产主义杂志被查封,国民党采取向出版物发放津贴的办法来打入文艺界,这种努力,导致了右翼思潮和要求回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反动立场的出现。

关于文体,其发展变化如下:梁启超首先使中国的散文从古文义法里解放出来,大量吸收西方术语,使之成为能够表达现代思想的自由灵活的媒介,开一代文风。严复和章行严的“甲寅派”,则坚持使用古文,维持其语言上的严格形式,同时注入现代内容。创造社的文风是浪漫主义的、感性的。语丝派的语言则明白如话,风格纤细,意态闲适,间以幽默穿插,使文章不致乏味。当前,《人间世》(1934—1935)、《宇宙风》(创刊于1935年)致力于继承以周作人为领袖的语丝派的传统,刊载这种小品文。

重要报刊一览 (1912—1915)

名称	创刊时期	地点	备注
独立周报	1912	上海	章行严编辑,周刊
庸言	1912	天津	双周刊 ^[1] ,梁启超编辑
不忍	1913	上海	孔教刊物,康有为编辑
国民	1913	上海	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机关刊物,月刊
雅言	1913	上海	亲袁世凯的报纸
甲寅	1914	东京	月刊,章行严编辑,1925年起改为周报 ^[2]

[1] 1914年第二卷起改为月刊。

[2] 《甲寅》虽为月刊,但常脱期。民国四年(1915)五月出至第五期后移至上海印刷出版,编辑部仍设在东京,至同年十月出十期停刊。后曾两度复刊。这里说的“1925年起改为周报”,即其第二次复刊。

续前表

名称	创刊时期	地点	备注
大中华	1915	上海	月刊, 梁启超主编的进步刊物
科学	1915	上海	留美学生归国后所组织的科学社创办, 月刊
新青年	1915	上海	最初由陈独秀编辑, 月刊, 后来成来 1917 年文学革命的重要言论机关
民铎	1916	东京 ^[1]	初为季刊, 后改月刊, 中华学术研究会主办。李石岑编辑
太平洋	1917	上海	编辑有留学英法背景
新潮	1919	北京	北京大学学生创办, 文艺复兴运动的言论机关
新教育	1919	上海	最初由蒋梦麟编辑
学艺	1919 ^[2]	东京 ^[3]	初为季刊, 后改月刊, 中华学艺社主办
建设	1919	上海	孙逸仙创办的国民党月刊
解放与改造	1919	上海	双周刊, 进步刊物
星期评论	1919	上海	周刊, 戴季陶编辑
创造	1922	上海	初为季刊, 后改月刊, 创造社出版, 文学刊物
努力 ^[4]	1922	北京	胡适主办的政治周刊, 其文学增刊有重要影响
向导	1922	广州 ^[5]	共产党周刊, 陈独秀编辑 ^[6]
学衡	1922	上海	吴宓编辑的月刊, 反对使用白话
社会学杂志	1922	上海	关于社会学的杂志
社会科学季刊	1922	北京	北京大学教授主办
国学季刊	1923	北京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
国学丛刊	1923	上海	和上面的杂志一样, 以整理国学为宗旨。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出版
华国	1923	上海	章太炎编辑, 严肃学术刊物
现代评论	1924	北京	北京大学一些教授出版的周刊
语丝	1925 ^[7]	北京	以周作人为首的一批作家所主办的有广泛影响的非常活跃的周刊

[1] 1918 年 12 月移上海出版。

[2] 应作 1917。

[3] 后移到上海出版。

[4] 应作《努力周报》。

[5] 应作上海。

[6] 先后担任主编的是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

[7] 应作 1924。

第十一章

报界之现状

这一章准备就当前中国报纸的排版、编辑风格、新闻的特点与分类、广告与发行，逐一作些考察。今日中国的报纸可分为两类：进步的报纸和不那么进步的报纸。《大公报》无疑是今日中国中文报纸中编辑得最好、最进步的报纸；而《申报》和《新闻报》则是因循守旧、既大且老的报纸之代表，又同属编辑最差的报纸之列。两者的区别在于，《申报》的编辑尚可用拙劣来形容，《新闻报》则压根儿没有经过编辑。^[1]尽管如此，这两家报纸仍然是今日中国最大的日报，销量全国第一——两家均声称拥有15万份的发行量，但从当前的调查来看，似乎都不足10万。但《大公报》公布的发行数字只有3.5万。这里我们看到，最流行的报纸是编辑得最差的报纸，其运行是以广告为基础的，新闻只具有次要地位，以填充广

[1] 参见林语堂：“申报、新闻报之老大”，《论语》第三期，1932年10月，收入《拾遗集》。

告留下来的零碎空间；而编辑得较出色的报纸，只拥有一小部分读者，这是很正常的。也许这些编辑得较好的报纸自身也有错。翻一翻《大公报》就会发现，尽管从排版、印刷到一般的新闻技巧，它都无可挑剔，但毋庸置疑，它多半是为投合饱学之士的趣味而设计的。拿今天的报纸来说（1936年5月30日），有不少令人称道之处：来自全国各地的、精心结撰的通讯，有趣的钢笔素描或乡村风景画，精美的摄影增刊，美观大方的版面设计，但我也发现，头版社论下方，赫然是威廉斯（J. E. Williams）所撰“论德国诸殖民地之问题”译文，第四版的头条文章，谈的是拉姆齐·麦克唐纳的晚年^[1]。艺术版上有一篇4000字左右的文章，讨论日本目前的西方风格的油画。文学版上则有两篇各约2500字的小说，两篇文学短讯，一则“瑞典文讯”，一则“西班牙文讯”。一般文化程度的读者，如果喜欢的是编排拙劣的《申报》，或没有什么编排的《新闻报》，那他是不应因此而受到责备的。

由于《申报》所具有的杰出地位和典型意义，我们不得不拿出一些篇幅，考察一下它的版面构成。结果看起来像东方的童话故事。仍取今天的报纸（1936年5月30日）为例。这期报纸共7个印张、28版，其中20个版组成了“真正”的报纸，其余8个版是所谓的“本埠增刊”，几乎全部是影院和戏院的广告，每个版上剩下四分之三的版面，刊载消遣性的、没什么意义的文章，根本不向外埠邮递。读惯了西方报纸的读者，拿到这份报纸后，首先遇到的困惑，是版面的顺序。如果你取出折叠在一起的前

[1] James Ramsay Macdonald, 1866—1937年，英国首相，工党领袖。

两个印张，按照中国人通常的习惯，从右向左读起，你会发现，依次看到的版面会是：

2, 3, 6, 7, 8, 5, 4, 1。

如果你拿出依旧折叠在一起的第三张和第四张，依次看到的版面会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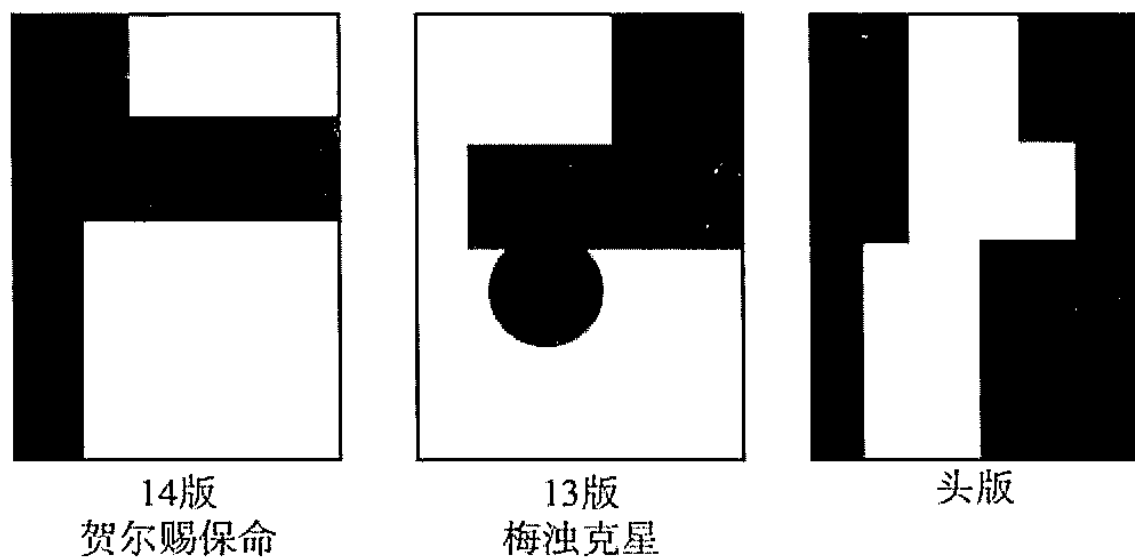
10, 11, 14, 15, 16, 13, 12, 9。

这么安排的道理在于，读者应该每次只阅读一个印张，而由于每个印张上都清楚地标明了页码，因此按合理的顺序排列整份报纸也就不难了。然而，由于普通读者并不把叠在一起的印张打开，铺得满桌子都是——没人想费这个劲儿——结果他碰到的连着的版只有6, 7, 8和14, 15, 16。如果你先画个表，以帮助记忆，你会发现，熟悉这个新的算术顺序并不难。无论如何，如果每一个栏目每天都出现在固定的版面上，读者可能只要几个月的时间就明白该到哪里去读教育新闻，哪里去读商业消息了。实际上，中国读者采用的办法，是拿过报纸来乱翻一气，反正迟早是会找到他所需要的版面的。一年前，我经常读某个半版的文学副刊。但它经常在14版到20版间跳来跳去，碰巧第四印张和第五印张的分隔又很麻烦，有时折叠在一起，有时分开，结果每天早晨我都花大约一分钟去找这半个版。留心阅读《申报》社论的读者会有同样的游移不定的感觉，它日复一日地在4, 5, 6, 7, 8版跳动。如果有人受命去审查这几个版面，那他会体会到承担这个工作的麻烦的。

在排版方面碰到的第二个突出问题，是新闻在版面上所占空间的不确

定性：只留下未被广告客户占用或指定的地方来刊载新闻，不管剩下的空间形状是多么奇怪。多年前，《申报》革新，用头版来刊登重要新闻，只用两边的竖栏来刊登广告。但日子一久，头版这两栏广告的价格越来越高，广告不断蚕食新闻的地盘。版面上到处都是江湖郎中、“灵丹妙药”的大幅广告，时高时低，忽左忽右，有时在正当中加上一个水平的“盖子”，呈“T”型，有时呈对角线状斜穿过整个版面……不一而足。下面这三个示意图，分别依照5月30日《申报》第3版（头版）、第13版、第14版制作，《申报》广告的奇形怪状，于此可见一斑。

《申报》奇形怪状的广告（1936年5月30日）^[1]
 黑色表示广告占据的空间，白色表示留给新闻的位置



其实，如果报社坚持只把上半版或下半版用来刊载广告，是可以处理好这个问题的：既不会得罪广告商，也不会在收入上有所损失，同时又方便了读者。但现实是，目前这种做法正在为《申报》赚回大把钞票。毕竟，这才是《申报》出版者最最关心的事情。

[1] 原书所附示意图图版颠倒，顺序也发生错误，今据《申报》重绘。

下面的这个故事很有趣，读者看了，也许会怀疑是歪曲事实编造出来的。为了预防这种指控，请允许我先引用戈公振的叙述：

我国报纸所载之新闻，苟以充篇幅而已。叙一事也，常首尾不具，前后矛盾，同一事也，而一日散见二三处，重见二三处，无系统，无组织，浮词满纸，不得要领。其故前者由于访员不研究纪事之法，以抄录为范围，后者由于编辑不为读者着想，以省事为要诀。累累数十页之报纸，而精彩黯然，此极可惜之事也。^[1]

为了证实戈公振中国报纸不善编辑的说法，或许可以从今天这期报纸上随手找几个例子，加以讨论。本期有五篇关于华北走私情况的报道，分别以不同的标题出现在3个版上（6版3篇，其中两篇中间穿插了一条别的消息；15版一篇；还有一篇是海关发布的声明，作为“城市新闻”刊登在16版）。还有一例。本期有4篇关于中华海员工会活动的报道，每篇都有独立的标题，3篇在12版，13版上又有一篇，内容重复了前三篇报道。第一篇报道中华海员工会为庆祝蒋介石诞辰而为某基金会募捐；第二篇报道他们讨论选举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的情况；第三篇报道他们对于禁烟的评议；第四篇则是一篇概括了上述活动的综合报道，重复了前三篇的内容，很明显，是由海员工会自己供稿的。

必须承认，总的来说，中国报业在许多方面有相当可观的、扎扎实实

[1] 《中国报学史》，218页。

的进步。这反映在许多在编排上更为出色的报纸当中，例如，《大公报》和不久前停刊的上海《晨报》。《时事新报》也用头版来刊载重要新闻，但那只是在尽力模仿现在的《申报》而已。在激烈的竞争下，即便是因循守旧的老报纸，也时不时地搞一点革新。例如，两年前，老牌的《申报》突然醒悟过来，在众多的增刊之外，又创办了极为成功的《图画周刊》，逢周日发行。中国的日报在业务上的进步，主要还有以下各项：许多进步的报纸学会了制作有吸引力的标题，编辑开始采用制作副题等手段来加工消息——连《申报》居然有时也会使用这一招（但我怀疑极少有编辑改写记者交来的稿件）。值得注意的还有教育新闻和体育新闻。后者的影响来自不久前召开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全国运动会。许多报纸都有精心编辑的金融版。大多数大报都设有艺术、文学、电影、健康、妇女的专版或者星期增刊。《申报》有一个周刊，刊载写给儿童看的文章和儿童作文。上海的《晨报》出版的《儿童晨报》增刊，每三天一期，很受读者欢迎，1936年1月《晨报》被迫停刊后，《儿童晨报》仍能独立发行。妇女增刊并不像英国报纸的类似版面，只刊登烹调欧洲萝卜或者菠菜的小窍门、招待宴会名录、赛马场名人着装情况，而是刊登家庭妇女的权利、职责以及科学育婴之类的知识性的文章。学着其他编辑出色的报纸的样子，《申报》偶尔也尝试刊登特别通讯或特写。不过，它所刊登的由南京国民党中央宣部掌控下的中央广播电台广播的学术演讲，并无多大价值，都是些抄来抄去的老调子。自然科学类的专栏看起来在所有的报纸上都比较缺乏。虽然《申报》有《健康增刊》，但考虑到它与广告的关系，评价它时必须有所保留。

增刊虽有改进，新闻的写作报道却远远不能让人满意（比如《申报》）。在这一方面，或许可以发现中国新闻报道遵守的几条原则。我觉得有五条：首先，必须与官方保持一致；其次，必须正确适当；第三，必须是善意的；第四，必须是沉淀过一段时间的；第五，必须是没有改动过的。明眼人一望即知，这和公正、真实、引发讨论兴趣、即时、精心编排的出版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像西方报纸一样，中国的报纸也经常刊登官方对公共事件的声明，但和西方不一样的是，中国报纸常把官方的说法当做惟一的说法，甚至连“来自官方的消息说”这样一句提醒的话也没有。指责组织游行反对日本侵略的学生是“共产分子”的做法，民众早已司空见惯了。1936年3月25日的复旦大学（位于上海江湾）事件，或许正好可以拿来作例子。3月24日午夜，为阻止学生们预谋的一次抗议华北局势的大游行，上海警察搜查了这所学校，女生宿舍也未能幸免。美国人的《大美晚报》^[1]以双栏标题报道说：

午夜三点中国警方突入查抄复旦大学，逮捕八人

学生再度骚乱

大批军警控制校园局势，旨在扼制学生的市中心大游行计划

英文的《字林西报》3月26日头版报道：

[1]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1929年4月创办。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停刊。

官方的声明说，学生中的共产分子要为受伤的警察负责。另一方面，学校当局和学生则称，是军警的手枪走火，误伤了警察。一名军警在检查他的枪时，枪响了……

枪击事件发生在白天。复旦的一些进步学生，数周之前作为机车工程师实习，开着列车去过苏州。他们恪守列车规章，餐车里的酒水一滴未沾，为了能够抵达南京还修好了铁路，现在他们迅速用相机武装起来。枪击事件发生的瞬间，他们拍到了照片，也拍下了警察用警棍殴打老校长李登辉的镜头，并把这些照片呈交教育部部长，帮助自己洗清了罪名。但这些材料都没有在报上刊登出来。3月26日的《申报》仅仅在二版（本埠消息版）用很小的标题，在不起眼的地方刊登了代表官方口径的中央社消息：

中央社云：淞沪警备司令部据报，复旦大学学生中，有少数共党阴谋煽动捣乱，殊足影响治安，为执行治安紧急法起见，特令公安局于前晚（二十四）派警前往该校，逮捕共党黄拔山、莫自新、包毅、蒋文蒸、郑通鹭、江南俊等六名，复于昨午（二十五）续获杨伯鹏一名。詎该校尚有少数共党，嗾使同学组织纠察队，严守前后校门，禁阻同学出入，并由内开枪二十余响，击伤校外公安局警察总队第三中队长李备武及警察二名。伤势李队长较重，当即送往江湾医院医治。司令部当以学生中少数共党分子如此猖獗，为维持治安计，责成该校当局即日交出开枪之共党分子，并晓喻善良学生，勿受共党利用，各安学业，以免事态扩大云。

就是这么回事。我之所以把官方文件全文照录在这里，是因为它有助于解释这样的谜团（对外国人来说）：拥有种种传播媒介（从无线电到新闻报刊）、现代的中华民族，在外敌入侵面前竟然表现得如此平静、顺从，究竟是如何做到的？难道还需要指出当局的指责——只有共产党人是爱国的、仇恨外国入侵的——是不真实的吗？我认为，这样的声明诬蔑了整个民族。6名被捕的学生后来查明并不是共产党，得到释放。

这里正好可以停下来思考一下今日中国的舆论形势。中国的舆论就像一个巨大的煮沸的锅炉，里面滚动着对日本入侵的憎恶和仇恨，只有少许水汽从紧紧扣在上面的铁盖缝隙里透出来。谁也说不准它何时爆炸——也许是俄日发生战争的时候。但它一旦爆炸，就会迸发出原子能一般的能量。也许我们应该对当前的形势感到满意：与1915—1926年间相比，今天的中国实在是太安定了，没有集会，没有示威，没有震撼人心的社论，也没什么抵制运动，抵制运动是不可想像的。读过前面关于宋朝太学生运动的那一章（第六章），了解或记得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所见到的大众行动的力量和中国人引导舆论的能力的读者，不会把那种荒诞的说法——中国人“冷漠”——归罪到民众头上的。日本人对于1936年一二月间再度爆发的、有望扩展到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之恐惧，有甚于害怕中国的全部军队。这次运动确有扩展到全国的趋势，和上次不同的是，没有商会的响应，而且恰如日本人所希望的，很快就停息了——因为国民政府于1936年2月20日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复旦学生的被捕，根据的正是这项规定（如下所引），学生运动被“合法”地扼杀了。

(1) 遇有扰乱治安、鼓煽暴动、破坏交通以及其他危害国家之事变发生时，负有公安责任之军警，得以武力或其他有效方法制止。

(2) 遇有以文字、图画、演说或其他方法而为前项犯罪之宣传者，得当场逮捕，并得于必要时，以武力或其他有效方法排除其抗拒。

(3) 军警遇有妨害秩序，煽惑民众之集会游行，应立予解散，并得逮捕首谋者及抗拒解散之人。

(4) 军警遇有前述各项之事变时，应将当场携有武器者，立即缴械及逮捕之，并得搜捕嫌疑犯。

(5) 明知为违犯本办法之人犯，而藏匿、容留或使之隐蔽者，得逮捕之。

(6) 军警于处理事变时，应立即报告该管上级长官。

上面列举的中国新闻报道的另外几个特征，部分地是中国社会传统的必然产物，还有一部分可归因于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国的新闻报道在写法上通常全无其所应有的生动鲜明，因为在旧文学传统的束缚下，它极易流为陈腐的“正确的”叙事方式——单调、古板、没有人情味，而且一点儿也不尖锐。单调的根源在于，作者并不精通已死的语言，却在用这种语言写作。这就像词汇量不足的人，只能用干巴巴的语言跟外国人交谈一样。但眼下单调、古板慢慢变成了硬性的“文学规范”，而为大多数没有勇气放弃它的新闻记者所遵循。引起分裂的白话文运动，蔚然成为风气，正在把新闻报道的文风解放出来。不过，还要考虑社会因素，涉及要人和大利

益集团的消息，肯定会被封锁。在这一点上，中西报业的遭遇是一样的。我写这一章时，上海的鱼行正在罢市，刊出幕后真相当然令人兴奋，但会触怒商会里的一位权势人物^[1]；如果刊出官方对这一事件的说法，无疑会使新闻报道成为官方陈词滥调的牺牲品。这就是“正确适当”的代价。中国最为迫切地需要培养一批记者，他们遇到一件事情时，知道如何写报道。但上面的问题，却远非培养出这样的记者所能解决得了的。

“新闻必须是善意的”，意味着对发生在全国的所有重要政治运动都保持沉默。1935年，官方正式下令禁止刊载“有损邦交”的新闻。“保全邦交”一词，好比《塘沽协定》，包罗了所有不宜说出口来的东西；又好像道士的宝葫芦，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药。日本骑兵深入察哈尔后，中国军队为了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一火车接一火车地从北平南撤。只能从报纸上获取信息的北平居民，也许还以为什么事都没有，华北“一切静悄悄”呢。所有诚实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称之为谎言的“中日友善”的神话，最初是日本的领事和少佐提出来的，后来被中国官方自愿接了过来。朝鲜人和日本浪人在华北走私数年，为何迄未引起公众的注意？至此也就不难解释了。走私已演变成对中国海关的赤裸裸的抢劫，今年4月

[1] 上海鱼行原集中在十六铺小东门鱼行街（今方浜东路），有好几百家。为刺激渔业发展，减少每年进口价值两千万元的鱼产品，国民政府决定建设新的渔业市场。1934年，成立实业部（部长吴鼎昌）上海鱼市场筹备委员会。资本金120万元，官商各占一半，并请杜月笙担任鱼市场理事长、王晓籁为总经理。1935年颁发《上海鱼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市场营业规程》。鱼市场于1936年5月11日上午开幕，12日正式开业。按照规程原来在南市十六铺的鱼行进入新的市场为经纪人，进场鱼贩有4000多人。新市场佣金比十六铺提高了0.8%，鱼贩为抗议市场不合理规定，于5月13日开始罢市。官方派警察弹压后，罢市风波始告平息。这里所谓的“权势人物”，当指杜月笙。

底，上海的外国报纸开始以大标题予以报道；中国的报纸为了保全邦交，仍然保持沉默。对中国海关当局发表官方声明的消息，外国报纸纷纷在头版以两栏标题加以报道，《申报》却只在“本埠消息”版给了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只有当越洋电报传来消息，说明此一事件业已引起国际关注，伦敦、华盛顿正在采取行动，关于走私的新闻才上了头版。这样的事情，在1919年或1925年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最后，关于“新闻必须是沉淀过一段时间的”，意思是新闻必须晚一些时间再发；“必须是没有改动过的”，意思是送到编辑部的稿件是什么样的，发表出来的也应当是什么样子，编辑的改动越少越好。如果编辑对通讯社发来的电讯不作改动，显而易见地，他们为这些稿子所承担的法律 responsibility 也就小了。

我对中国新闻报道的批评有三点。第一，由于受旧《京报》内容和士人心态的残留影响，政治新闻在报上占据优势地位。第二，缺乏优秀的稿件，缺乏训练有素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记者。第三，如前所述，一般的新闻写作缺乏趣味，不够生动。我认为这都是文学传统的问题，必须从当前中国散文文体的全面解放入手，从外部加以改革。

单拿新闻报道来说，总体上看起来，中文报纸与英文报纸的差别并不大。可以肯定地说，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对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最没有评判能力的，就是大报编辑这号人了。不管怎么样，前述中国新闻报道的特征，使中国的媒体，成为众多官方机构的传声筒，也激起了读者探究“内幕”的欲望。有了读者的这种需要，才有了小报（中国称为“蚊报”）的崛起。简而言之，大报失言论之责，不登读者想看的消息，才有

小报的应运而生。虽然与大报相比，小报格调确实不高，但应当受责备的，仍然是大报。报如其名，蚊报的主要特征就是：第一，爱咬人；第二，成群结队；第三，难抓，逮住它可不容易；第四，经得起波折（少有大额投资）；第五，嗡嗡叫个不停，让人听了心烦。但请允许我为蚊报一辩：面对重大事件，大报一片死寂，小报的声音尽管微弱，听来却让人宽心。这正是小报能取代大报而大行其道的原因之所在。

小报有日报，也有隔两三天出一期的。1928—1932年间的某一段时间，涌现出数百种单页的小报，有的实际上靠勒索敲诈维持出版。^[1]自1932年起，周报或杂志似乎已代替了小报，成为最畅销的读物。但办得认真、负责任的小报最终存活了下来，看来在质量上的确有所提高。1935年问世的《立报》，虽然开本像小报，但严格讲来并不属于小报的阵营。它想方设法以低到普通民众掏得起腰包的价格，把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新闻卖出去。

《清华杂志》第二卷（*Tsinghua Journal*, Vol.II）载文，对1922年11月起40天内的五家报纸的新闻作了分析。

新闻与非新闻的比例
——以五家有代表性的报纸为例（1922）

	非新闻	新闻	新闻的种类					
			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犯罪	杂项
申报（上海）	72%	28%	24.6%	33.7%	7.4%	12.2%	6.1%	16.0%
晨报（北京）	66%	34%	39.3%	27.7%	9.1%	7.5%	7.4%	7.0%

[1] 据研究者的不完全统计，1926—1931年间出版的小报在700种以上，见前引《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第201页。

续前表

	非新闻	新闻	新闻的种类					
			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犯罪	杂项
益世报（天津）	80%	20%	51.4%	19.3%	4.3%	10.3%	3.2%	11.6%
中西报（汉口）	67%	33%	49.1%	18.3%	3.7%	18.1%	2.4%	9.0%
七十二行商报（广州）	61%	39%	23.8%	15.9%	12.3%	25.2%	14.0%	8.3%

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的比例 ——以五家有代表性的报纸为例（1922）

	国内新闻	国际新闻
申报（上海）	96%	4%
晨报（北京）	82%	18%
益世报（天津）	96%	4%
中西报（汉口）	97%	3%
七十二行商报（广州）	100%	—

报纸上非新闻的内容，当然是广告（比例最大）、社论和各种副刊（占比例很小）。统计一下1936年5月30日的《申报》就知道了：

广告	新闻	社论及其他	总数
18.25版	8版	1.75版	28版

总共8个版内容的新闻（只有少数具有可读性），分散在13个版上。头版（第3页）包括4/10个版面的新闻；7-9版是外国新闻（新闻内容总共也就一个版左右）；9-10版是外埠消息；11-13版是本埠消息；14-15版是犯罪等杂七杂八的新闻，和本埠消息没有严格的区分；16版有半版的体育消息，3/10版的教育新闻；17版是惟一没有广告的版面，全是商业新闻；19版是妇女专刊，占3/4个版；18版是半个版的“现代医药刊”，实际上是性病假药的广告——这种遮遮掩掩的勾当，极为可

耻；最后是8个版的“本埠增刊”，几乎全部是影院、戏院、欢场广告，还有3/4个版的无足轻重的特写，用来填充版面。在这次偶然的审视中，可以看到，8个版的新闻中有一个用来刊登国际新闻——这在当今的大报中相当正常，与5年前相比真是进步了。

中国成为江湖郎中的理想乐园，是在现代社会杂志的数目大增之后才出现的。留心这股新祸水为害的情形，相当令人不快：因为没有职业医疗伦理的成长，甚至没有适度严格的许可证制度，几乎就没有医生和读者知道羞愧。例如，有一则最显眼的广告，正好位于“本埠增刊”版头之下，许诺“专割包皮过长”。但除了中国人和英国人在假正经这个小问题上的差别之外（人人都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绝对的标准），江湖郎中日复一日地在广告上刊登关于各种性病的夸大之辞，危言耸听，正对中国的男男女女造成难以言宣的心理危害。每天打开“医疗专刊”，在江湖大夫撰写的文章里，“梦遗”、“手淫”、“阳痿”、“梅毒”、“淋病”等字眼，冲击着读者的神经，不管怎么样，都会使读者对正常的性功能产生阴影。更糟糕的是，这样的专刊，《申报》不止有一个，而是4个，《医疗专刊》、《健康专刊》等，一拨医生一茬药，轮换登场。除了中国的冒牌医生外，还有许多欧洲制造的只在中国市场销售的专利药物，如形形色色、品种繁多的“精素”。普通中国人的身体总会有点毛病。这些药借西方科学之名，骗取了患者的信任，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最要紧的是，从很古时候开始，中国人就爱服食这样或那样的滋补品。

《中国年鉴》（1935）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新闻科和内政部当年报表的基础上，列出了本年度中国报业的数字：

南京	38	山西	10
北平	92	河北	15
江苏	237	湖北	16
安徽	43	广东	20
山东	39	福建	28
河南	36	甘肃	7
湖南	94	陕西	9
云南	15	广西	8
贵州	3	宁夏	1
绥远	9	青海	1
四川	29	察哈尔	5
上海	41	汉口	37
青岛	15	广州	17
江西	20	天津	25

共 910 家。

大报还是很少的。据 1935 年的《申报年鉴》记载，每期有一个或数个印张的中文报纸如下（这里省略了报纸的名字）：

七个特别市

上海	15
南京	11
汉口	13
北平	16
天津	9
广州	14
青岛	14

各省

江苏	45	河南	7
浙江	40	山东	8
安徽	16	山西	3
江西	9	陕西	5
湖南	6	察哈尔	1
四川	23	绥远	2
云南	8	甘肃	4
贵州	2	宁夏	2
广西	6	青海	3
广东	22	迪化	1 ^[1]
福建	11				

[1] 1760 年清政府置乌鲁木齐直隶厅，后升为迪化直隶州，1886 年改迪化府，并置迪化县为府治。1913 年废府为县。此处沿用了旧称。

共有 313 家^[1]大报。这个数字来源于申时电讯社出版的《报学季刊》，它另外还给出了海外中文报纸的情况：

香港	20	巴拿马	1
檀香山	2	新加坡	7
古巴	3	马尼拉	3
旧金山	4	安南	3
悉尼	4	西贡	1
纽约	2	苏腊巴亚	3
芝加哥	1	暹罗	4
伦敦	1	苏门答腊	2
牙买加	1	马六甲?	1 ^[2]
加拿大	4	巴达维亚	3
南非	1	仰光	1
秘鲁	2	基隆	1

关于报纸的发行量，1933 年的《申报年鉴》提供了以下数字——不过得打点儿折扣，因为是出版者自己提供的。没有更准确的经过审核的数字可以利用。有两家报纸的发行量超过了 10 万：

申报，上海 150000
新闻报，上海 150000

这些数字整齐得让人怀疑它的精确度。很可能是因为年鉴的编者不想得罪人，所以这两家竞争对手的发行量是一样的。发行量超过一万的报纸有 13 家：

大公报，天津	35000
时报，上海	35000
益世报，天津	35000
天津午报，天津	25000
公评报，广州	20000

[1] 各地统计之和为 316，原书有误。

[2] 原文拼写为 mo-li-sze。问号是作者加的。这里姑译为马六甲。

民国日报，上海，已停刊	20000
国华报，广州	16000
中央日报，南京	15000
广州民国日报，广州	15000
庸报，天津	15000
大中华报，广州	12000
七十二行商报，广州	10000

发行量超过五千的有 17 家：

益世报，天津	9000 ^[1]
中华晚报，上海	9000
新报，天津	9000
商业日报，北平	8700
世界日报，北平	8500
全民报，北平	8000
京报，北平	7300
北平晨报，北平	7000
华北新闻，天津	7000
现象报，广州	7000
武汉日报，汉口	7000
汉口中西报，汉口	7000
粤华报，广州	7000
华北日报，北平	6000
共和报，广州	5000
杭州民国日报，杭州	5000
河南民报，开封	5000

很明显，中国报纸的发行量和数量比过去 10 年有了扎实的进步。S. A. Polevi 对 1895—1912 年间的报纸数量作了统计*，我补充了一些，但跟罗文达教授提供的数字稍有不同：

* 《中国报刊》(The Periodical Press of China)，海参崴，1913，转引自燕京大学新闻学教授罗文达(Rudolf Löwenthal)博士《当前报业在中国之地位》(The Present Status of the Press in China)，会议报告摘要，北平，1936 年 1 月。

[1] 此处应指北平《益世报》。

中国日报数量的增长

时间	报纸数量
1895 年前	7
1895	19
1903	65
1907	123
1910	250
1912	500
1921	550
1926	628
1935	910

1921 年、1926 年的数字参考了前面的章节。罗文达博士认为 1935 年有 746 种（不包括满洲 50 种、海外 76 种，如果把这两类也算上的话，总数应有 872 种），他根据的是内政部出版的历年来的统计数据。由于报刊不断发展变化的特性，不可能有绝对准确的数字。

根据邮局的数据来看报刊影响力的扩大，是个清晰可行的办法。当然，未经邮局递送的报纸就无法计入了。下列数据，1922—1924 年取自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32—1934 年取自《中国年鉴》（1935）。这两组数字之间正好隔了 10 年，可以很方便地从中看到这段时间内的变化。

邮递报纸之统计（1922—1924，1932—1934）

	平常立券报纸	总包报纸	总数
1922	43024700	29764400	72789100
1931—1932（财政年度）	129828300	56659000	186487300
1923	45375525	35344801	80720326
1932—1933	125065800	55593700	180659500
1924	50009074	46890300	96899374
1933—1934	140287500	56380300	196667800

由此可见，过去 10 年里，中国报纸的销量平均增加了大约 125%。

关于报纸销量的地理分布，1935 年出版的《中国报纸指南》^[1]作了下面的分析。应当说明的是，这些关于销售量的数字来源于出版商的自陈，但应该不会影响地理分布的比例。还有，如果把第一栏改成“已获公开的报纸发行量”，也许会更精确一点儿，因为有的大报在省外也有销售。在这个表上，我根据申报馆出版的一本纪念册（1935 年 5 月），补充了《申报》的销量数字。

	售出报纸	人口（百万）	每万人流通报纸	申报发行量
安徽	23532	19.832	11	12400
浙江	103242	22.043	46	14300
大连	120050	.300	4000	—
福建	50395	13.157	45	3050
河南	36120	30.831	11	6800
香港	276700	.513	5393	—
河北	520400	34.186	152	1550
湖南	52300	28.443	18	1450
湖北	114600	27.167	41	6050
甘肃	2945	5.927	4	160
江西	37000	24.466	15	8650
江苏	1139080	33.786	337	91000
广西	14100	12.258	11	400
广东	260800	37.167	70	2100
贵州	3400	11.114	3	100
澳门	11200	.078	140	—
满洲	118100	20.000	95	—
山西	23100	11.030	20	300
山东	122500	30.803	39	6250
陕西	27700	9.465	29	220

[1] *Newspaper Direction of China*, Carl Crow 出版, 上海。

续前表

	售出报纸	人口 (百万)	每万人流通报纸	申报发行量
绥远	5600	11.900	29	75
四川	97700	49.782	19	260
云南	82200	9.839	84	200
察哈尔	—	—	—	80
西康	—	—	—	65
宁夏	—	—	—	42
新疆	—	—	—	38
青海	—	—	—	24
西藏	—	—	—	16
蒙古	—	—	—	10
海外	—	—	—	310
	共计 3242764	共计 434.987	平均 70	共计 155900

还应该记得的是，正如多位论及这个题材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报纸的传阅率要比西方高，通常一份报纸会传给 10 位读者。这样，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每天大概有 3000 万报纸读者，在每 1 万人口里，平均有大约 700 个报纸读者，或者整个中华民族的 7% 是报纸读者——考虑到出版商可能夸大销量，也许把这个数字降为 500 比较保险，或者说整个民族的 5%。

第十二章

当代期刊杂志

杂志是一国文化进步的最佳标志。毕竟，杂志的功能是与书籍截然不同的，作为教育大众的媒介，它评述天下大势，介绍艺术、文学、思想动向，不断地指引思想的潮流，矫正其错误倾向。杂志是专门办给活着的一代人看的，而书籍，尤其是真正的好书，却应具有永久价值。杂志的荣枯，多数和文学史上的运动息息相关。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杂志的旋生旋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它在完成一定的使命之后，就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带着有所作为的心情，同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感觉，但主编毕竟不是神仙。杂志就像人，生命有限，既受到他所生存的时代的影响，也会或多或少影响他生存于其中的时代，具体程度视其个性或天赋而定。

在暴风骤雨的时代，在今日中国这样的经历着社会和政治剧变的国家，杂志的生命注定不会长久。期刊杂志在中国是新生事物，在中国的杂志里找不出像《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 那样拥有百年历史的杂志。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杂志是《东方杂志》，它之所以能历 36 年而不倒，完全是因为主办者是中国最大的出版公司——商务印书馆。在像中国这样动荡不安的国家里，出版公司一般都缺乏雄厚的资金支持，出面办杂志的，通常是穷文人的社团，他们需要拥有属于自己的表达媒介；或者是小出版公司，需要借助杂志引起注意以招徕生意。当这些文学社团产生分裂，成员远赴日本、美国；或者编辑把政府痛骂一通之后，作出决定：是为“重建”国家而贡献自己的才智的时候了，于是摇身一变戴上了乌纱帽，自然而然地，杂志在办刊方针和风格上会出现变化，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后，就关门大吉了。

除此之外，在中国，威胁这些杂志生存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图书审查制度和官方的禁令。杂志的寿命常常因此而缩短。1934 年，这样的官方禁令扼杀了中国最受欢迎、也最有希望的杂志《生活》周刊。它在巅峰时期的发行量，据称高达 155,000 份。起因或许是因为它的一篇文章，被顺理成章地解读为在福建事变期间鼓吹叛乱。主编邹韬奋在杂志被查封前已远走英伦。这家公司接着创办了《新生》周刊，使《生活》的精神得以用另外的名字复活，可是因为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提到了日本天皇，《新生》周刊又被扼杀了。闯祸文章的作者躲起来了，发行人杜重远先生被捕，被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监禁，上诉也被驳回。韬奋回国后，集合原班人马，创办了新的周刊《大众生活》，结果再次被查封。对“左派”分子或公开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版物来说，不断地被查封，又迅速更名重新出版，简直是家常便饭。这里只是记录事实，非欲对国是有所议论。但即使没有官方查封，由于上面提到的因素，大多数杂志一般也就一年或四五年的寿命。

也许杂志的情况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不过有人或许不这样想，他也许希望看到，未来有一家杂志在回首历史时，发现几十年已经过去了。虽然中国杂志的寿命很短，却活力十足、品种繁多，这也足以有所弥补了。可以说，今天中国的杂志业进入了繁荣期，已经处于专业分工极细的阶段，摄影、无线电、体育、妇女与家庭、艺术、电影、设计、自然科学、图片，以及其他工种和技术类别，都有自己的杂志。回过头来看看 1911—1926 年间的情况，那时只有一个属于知识分子的言论表达的中心，现在已超越了这个阶段。正在成长的一代，可以依靠阅读杂志而获得满足。中国读者把 1934 年称做“杂志年”。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应当是关于当代杂志种类和数量的调查数据。《中国年鉴（1935）》对在内政部登记过的 450 家杂志作了分类。以出版地划分如下：上海，99 家；河北和南京特别市各 49 家；北平，47 家；江苏，25 家；湖北，23 家；广东，21 家等。然而，上述这篇文章的作者、商务印书馆的经理王云五先生却说，所有已登记和未登记的杂志总数，“保守地估计，不会少于 900 家”。这一说明基于这样的事实：虽然在内政部登记出版的上海杂志只有 99 家，《上海年鉴（1935）》却表明，1934 年在上海出版的杂志不少于 212 家。根据这本年鉴，“综合类读物”有 52 家；“社会科学读物”有 51 家，屈居第二；“实用艺术”有 38 家，位居第三；“美艺术”（fine arts）^[1]有 35 家，第四；“文学”类 29 家，名列第五。

[1] 指绘画、雕塑、建筑、诗歌、音乐等。

上海杂志公司的代销杂志一览表提供了最新的数据。这家公司为各种各样的杂志充当代理，生意十分红火。杂志业的繁荣由此可见一斑。我手头的这张一览表是 1935 年 11 月份的，它的分类方式诚可挑剔，不过为其重新分类在这里却并不容易。

综合	35
读者指南	2
杂志引得和出版消息	8
文学	13
画报和摄影	21
戏剧、电影、音乐、娱乐	14
外交	8
法政	12
经济、统计、商务、工业	32
农业	11
通信、交通	10
建筑、技术	14
军事、警察	10
科学	15
学术刊物	24
电气与无线电	13
教育与运动	18
医药与卫生	27
史地	14
语言	9
少年读物	22
妇女与家庭	13
总计	345

兼营杂志代理这门红火生意的生活书店，提供了一份 1936 年 1 月 18 日的销售一览表，它的分类和销量如下：

综合	37
国际事务	9
社会学、经济学和统计	13
法政	8
军事、交通	9
普通科学、物理、化学	8
电气和无线电	8

工程技术	10
商业、金融	19
农业和动物养殖	11
医药卫生	13
妇女与家庭	11
教育与运动	15
语言	7
读者指南与刊物引得	7
文学	11
图画	9
电影	5
艺术与摄影	5
少年读物	16
经典哲学与宗教	9
史地	7
总计	255 ^[1]

自然，这些数字不包括大量不交上述公司代销的地方性色彩很浓的期刊，还有大部分不在市场上销售的许多政府机关出版的刊物。除此之外，日报出版的各种各样的增刊，文学、小品文、幽默、书评、医药、妇女问题等，因为是每周或每两周出一期，严格说来也应算作杂志。因此，《中国年鉴》的所谓“保守估计”，把总数定为900家，可能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此外，还有前面提到过的大量小报*，就是中国人称之为“蚊报”的，大多数是三天出一期，满足公众对小道消息和幕后新闻的巨大需要。小报的涌现，完全是因为大报枯燥难读、腐化堕落的缘故。这些大报通常有这样的习性：每天生产出来的文字长达十几万言，能打动读者的东西却没有一星半点儿。真正的重大政治进步，从中也绝无可能了解到。拿我个人来说，我每天阅读《申报》，只是为了浏览上面刊登的新书广告。尽管

* 参见上一章。

[1] 应为247，原书有误。

过去我还想看它的社论，可因为搞不准它会刊登在当天报纸的哪一版上，慢慢也放弃了。社论不但没有确定的位置，而且每天所在的版面也不相同。对我来说，通常要捉一番“迷藏”，才能找到它。它在报纸上的位置完全取决于当天广告所需版面的多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蚊报”壮大起来了。想来，1934年大概超过了200家。

当代杂志的繁荣局面，应该归功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公众教育水平的提高。相当一部分杂志是由官方资助的，但另外一部分，特别是技术类的杂志，却是由支持它的学者亏本经营的。尽管如此，绝大部分杂志不可避免地是商业性的，其生存依赖读者的扶持。与美国的杂志相比，中国的杂志广告太少。维持杂志运转所需的资金，就落在读者肩上了。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二三流的杂志已被淘汰了。

公众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从每月出版的新书种数的比较研究上看得出来。知道了每天、每月出版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新书种数，你就不会为杂志业也达到这样的水平而吃惊了。《大众生活》1936年1月18日的“出版消息”，列出了从1935年12月12日到1936年1月12日一个月内出版的新书：

综合	3
哲学	4
教育	15
社会学	7
经济学	13
政治学和外交事务	9
法律	6
军事学	3
自然科学	13
应用艺术	8
医药卫生	2

语言学	3
文学史、文学批评	7
小说	10
诗歌	8
戏剧	3
散文	9
美艺术	19
史地	15
传记	2
少年文学	13
总计	172

用月出新书种数 172 乘 12，得到年出新书种数：2064 种*，比起美国的 9000 种，德国、日本各 27000 种来，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不过，这个数字对这个自诩为文学大国的国家来说，已经蛮不错了。

选取几种杂志，作仔细的观察，有助于了解这些杂志的类型。例如，综合类中的《东方杂志》、《新中华》，如果单考虑它的性质，而不问其质量，可以说约略等于《世界的工作》^[1]与《哈泼斯》月刊；目前已出到 620 号的《礼拜六》周刊，刊载传统风格的短篇言情小说和诗歌，间或发表用白话写作的文章^[2]；这时的杂志，分工很细，《蜜蜂月刊》就是个专业化的例子；画报和电影杂志品种很多，也十分畅销。这种类型的杂志，也许可以《良友》为例。它选择的图画极为精美，配有中英文说明，内容有古今中国画、优美的中国风景、新闻图片，也有反映古代中国手工业如

* 关于 1934 年出版的新书品种，《中国年鉴（1935）》提供的数字是 2263 种，《申报年鉴》则估为 1890 种。

[1] *World's Work*，鼓吹美国生活方式，主张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的月刊，创办者为佩奇（W.H.Page，1855—1918），创办于 1913 年，停刊于 1932 年。

[2] “鸳鸯蝴蝶派”刊物《礼拜六》创刊于 1914 年 6 月 6 日，1916 年 4 月 29 日出完第 100 期宣布停刊。1921 年 3 月 19 日复刊，1923 年 2 月 10 日终刊。前后共出版 200 期。此处所言，似乎是指田寄痕主编的同名杂志。

制墨、川地从盐井采盐过程的图片，赤身裸体、大屁股的女人和中外影星，偶尔还有女装设计图。这类美术杂志总是以研究人体解剖、增强体质、介绍西方文明为幌子，打裸体的主意，做得也确实很成功。这里可以举《唯美》为例，这份杂志除了裸体图片就没有别的内容了。还有《时代漫画》，极像美国的《大话》(Ballyhoo)杂志，刊载索科洛夫^[1]、考瓦路比亚^[2]风格的卡通画、速描；厚厚的《外交月报》，让人联想到英文的《外交事务》^[3]，每份售价4角；《苏俄评论》现在已经出到第9号了；商贸类的杂志简直可以说不计其数；中国科学社是家严肃的学术团体，出版了《科学画报》，类似于《科学美国人》^[4]；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的《时事类编》，相当于美国的《生活时代》。^[5]这个机构还出版《期刊索引》月刊，打开这份杂志的任何一期，你就会领略到从商业、金融到土法造糖、当前苏联航空等每月出版的期刊杂志之丰富多彩了；另一份杂志《人文月刊》，本来是想办成普通杂志的，几年来承担起期刊索引的工作，并成为其主要特色之一。在教育领域，有《文化与教育》、《小学教

[1] 索科洛夫 (Pyotr Petrovich Sokolov, 1821—1899)，俄罗斯画家。以反映农民地主日常生活的油画著名。曾为果戈理的《死魂灵》绘制过插图。

[2] 考瓦路比亚 (Miguel Covarrubias, 1904—1957)，画家、人类学者，为《名利场》、《纽约客》等杂志插图并自行著书配图，有说明太平洋地区文化的《太平洋盛典》，评述北美印第安人文化的《鹰、虎、蛇》等著作。

[3] *Foreign Affairs*，美国国际关系杂志，旨在促进美国参与国际事务，1921年创办于纽约。

[4] *Scientific American*，前身是创办于1845年的解说新发明的报纸，1853年发行量达到3万份，除科学发明之外，内容扩展到天文、医药等各种学科，其文章多基于扎实的学术研究，文笔流畅可读，加以精心的编辑和出色的插图，成为颇受尊重的科普刊物。

[5] *Living Age*，一家刊登小说、诗歌、评论的综合杂志。由利特尔 (Eliakim Littel, 1797—1870) 创办于1844年，前期以转载外国杂志的优秀文章为特色，1938年秘密接受了日本政府的资助，1941年停刊。

师》、《中学生》，还有已有 25 年历史的《教育杂志》以及很受江苏省教师欢迎的《江苏教育》；甚至还有专门报道中国公路建设进展的杂志；为鼓励旅游，中国旅行社创办了《旅游杂志》；还有关注西北诸省发展的《向西北》杂志（*To the North-West*）；青少年期刊对我来说太过新潮，对当下的青年一代，却是很好的读物。至于国内的妇女与家庭类杂志，与美国比起来，则太小儿科了。究其因，一是这些杂志的编辑倾向于抽象的理论探讨，二是中国的家庭妇女还没有养成看杂志的习惯。我说的是一般的家庭妇女，多数知识女性都读适合两性阅读的综合性的杂志。《人文月刊》11 月号记载，1935 年 10 月份各类杂志共刊载了 65 篇文章讨论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专门讨论国联的则有 24 篇。

中国的杂志虽然品类繁盛、数量众多，但在编辑艺术和文章的写法上却不及西洋杂志。细相比较，会发现许多差异。首先是写作笔法不够通俗。著书立说，在中国过去是名山事业，局限于少数文人学士，此种文学传统对文风的影响至今犹存。作家提起笔后，首先想到的就是炫学。他们随时准备讨论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格局或比较普鲁士国会同英国议院之异同，却不愿意谈一点儿贴近人的内心和生计的话题。作者里的平庸之辈，惟一的本领就是剪刀加糨糊。天下文章一大抄，这一点，中外如出一辙。对“近东政治”作泛泛的“鸟瞰”的作者，只不过是从英文、日文杂志上剽窃一些材料，连缀起来，就当自己的作品发表了。我就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认识几位讨论近东局势的作家，他们对巴尔干半岛的地理形势只有一点模糊的概念。利用此类把戏，甚至已经上了教科书的观点，也被改头换面写成文章发表了——我倒不反对炒冷饭，只要用的材料是真实的。问

题在于，随着能阅读的公众越来越多，以前那种少数学者把持一切的局面不复存在，杂志迟早得采用通俗易懂的写法。必须把哲学从天上带回人间，把它改造得让普通人也喜闻乐见。在我自己的编辑生涯里，曾为此尽过绵薄之力。我希望能开创平易近人的报刊写作风格，这是我持之以恒的目标。直白的文风只有一样不好：如果作者胸无点墨，肯定会暴露出来。所以有许多作者避免这样写文章。

拿一本普通的西方杂志和中文杂志相比较，这种文风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当前的英文写作，笔调较中文接近口语。中国人中没有胆子大到敢用口语写文章的。最厉害不过的冒犯者是些年轻的、热烈的白话文支持者。我在努力使文章通俗化的斗争中，花了很大力气推广古代经典作家的“语录体”——当代白话文作家看了这样的文章，应该为他们简单的词汇和文法脸红。事实是，古代语录体作家确实做到了明白如话，我手写我口，并不觉得丢脸。而现在自称为“白话文”的文章，倒有不少雕章琢句、堆砌辞藻、扭捏作态、不知所云的胡言乱语。

这种文学传统的另一个影响体现在杂志作者的社会地位上。尽管1917发生过一次文学革命，耍笔杆子这个行当仍然高深莫测，除了作家本人，社会上莫不敬畏之、尊重之。问题的关键是，在西方，举凡流浪汉、刑满释放者、运送刚果奴隶的司机、猪肉大王抑或精神错乱的老女仆，人人皆有勇气执笔写文章、出书，只要他觉得有故事要讲或者有创作灵感。举几个寻常的例子，在美国杂志上，有城市消防部门负责人撰写的关于救火技术的文章，有空军军官或航校首脑撰写的关于飞行仍然是危险运动的文章，有出版公司的前编辑谈教科书形势的文章，亨利·福特视撰

写自传为义务。出现这种可喜的形势，首要原因应当是英文文法相对简单，借助著书立说来自我表达的神秘感也就消失了。才情庸常的西方人会认为，只要把不吐不快的话说出来，就有机会赚一笔稿费。基于一种较为合理的美学理论，当代英语在语法、修辞、标点法上，有打破所有规则的趋势（以格特鲁德·斯坦因^[1]为代表）。这极大地把当代英语的文风从矫揉造作和过度精致中解放出来。如果一个刑满释放者真的有话想说，他可以津津有味地，用最不合文法然而却是最有力量的语言写出来。

中国的白话文体远远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惟一一位在世的、用口语写作、不怕庸俗而大获读者喜爱的中国人，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中国没有亨利·福特，即使有，中国的亨利·福特做梦也不会想到写自传。也许亨利·福特的自传不是亲自操刀的，但想来起码大半是由他口述的。英语的传统让他感觉到，涂涂抹抹没什么了不起。中国的情况则是这样的：杂志编辑想刊载一篇分析现阶段飞行风险的文章，到航空部门的头头那里去讨资料。头头不会自己写这篇文章，把这个任务交给文书。文书草就一篇说教文章，大谈航空事业对救国的重要性，以这样平淡乏味的方式开头：航空是救国运动中最重要工业（Avi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dustry in the salvation of the country）。在英文中，此句读来甚为流畅，在中文便有人恶其不文。确实，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作的艺术，就体现在为这样简单的句子殚精竭虑上。尽管这样的传统现在正在垮掉，但普遍的看法

[1] Gertrude Stein (1874—1946)，美国女作家，1903年起定居巴黎，有《三个女人的生平》、《美国人的成长》等40余部作品，其作品富有创新精神，注重实验性句法、语言节奏和语言印象方法，对旅居巴黎的西方作家和艺术家影响很大。

是，只有一小撮训练有素的人士方能写作。中国杂志的编辑决不会想到向消防部门负责人约稿，即使编辑发出了这样的邀请，那负责人也会以为是恶作剧。

这里需考虑到报酬方面的因素。美国杂志为每篇文章支付的稿费在100美元到2000美元之间，但中国杂志给作者的报酬是平均每千字3到4美元。写作是中国报酬最低的行业之一。依靠为杂志写稿生活的普通作家，收入还不如修车厂的一流技工。如此低的报酬，很难打动养尊处优的经理为杂志写稿，即便他们有冲动或勇气想就其行业说点话。故此，编辑不应当为此受到指责。杂志要维持着办下去，发行量起码要达到5000份。一本50页的杂志，每份售价1角，留给作者的稿费寥寥无几。代销商拿走三成后，每份杂志实际上只剩下7分钱给出版人，其中有1分或5厘还可能会成为呆账，印刷、纸张差不多用掉3分，房屋、水电5厘，剩给编辑和作者的，每份杂志大约只有两分。个别一流作家能拿到高达每千字10美元的报酬，但只能视为稀有的个例。

这种文学传统的第三个影响是，中国的作家不愿为一篇特写文章而东奔西跑搜集材料。他们从不用“脚”写作。美国报纸可以为一流作家或记者支付旅行费用，去采访报道中牵涉到的重要问题。他们有条件这样做，是因为稿费够高，可以支付外出旅行或逗留国外的费用。一位驻北平的美国记者，想做一篇关于汇丰银行的报道，可以到上海一趟，住进皇家酒店，然后坐头等车厢返回北京。对中国杂志来说，这样的举动可能就划不来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我们缺乏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写报道作者。我认为这是中国杂志业目前最大的缺陷。杂志社不能为作者提供充分的资金，

以便利作者去南京待上两三个星期，为一篇检讨五年来监察院或考试院工作的文章搜集素材。我在自己办的杂志里，曾多次公开征求这种特写文章，但至今无人应征。抛开报酬方面的考虑，我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的作家都是学者，而学者，一般认为是不应该用腿来写作的，不应该东跑西蹿、从活生生的社会中寻找新鲜材料的。政府机构的官僚和文书写的东西，又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养尊处优之士却又不愿动这个脑子。结果时下杂志里的稿子，往往来自住在环境十分恶劣的上海里弄亭子间里的穷作家，他们擅长化简为繁，大言不惭讨论抽象的理论问题，要么就从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言或书本里找材料。这大有把杂志同处于演变中的社会真实生活隔离开来之势，这是十分有害的。我以为，杂志如果不能反映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其中的生活，那就失去了它的功用。政府机构以报告或公告的形式出版了大量的统计资料，仅仅参考这些公告，就可以写点讨论进出口问题的文章。然而我们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官方的公告，而是有批评眼光的记者——受过教育训练的睿智之士，乐意四处奔跑搜集材料。沃尔特·杜南蒂^[1]已为俄国所做的事情，却没有人为中国的杂志做，仅仅是因为，中国没有沃尔特·杜南蒂这样受过良好训练、拿自己的职业当回事儿的一流记者。

[1] 沃尔特·杜南蒂 (Walter Duranty, 1884—1957)，生于利物浦，1922年—1944年任《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所写的关于斯大林和五年工业计划的报道于1932年获得普利策奖，颁奖词中认为他“深刻而又明白地揭示了俄罗斯的处境”，文章是“外国通讯的最好范文”。译者按，1990年代以来，杜南蒂逐渐被认为是斯大林的辩护者。主要原因是，杜南蒂在文章中屡次否认乌克兰大饥荒的存在。《纽约时报》聘请了俄国史专家审查了杜南蒂的文章，在杜南蒂的在《纽约时报》总部的照片旁边注明“社内及社外一些作家认为他的报道不可信”。数个国际机构要求普利策奖委员撤销杜南蒂的荣誉，普利策奖委员经过讨论，没有接受。

在职业伦理上，中国新闻业也有别于西方新闻业。我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业的职业伦理水平是相当低下的。编辑有他们的困难。面子问题在中国各界人士心中都是相当重要的，在新闻业中当然也十分重要。比起美国的撰稿者来，中国的撰稿者，无论身份如何，在对待编辑的修改和退稿上，都不够通情达理。如果一篇文章因为笔调或内容的原因遭到退稿，作者本能地会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如果他有一点社会地位的话。遭退稿者会转向另一家杂志（反正杂志多得很），写文章诽谤给他闭门羹的那家杂志，这种例子多得不胜枚举。由于今日中国的作家分化成主要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阵营，形势进一步恶化了。时时刻刻上演着文绉绉的、经常不那么文雅的互相指责，中国人称之为“文人相轻”。我因为大力介绍幽默、在文学上承认其价值，鼓吹“语录体”，一直被人指责为“祸国殃民”，实际上只是因为我既没有参加国民党、也没有参加共产党的阵营。

但对作家来说也好，对经营杂志的人也好，这种互相指责的现象，其实并不奇怪。每一位尝试把业余戏剧演出搬上舞台的中国导演都知道，让众多业余演员都服服帖帖听号令有多么困难，因为指派一个次要角色而得罪演员又是多么的容易。实际上，我相信，抛开在金融资本上的区别不谈，相比而言，好莱坞和美国杂志的优点，应归功于它对“保存面子”的看法。我也相信，如果作家有公平竞争的观念，文人并不必然相轻。任何行业都有妒忌，妇女、糖果商、军阀和作家的情况都一样。作家相互妒忌的例子之所以那么令人瞩目，是因为妇女打架用的是指甲，军阀用的是大刀和机关枪，作家用的却是笔。当你愤怒的时候，上策莫过于闭嘴；中策是用指甲把对手抓个稀巴烂，或打得鼻青脸肿；下策是张嘴把对方教训一

通；下下之策是把斥责对方的话写下来。笔的伤害力超过舌头，舌头的伤害力超过拳头。因为文章总会留下痕迹。两位敌对的军阀今冬还用机关枪、野战炮打得不可开交，明春又手挽手坐进一辆车子了；两个妇女可以牙咬指掐，没有人会拿这当回事儿，她们自己也很快会忘掉这回事儿。但一旦两个作家怒发冲冠，忘乎所以，把满腔情绪形诸笔墨，过后再想合情合理地摆脱掉就很难了。

中西新闻业的另一个显著区别是，由于中国盛行的古怪风气，中国新闻业在讨论问题时不够坦诚。审查制度在哪个国家都是愚蠢的，作家当然痛恨检查官，除非为了饭碗考虑，自己也去做审查官了。如果检查官的作为，只是限于决定稿件是枪毙还是通过，形势也不至于坏到不可收拾。但中国的情形是，不管文章作者乐不乐意，检查官就承担起了增补和删削的责任。其荒谬可笑之处，正与画展检查官手操画笔、调色板，在裸体人物上添加几片无花果树叶、在天空中加上月亮相同。检查官要是柯罗^[1]、塞尚^[2]一类人物，倒也好说。但如果负责检查画展的碰巧是名念大二的艺术系学生，检查文章的碰巧是位找不到工作、四处流浪了好几年的中学毕业生，又会如何呢？我在中国前后编过三种杂志，对这些荒谬的事情多有领教。有的是很有趣的。有一次，一位作者写了篇谈春节的文章。中国的新年，类似英国的圣诞节，既是孩子的节日，也是老年人的节日。这篇文章

[1] 柯罗 (Jean Baptiste Camille Corot, 1796—1875)，法国画家，是使法国风景画从传统的历史风景画过渡到现实主义风景画的代表人物，作品有《沙特尔大教堂》、《阵风》等。

[2] 塞尚 (Paul Cezanne, 1839—1906)，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代表，认为自然物体均与简洁的几何体相似，对运用色彩和造型有新的创造。代表作有《玩纸牌者》、《圣维克图瓦山》等。

提到了爱的影响，如同托尔斯泰一再鼓吹的。检查官删掉了用斜体字标出的这一句。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清晨，我躺在床上吸纸烟，突然灵光一闪，我那迟钝的脑瓜才开了窍：托尔斯泰是俄国人，因而必然是个布尔什维克！真让人哭笑不得。在上海福州路的书店里，由于书名中有“马克思”三个字，真正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书都被禁了。四川还一度禁过一本古文语法书，作者是位姓马的先生^[1]，书的名称就叫做《马氏文通》，卡尔·马克思在中文里正好也“姓”马，于是乎被当做一家人了。

在现行的增删之外，审查制度实有大恶伏焉。首先，中国的审查是偶发的、前后不一致的，可能还不如日本的审查制度来得有系统、有效率。在上海被禁了的东西，拿到北京，可能通过了，反之亦然。什么该禁，什么不该禁，检查官并没有明确的想法，也没有一定之规。这导致了另外的困境：编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以遵从的指导原则。他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文章可以通过审查，什么样的不可以通过。由此可见，审查制度的间接影响就是，作者和编辑在对政府的批评上的不断退缩，其害处要远远大于直接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对政治议题的坦率而自由的交流，是绝不可能有的。姑以法西斯主义的观点为例。我相信，中国有法西斯主义的观点，也有反法西斯主义的观点，正如国内有主张中日合作、主张君主制的观点，也有反对的一样。但是法西斯主义也好，中日合作也好，从未有过公开而坦率的辩论。虽然，杂志应当充当公开交流的媒介，但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决

[1] 马建忠。

不会公开站出来，在一篇阐述自己观点的文章上签上名字，反法西斯主义者也不会公开攻击法西斯主义。这种状态当然算不上健康。公开的批评被压制到地下，甚至蜕化为茶馆里的闲谈。大家无法根据报刊刊登的文章作出判断，只好轻信茶馆里的谣言。

不过，除了上述情况之外，中国的杂志已经对中国社会和知识界的觉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和各种人群，无远弗届。毋庸置疑，伴随着中国觉醒的历史的，是几家杂志和几位杰出报人的历史。连中华民国自身，也是几家在东京和海外几个港口出版的报刊的笔战产生的结果。其中最著名的，有保皇党人报纸《新民丛报》，由才华横溢的梁启超主持笔政；孙逸仙博士领导的革命党人的《复报》、《民报》。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26年，杰出的作家不断运用笔杆子的力量，利用报刊影响公共思潮。如上章所述，1911—1915年间影响最大的是，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主办的《庸言》（创刊于1911年）、《大中华》（创刊于1915年）、康有为主办的《不忍》（创刊于1912年）、孙逸仙主办的《国民》（创刊于1912年）、章行严主办的《甲寅》（创刊于1914年）。从新文化运动到1926年国民革命期间，则有胡适、周作人、郭沫若等许多作家。所有这些作家，都写过时效性很强、只有短暂生命的文章，为时代大方向和当代思潮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代文学领域的成就，乏善可陈。文学已成为政治的婢女，根据政治纲领的不同，分裂成共产主义和国民党两个派别。造成这种分裂的，是今日中国面临的迫在眉睫的政治威胁。这也是在政治上你争我吵的文章所由产生的根源。文学的通明与博大因此丧失了。卷入政争的文学，只能向党

的纪律和党派政治低头，个人不再是个人，而是政党和派系宣传的卖力的帮办，所想所言惟其马首是瞻。既无脾气，政见便缺少锋芒；又无胸怀，自不能具备周全的眼光；怀着廉价而自欺的爱国精神急于救国，却要把救国之责居为一人一党所有，不容他人染指。当今的作家热衷于夸夸其谈，既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同情的理解，更不能温和而明达地行事。阅读今天的杂志，给人的感觉就像听到有人在行将沉没的、一片混乱的轮船上呼喊，而我这种沉湎于幽默、不属于任何派别的人，时常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在茫茫黑夜里吹着口哨的人。

第十三章

检查制度^[1]

审查官永远是世上最荒唐的职业。不论在哪个国家、哪个年代，总是大家咒骂和嘲讽的对象，能够幸免的很少。因此，如果中国的审查官闹出了什么荒唐之举，我们完全可以宽宏大度地、有点幽默感地把它归于职业的而非个人的原因。事实上，我曾与图书杂志审查处的一位负责人交谈过，结果发现他极为招人喜爱。这样的人当审查官，显然是入错行了。他被置于这样的窘境：要么，像手持剪刀在大街上逛来逛去以改良女士服装款式的广州警察一样，对自己并不在行的作品乱改一气；要么，对自己不懂的作品不作任何删改，从此不再以此谋生。设想，如果审查官只是一位中学毕业生，靠删节小说或散文里他认为应当删节的段落而获得月薪，审

[1] 1933年，国民党的新闻统制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再以审查追惩制度为主要手段，开始推行旨在事前预防的新闻检查制度。参见前引《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卷，第412页。原文中的“审查”与“检查”没有严格区分，译者根据语境，有时使用“审查”，有时使用“检查”。

查小说时，他应当了解小说家关于情节和人物的意图，假如是散文，他就应该熟谙文章的构思、文中提到的作者、讨论的书籍、阐释的思想流派等全部背景。一位收入微薄的年轻人，很难拥有这样的能力（只有没什么特长、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才会接受薪水这样低的工作）。那么，又有谁可以充当他人思想和观念的审查官呢？

中国古代时常有查禁文学作品之举。用不着追溯到秦始皇时代了，那时，朝廷焚毁了它认为有害的书籍。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清廷制造了许多文字狱，很多作家的书被查禁，人也被杀害。^{*}在纂修著名的《四库全书》时，乾隆皇帝用了大约7年时间，清查反清作品。大臣列出了大约2000种图书的清单，准备部分或者全部销毁。^{**}

我们不能忽视当今的书报审查制度，因为它阻碍了舆论的成长，造成了新闻界今天的局面。唯有它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没有是非观念。审查制度的实施表明，政府方面以为，在没有新闻界或人民“干涉”的情况下，它完全可以履行其职责。如果这样的政府在外交或军事上节节胜利，民众倒也乐意闭口不谈国事。但是，在国土不断沦丧之际，当局却禁止老百姓发表看法，禁止新闻界发出声音。这时仍然实行审查，只能使民众普遍陷入悲观与失望的情绪之中。在民族危亡之际，要保持“镇静”——统治者总会拿出这样的托词，这确实很合乎东方的传统。但是，如果这种所谓的“镇静”保持得太久，致使民众意识到不可能有所作为，那与没有心肠的冷漠也就没什么差别了。

* 参见北平故宫博物院新近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

** 参见《清代禁书总目》，杭州抱经堂。

这里且谈客观事实，不再妄加评论。关于新闻审查制度存与废的争论，大家已耳熟能详了。查禁报刊、囚禁编辑、逮捕学生的人，早已为所作所为准备好了辩护书，想来，也就用不着否认这些事件的真实性了。“可恶的共产党人，老是制造事端，想方设法组织反日学生示威，腐化青年的心灵”，“在民族存亡之际，我们应当做到‘文化团结’、‘统一思想’”，等等，等等。审查制度于是就有了正当理由。这里还是讲点事实吧。

袁世凯取得政权后，民国时期的中国报业就开始堕落了。在第十章中已提到，1914—1915年间，袁世凯密谋推翻共和制，制定了出版法，以便逮捕编辑、关闭报馆，结果民国建立后成长起来的500余家中国报纸，只有几十份得以幸存。这几十家报纸，当然已被袁世凯收买了，能想老袁之所想，不放过任何拍“陛下”马屁的机会。这样的故事，大家是很熟悉的。一旦出现了强大的宰相（如同宋朝和明朝那样），这样的事情就会重演。

袁世凯死后，新闻界的命运突然发生转变。总的来说，1915—1925年这段时间内，新闻界有相当大的自由。然而，也曾短暂地受到残酷的迫害，特别是1926年奉天军队进驻北京、反共分子张宗昌控制了北京政权以后。这时在北京为国民党做宣传工作的都成了“共党工具”、“赤色分子”。张宗昌是中国形形色色的军阀中的最后一位，他极为仇共。为收杀鸡骇猴之效，他以革命报刊接受俄国方面的卢布为名，不经审讯，就枪杀了《京报》的主笔邵飘萍与《社会日报》的主笔林白水。两人均于午夜被

捕，约于次日凌晨时遇害。^[1]

张宗昌有浓厚的旧式作风，也有正义感，跟他讲道理，他还是听得进去的。《世界日报》的成舍我被逮捕后，拟予枪毙，可是，处决书需张宗昌亲自签署，适逢他新纳一妾，凌晨时分，正是销魂时刻，没人敢在这时打扰。成舍我因此得到喘息之机。他的家人央请曾任国务总理的孙宝琦前来求情。张宗昌与孙宝琦商定，检查成舍我的银行账户，如果成舍我确实没有收受来自俄国或其他方面的数十万元，就释放成舍我并向其道歉。结果表明，成舍我确实是名穷记者，避过一劫。这就是正义，尽管是中世纪式的，毕竟也是正义。

可与此事作一比较的，是成舍我在 1934 的遭遇。这时，成舍我担任《民生报》的社长，该报是 1927 年在南京创办的第一份报纸。^[2]1934 年 5 月 24 日，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揭露负责行政院新大楼建设的一位官员（汪精卫部属），正在让该大楼的承包商为其营建私宅；行政院新大楼的造价，从最初估计的 6 万元，激增至 13 万元；汪精卫对此极为愤怒，该官员刻下已提交辞呈云云。由于刊载了这一报道，25 日，当局勒令《民生报》停刊 3 天，罪名是“恶意宣传”。第四天复刊后，《民生报》发表为自己辩护的文章，并对该丑闻作了进一步的报道。那位官员向法庭提起了起诉。报道看来有充足的证据，原告撤诉了。不过，这只是开始。7 月 27 日，《民生报》刊载消息称，监察院对汪精卫

[1] 两人遇害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凌晨 4 点左右。参见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71—373 页；前引《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 2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219—220 页。

[2] 该报创办日，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日为同一天。所谓“第一家”，当指此而言。

的一名部属提出了弹劾，该消息是由一家通讯社发布的，已通过审查。然而，蒋介石却由南昌行营电令南京宪兵司令部关闭《民生报》，逮捕成舍我，调查其消息来源。消息来源其实很清楚，没什么好调查的。但与此案有关的一位大人物，却命令宪兵司令只管执行来自南昌的命令。成舍我于是被捕。其实，除《民生报》外，还有另外几家报纸也刊登了这条消息，而且，代表行政院（以及军事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的审查委员会已经审查并通过了这条消息，汪精卫之流罔顾这一事实，实在是交代不过去。在把成舍我关押了40天后，汪精卫派后来被刺杀的唐有壬，与成舍我商谈释放条件：（1）《民生报》永远停刊；（2）成舍我保证今后不再在南京出版报纸（包括杂志、小册子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印刷物）或发表有关统治当局的言论，使用笔名也不行；（3）成舍我如离开南京到外地，需向当地政府报告行止，以备检查。成舍我明智地接受了这些条件，这要比待在监狱里受罪好多了。汪精卫在反蒋时期高举“保障民权”的口号，结果不过如此！这很容易让人对所谓的民权的呐喊产生怀疑。成舍我当然如此。目前他正在上海的租界里，主办日报《立报》。

我把这件事叙述得这么详细，不但是为了拿它作为一个典型，来和张宗昌那种直截了当的公平处理作番比较，而且也可以用它说明强权是如何运作的：如果它认为某家报纸应该消失，不管有没有正当的理由，这家报社都会被取缔的。

非止此也，《民生报》的案例，还可以用来说明，审查制度常常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由于审查官是代表官方的，经其审查后刊登的文

章，当局就要为之承担责任，起码在法律上来说，报馆主笔就不用为之负全责了。我说“起码在法律上”，是因为在成舍我一案中，当局并未因文章已通过审查而放过他，在杜重远一案中也是如此。杜案大概是近年来新闻界最为著名的冤案。在此案中可以看到，当局因为新闻审查制度而饱尝了自作自受的滋味，但并不会因为文章已通过了审查就不追究报馆发行人了。1935年夏初，《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文中把满洲国的溥仪看做日本天皇的傀儡，而日本天皇本身也是傀儡，这样溥仪就成了“傀儡的傀儡”。两个月后（7月份），日本驻沪领事馆对此提出抗议，并对上海市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起诉杜重远。杜重远是杂志发行人，在文章作者逃走的情况下，他只好为此负责。然而，这篇惹来麻烦的文章是上海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了的。这使当局有点尴尬，这样的文章也能通过审查，可能会授日本人以口实：国民党不够“亲善”。合理的解决办法或许是，把这件事视为审查人员的疏失或玩忽职守，将之撤职了事。可是，由于单方面的高度紧张，国民党当局开始和杜重远协商，要求杜归还审查人员为该期杂志核发的审查证，并承担全部责任。比起一般的发行人来，杜重远胆子太大，他拒绝了。上海高级法院第二法庭^[1]在审理此案时，报复性地判决杜重远有期徒刑14个月，不准上诉。剥夺被告的上诉权是史无前例的，在法律上也找不到任何根据。上海律师公会对此深感震惊，发表了抗议书。多次协商后，法院表示愿意修改判决书，

[1] 应作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该院设于上海。

不过，杜重远觉得从总体上来考虑服从判决是最为稳妥、更为可取的办法。他服刑了，敌视他的人的怒气也就消了，日后的阻力就小了。舆论是毫无异议地站在杜重远而非代表“正义”的法院一边的，正如在一些勇敢的报刊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由于舆论偏向于认为，当局应当为已审查通过的文章负责，书报审查制度因而就被视为不明智的了。当局遂解散了上海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这是《新生》事件的间接影响之一。

四五年来，新闻界的影响力渐渐萎缩，几至于无，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比1900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差。——这里只是记录客观事实，不准备讨论促使现在的统治者剥夺公民自由的因素：欧洲的法西斯国家为自己所作的辩护（或者说是榜样的力量），统一全国的需要，等等。埃德加·斯诺在“被审查过的中国思想”^{*}一文中，全面评论了中国审查制度的状况。那篇文章中所讲的情况只要有一半属实，就足以证明这样的看法了：当今中国的知识和思想受到的控制之严密，实在是自1900年以来未曾有过的。我们注意到：

“南京的监狱中关押着大约2500名政治犯。”“仅1934年一年，在华北就有110家各种类型的报刊被暂时停刊或者完全查禁。”“自1934年11月到1935年3月，仅北平和天津两地，就关押了230多名政治犯，其中包括许多学生、文艺工作者和教师；1934年两市逮捕的政治犯超过800人。”1934年12月29日《北平时事日报》刊登了当月19日公布的149本

^{*} 刊于《当代历史》，1935年7月。

禁书的名单。许多当代中国作家最优秀的著作遭禁，其中包括“现代中国小说之父”鲁迅，11本；被迫流亡国外的著名作家、考古学家郭沫若，10本；蒋光慈，10本；活着的中国小说家中最伟大的一位——茅盾，9本；仍在狱中的丁玲，7本；还有巴金、张天翼及其他被扣上“思想反动”帽子的名作家的书。许多西方作家的作品中译本被禁，其中包括多斯·帕索斯、西奥多·德莱塞、斯特林堡、罗素、高尔基、厄普顿·辛克莱，甚至梅特林克、罗曼·罗兰。

说这样的清单是愚蠢的审查制度的糟糕透顶的例子，是相当公允的评价。它的荒唐之处在于，审查者对有些作家（如梅特林克^[1]）一无所知，竟然也把书禁了。有的左翼作家的作品是10年前出版的，这次也被禁了。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大规模禁书，意图显然在于切断左翼作家赖以生存的版税。此举震动了25名出版人，1935年2月2日，他们向当局表示强烈抗议，要求对查禁书目重新加以审议。最终，当局的态度有所缓和，对书目作了大幅度修订。

还有更为过分的。1931年2月7日，五位共产主义作家饱受拷打之后，惨遭杀害。^[2]这标志着“围剿”共产主义作家并以国民党的观点加以审判的运动开始了。这样的做法似乎有其理由，因为共产主义思想的确得到了极大普及，而且实际上正在影响年轻的一代。“左派”或者“左倾”作家开始神秘地从人间消失。想知道一位被捕的作家是死了还是活着，还是在

[1] Maurice Maeterlinck (1862—1949)，比利时法语作家、诗人。象征派戏剧的代表作家，剧本充满诗意，可以称为诗剧。早期作品带有颓废悲观的色彩。1896年移居巴黎之后，这种色彩减弱了。代表作《青鸟》是部六幕梦幻剧。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 即“左联”五烈士事件。

强迫与劝说下右转了，通常极为困难。当今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之一丁玲，1933年5月被绑架，至今已两年了，大家仍然不清楚她的案情。关于她的情况和关押地点，不断有自相矛盾的传闻。大家相信她还活着，被关押于南京，但有一定的自由。一般认为，丁玲事件间接地导致杨铨被暗杀。杨铨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也是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他积极地组织了委员会，营救丁玲，而且有未经证实的传闻说，他手里握有当局绑架丁玲的证据，其中包括绑架者所乘的小汽车的车牌号码。杨铨在法租界内的中央研究院前遇刺之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停止活动了。

这场统一思想、清除共产主义的运动，好像暂时收到了成效，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很多被误捕的犯人，在监狱里蹲上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后，幸运地找到了“门路”，很快就被无罪释放了。另一方面，许多真正的共产党领导人被关在大牢里。被捕者在狱中接受审讯，具体情况都得到调查。如果所做的只不过是愚蠢地参加了学校里的反日集会或街头示威，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行为，就会得到释放。给共产主义者的是两种选择：要么悔过自新，要么就接受惩罚、服刑或者被处决。国民党特务会来劝说他们信仰三民主义。愿意悔改者为表忠心，必须揭发其同志，供出其住址，以便顺藤摸瓜。依靠这样的手段，当局在上海成功地围捕了一大批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包括1935年2月逮捕的34位作家。在这些被捕者中，电影导演、现代话剧的积极推动者田汉，可以视为悔过自新的典型。现已获得自由，任职于国民党的文化

部门^[1]，其余绝大部分仍被关押在南京的监狱里。

地方检查委员会，由各地党、政、军三方机关派员组成。在地方检查委员会之上，是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2]，它把自己的权力一直扩张到国民政府之内。南京的新闻检查所，由蒋介石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行政院和国民党中央派员组成。由于政局动荡，地方政府不断更迭。在何应钦^[3]与黄郛^[4]主持北方政局时，检查所掌握在他们手里。随着时局的迅速转变，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检查所也换了人马。现在的检查委员会，就是由冀察政务委员、北平、天津两市的人员组成的，主其事的，都是萧振瀛^[5]和宋哲元^[6]的部属。

透过新闻检查的规章，可以管窥新闻检查的标准。从北平新闻检查所

[1] 1935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遭敌破坏，田汉被捕。半年后，由张道藩、徐悲鸿、宗白华保释出狱，旋即为民营的《新民报》撰稿，并以中国舞台协会的名义从事戏剧活动。鲁迅曾视田汉为“忏悔者”与“巧人”。“七七”事变之后，周恩来亲自对田汉与阳翰笙的被捕入狱予以审查，恢复了两个人的组织关系。参见张耀杰：《影剧之王田汉》，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1、293、295、297、300、303页。但1949年后曾与田汉长期共事的张光年说：“1938年在三厅，我与田汉在一起，我是六处戏剧电影科科长。田汉的党籍问题当时没有解决，但当党员看待。直到1950—1951年间，周扬给中组部长安子文写信，才解决了。”参见董健：《田汉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749页。“文化大革命”中，南京的出狱和戏剧活动，成为田汉被定性为“叛徒”的直接依据，为此，田汉吃尽了苦头，最终屈死于专案组的“逼供信”之下。林语堂的说法不尽准确，但在当时恐怕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2] 根据1933年1月19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十四次常务会议通过的《新闻检查标准》和《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国民党先后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汉口等大城市设立了新闻检查所，归属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指导。所谓的中央宣传委员会，前身即中宣部，1932年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后改名。

[3] 时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

[4] 时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5] 萧振瀛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天津市长。

[6] 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的《新闻检查标准》（第三次修订稿）中可以看到，在查禁认为应当查禁的新闻时，检查官拥有的权力是极大的。例如，以下条款：

凡对中国外交有不利影响之消息，尚未证实或已证实不确者，应扣留或删改。（第二条）

凡涉及地方治安，摇动人心，引起暴动，足以酿成地方人民生命财产之重大损失者，应扣留或删改。（第三条）

关于军事新闻，发布后可能于我方不利的，应扣留或删改。（第一条）

当今新闻检查的情形所迫切需要的，并不是如此周密的检查条例，而是更多有头脑的检查官。须知，没有头脑的检查要比不起作用的检查更为糟糕，常常使检查的目标落空。当今新闻检查最恶劣的特征，就是愚蠢、混乱和过敏。有关新闻检查的调查，揭示了这样的事实：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能够了解其工作的检查官，即受过训练的职业官僚，对世界局势、全球报业与通讯社的运作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知道什么才是对国家有利的。比起外行的官僚来说，这样的人勉强可以接受。至少，在查禁文学作品时，他应当知道托尔斯泰和梅特林克所持的立场，并对当代的思想派别略有一点知识，就像当图书管理员应该知道图书分类法一样。

检查官的缺乏头脑以及因为害怕冒犯日本人而产生的过分敏感，再加上日本人的实际影响，致使北平的检查官对“于国家不利”这一条款的解

释十分随意。当所有关于“华北自治运动”的消息都被以“于我不利”的名义禁止发表时，暗含的意思就是，报纸对这些运动保持绝对沉默，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任其发展，反倒“于我有利”了。真正明智的认识是，既然华北自治运动是对我们不利的，在报上宣传之、揭发之，于我们就是件大大有利的事情。由于上述因素，去年北平报纸上被查禁的新闻包括：所有关于二十九路军从察哈尔撤退的消息；塘沽事件；天津北洋工学院反日学生与拥护南京的学校当局的冲突；在天津举行的中日关于河北和察哈尔未来政治地位的会谈详情；河北与察哈尔的官员动向及他们与日本当局的会晤；关于内蒙“独立运动”的消息；关于冀东政权^[1]的政治、军事和财政状况的消息等。1936年2月北平查禁的新闻包括：察哈尔北部内蒙“独立运动”机构的建立^[2]；李守信（Liu Shouhsin）^[3]和Jokojak^[4]进犯绥东；大沽事件^[5]及随之而来的磋商；昌平事件^[6]及当地形势；天津学生联合会、文化界救国会和华北各界民众救国会的宣言及活动；宋哲元的山东之行（会晤韩复榘将军）^[7]；冀东银行的建立；冀东军队的组建；伪政府教育厅的建立；有关察北问题的谈判；关于纪念“一·

[1] 指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2] 1936年2月12日，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在日本人扶持下，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改用成吉思汗纪年，取消青天白日旗。

[3] 当指“蒙古军”副司令李守信。Liu Shouhsin应当作Li Shouhsin。

[4] Jokojak不详。疑指伪蒙保安队卓什海。

[5] 疑指二十九军在天津大沽缉私，与贩毒的日商大西洋行发生冲突事件。

[6] 1936年2月1日，冀东伪军进入昌平，原驻保安队撤退。

[7] 1936年2月1日，宋哲元、韩复榘会于山东乐陵，商谈“维系国家主权及安定华北问题”。

二八”之役的集会的消息。^[1]很明显，尽管检查委员会里并没有日本的代表，日本人却间接地利用中国的军阀对之施加影响。

对中国新闻业来说，日本人的这种控制用意相当险恶。过去数年来的种种事件表明，日本人说不好的，对中国人肯定好；日本说好的，肯定于中国不利。看一看日本人对国民政府金融法案的批评就知道了。我个人常以此为准则来衡量中国的事情，虽然有的（比如银本位制）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这样的准则却屡试不爽。日本人说中国金融措施很糟糕，那它一定很好；日本人说中国应当降低关税，为打击走私，中国一定得提高之；日本人认为，不让中国人知道内蒙的自治和独立运动“对我们大大的有利”，那么，了解这些情况对我们肯定大有裨益。我过去怎么也不相信华北地区有走私现象，有一天听到一位日本发言人泰然自若地说“这里没有走私行为”，我才确信有走私问题。由于北平的新闻检查看来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影响，我想检查制度中“于国家不利”的条款，其实际的效果正好相反。在日本向华北的渗透中，中国新闻界失职了，新闻检查制度应当为此负直接的责任。

上述出现在华北地区的新闻封锁事件，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一个民族是不可能被征服的，除非它的新闻业首先被禁止发出声音。

中国检查制度的混乱表现为缺乏系统、协调和连贯性。在这个城市被查禁的消息，到另一个城市可能就通过了。新闻的删节，全看各个检查官是否心血来潮、突发奇想。上海检查官曾经删节政府总理的官方声明，这

[1] 这里指的可能是1936年2月16日，上海庙行镇为“一·二八阵亡将士无名英雄墓”举行揭幕礼一事。

名检查官是位中学毕业生。还发生过这样的事件，某市禁发某高官到访的消息，但在此之前，那位高官却在车站受到军乐队的公开欢迎，让摄影记者拍了照，带着卫兵上街，并下榻于地方长官的官邸。1934年12月，20多家通讯社和有影响的报纸联名向国民党呼吁改革新闻检查制度，内容包括：（1）要求检查官遵循国民党制订的新闻检查标准；（2）未经法律许可，不得惩罚报纸和报人；（3）已被查禁的报刊，如果以前未曾攻击过政府，应当允许其复刊；（4）把被羁押的报人提交司法审判，促其释放。这样的呼吁，何其可怜乃尔！

在事关领土、主权甚至民族生存问题上，国家禁止民众发表意见。这造成了民众的冷漠。如果有明智的检查制度，标准相对宽松，只限于查禁有反叛性质的消息，也许会引导国民这样思考：自己应当为失职不语而对今天的政治局面担负一定的责任。以为今天的中国人与30年前的中国人完全一样；面对领土的日益沦丧，仅仅因为从报上和公开集会上看不到民众的表示和行动，就以为他们对民族的福祉“漠不关心”，这完全是谎言。这里不能充分强调这一事实了。

细想起来，让人不安的反倒是新闻从业人员缺乏道德上的自我检查，其危害，远甚于新闻检查制度。讲述饥荒和洪灾中民众的艰辛以及地主压迫的电影，被以“反动”或“共产”的名义查禁了；揭露官方的腐败和横征暴敛的作家，则被受雇用的宣传人员和检查官视为对政府抱有敌意的人。我倒希望，能“检查”一下这些检查官。有一位在西方受教育、讲英语的作家，有一段时间起劲地反蒋，不断批评政府的腐败和聚敛，称国民党中央为“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处”，说什么“腐败和裙带关系之猖獗，使

南京寡头政治集团成为有政治教养的人的笑柄”。后来，他成为一家官方出版物拿高薪的编辑，这位作家就忘记了所有关于“腐败和裙带关系”的言论，立马开始滔滔不绝地为政府辩护，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进步、最文明的政府。新闻界的道德堕落是自加于其身的，正是这种由许多受雇用的宣传人员造成的道德过失，让人在口头上而非内心里对拥蒋派大表支持，对反蒋派则恶语相加。在降低民众对报业的尊重，使人对空谈爱国、不知廉耻的革命作家不屑一顾方面，它的作用，要比检查制度大得多。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写了这本《中国新闻舆论史》，对漫长的中国舆论史作一次回顾，重温其正气浩然和卑贱自污的时刻。我希望能有助于读者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局势，理解舆论繁荣和衰败之因。在政府极为“强大”的时代，报业常常会堕落，但是，哪里有奴颜婢膝的作家和太监党徒，哪里就有民众无畏的声音。过去，一些短命的政权把政治视为其禁脔，玩弄于股掌之上，这样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今天，我们必须为新闻自由的宪法原则而战，为作为原则的个人的公民权利而战。毕竟，民主制度意味着从群体生活中体验到理智的乐趣，这是平常人能够而且将要得到的。尽管在西欧，民主制度的声誉暂时下降了，但我们坚信，民主是欧洲献给人类文明的最珍贵的礼物之一，人类最终必将步入这样的前进之路：它的基础是存在一个个都能发挥其才智的个体，而不是惟命是从、不能思想的兽群。

译者附言

知道林语堂有这么一本书，是从余英时先生的一篇文章中看到的，余先生说：

……林语堂在美国始终保持着一个自由作家的身份，和学院中人很少交往。他的畅销书也没有受到汉学界的重视。但他有两部英文著作对美国的汉学研究发生过影响，即上述的《苏东坡传》和《中国新闻舆论史》（*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后一部书是1936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写的时候他还在上海。这是他继《吾国与吾民》之后在美国发表的第二本书，但与幽默、闲适的人生情调毫无关系，而毋宁是一部相当严肃的学院式的作品。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呢？这当然和他当时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有密切的关系。正如他在此书的导论中所说的，他所关心的是中国史上清议与权威之间的斗争；而这一斗争则是民主在中国的发展的一大关键之

所在。在这一问题上，他的观点和胡适最相近，认为中国史上争自由的传统为现代民主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础。《中国新闻舆论史》分为古代与现代两部分，但古代部分较疏阔，近代部分则因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等为基础，眉目较为清楚。……这部《中国新闻舆论史》在50年代前后还是美国大学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指定参考书之一。今天不少人谈中国的“公共空间”问题，此书仍有可以借鉴之处，因为近几十年关于报业史的专题研究虽增加了不少，却仍然没有一部英文的通论取它而代之。^[1]

译者在大学时代对新闻史发生兴趣，拜读过方汉奇、宁树藩、刘家林等先生的著作，但没有听说过林语堂有这么一本书。于是央求在美国居留的友人王治河先生，从图书馆为我复印了一部。浏览后，觉得余先生的评论是相当公允的。这本著作写于1936年，是写给英语读者的，所根据的史料，大体不出赵翼《廿二史札记》、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与戈公振

[1] 参见余英时：“试论林语堂的海外著述”，载《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0页。在这篇写于1994年的文章中，余先生还说：“书中介绍了南宋周麟之《论禁小报》，这是有关中国报纸史料较早而且较详细的一件文献，是胡适在1933年12月18日最先发现的。我猜想林语堂引及此文或许与胡适有关。”按，现在通行的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也引用了周麟之的《论禁小报》。戈著1927年初版，1935年1月出了第四版，这年10月份戈公振就去世了。译者所见三联版（1955）和中国新闻出版社版（1985）想来均是据最后版本重印的。余先生说《论禁小报》是胡适首先发现的，根据的大概是《胡适日记》中的记载。如果《中国报学史》早期版本中没有相关记载，那么可能是在1935年重版时据胡适的发现作了增补，但若早期版本已有此记载，则余先生所谓胡适的发明权就靠不住了。据山东大学新闻系陈玉申教授见告，上海书店据1928年版影印的“民国丛书”中的《中国报学史》，已收入《论禁小报》一文。可见，林语堂引用此文，更有可能直接来自戈著，而非余先生所猜想的“与胡适有关”。

《中国报学史》的范围。70多年来，新闻舆论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仅就史料方面来说，林著可以说已经过时了。但是，林著所取的研究视角，即余先生所言“他所关心的是中国历史上清议与权威之间的斗争”，却是很先进的，直到今天“仍有可借鉴之处”。

此书1939年就有了日译本^[1]。仅从新闻史学史的角度考量，这本在海外颇有影响的著作也应当移译为中文。译者不揣谫陋，决心一试，未料竟耗时四年之久！自2002年6月至2006年10月，业余时间都断断续续地耗在这本小书上了。时间的零碎尚是次要的，主要的障碍是语文水平的有限。译稿杀青后搁了两年，又改了一次，自感没有明显的提高。以译者的水平，虽然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译林语堂这样的文章高手的书，要达到“信、达、雅”的境界，是很困难的，哪怕只是最低要求的“信”。再搁上几年，恐怕也很难有提高。反不如将之付梓，还能得到读者的指教。

原书中提到的历史事件，偶有省略人名的情况，大概是怕太多（以威氏拼音拼出）的人名吓坏了西方读者，翻译时根据史实作了还原。有的在注中注明，有的径在译文中标出，没有一一注明。译文对报刊史实的订正，除注明者外，均据宁树藩等：“《中国报学史》史料订误”（《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

翻译这本小书，得到了许多师友的帮助。除了上面提到的王治河先生

[1] 《支那に於ける言論の發達》，安藤次郎、河合徹译，生活社。

外，我以前的同事陈菊红为我补齐了残缺的数页；钱钢老师为我提供了《申报》的一期复印件，使我得以纠正原书的失误；王学泰先生帮我还原了一篇古谣谚；阎克文先生协助联系出版事宜；翻译家冯克利和新闻史家陈玉申先生的校正和润色，使我有出版信心（舛误之处，例当由我负责）；我的妻子肖秀平译出了最后一章的初稿；大概十年前，我读了孙旭培先生的《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承孙先生鼓励，我开始了新闻学的学习，虽然不久就放弃了，但今天翻译这本书，实在要拜当年的这段因缘所赐。最后，要感谢为拙译赐序的宁树藩先生，宁先生今年已88岁，是我素所景仰的前辈新闻史家，这篇万言长序，充分体现了他知人论世的治学特色，不但为拙译增色不少，也给了向被轻视的林著以很高的评价，林语堂若泉下有知，亦当引为“后世相知”了。

刘小磊 (liuxiaolei@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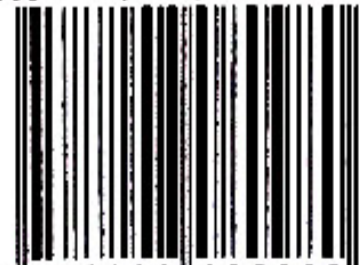
2008年3月4日



世纪出版

上架建议：文化 传播

ISBN 978-7-208-08098-0



9 787208 080980 >

定价：25.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文景网：www.wenjingbook.com

易文网：www.ewen.cc

文景网：www.wenjingbook.com